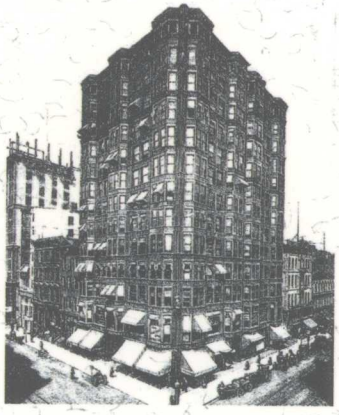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著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New Imperialism

大卫·哈维写了一本影响深远和令人深思的著作。三十年来，他一直将自己的著作对准那些现存的自满的观念。哈维是一个激进的学者：他的著作不落新闻业的俗套，充满事实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这本著作经过了巧妙的构思，拥有散文般的优美文字，叙事风格也非常细致和紧凑。《新帝国主义》对我们现存的权力机构进行了强有力的控诉，同时也为如何变革这些机构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思路。

——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作者毫不费力地穿行于历史、经济、地理和政治的河流，利用极具说服力的论据和清晰的文字，将今天的新闻头条放到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解析我们都赶上了的21世纪初期的混乱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关于剥夺性积累的概念将影响深远。《新帝国主义》绝对是一本有用的著作。

——苏珊·乔治(Susan George)，阿姆斯特丹跨国研究所副主任

上架建议：政治学

ISBN 978-7-5097-0597-1

9 787509 705971 >

ISBN 978-7-5097-0597-1

定价：25.00元

www.ssap.com.cn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著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主编/陆象淦

新帝国主义

著　　者/〔英〕大卫·哈维
译　　者/初立忠　沈晓雷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 ssap. com. cn
网站支持/（010）65269967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85117871
电子信箱/bianyibu@ ssap. cn
项目经理/祝得彬
责任编辑/高明秀
责任校对/尤田雄
责任印制/岳　阳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010）65285539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20
印　　张/10
字　　数/147千字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0597-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7-1059号
定　　价/2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 恩格斯的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发展、不断丰富和升华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是革命的和社会批判的，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品格。150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迎击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始终挺立潮头，永葆青春，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时期，一些西方理论家急不可耐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并断言这种失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但是，正当他们弹冠相庆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以及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强大活力和时代价值，虽历经时代的磨洗和考验，却愈益迸发出真理的光芒，宣告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完整体现。如果说毛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 2 版，第 681 页。

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其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当前深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无疑首先应该立足当代中国的实践，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丰富经验，着重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从新世纪和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及其最新成果的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应该以世界的眼光，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理论交流与联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把握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建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势必要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检验。关注、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各国的实践，或者面向时代问题，探索当代世界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的趋势，其中虽然观点不一，良莠不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观点和论说。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近20年来其格局出现了诸多变化。一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欧洲的一些原本实力很强的共产主义大党出现急剧分化，党员数量、动员力和影响力锐减，在经过调整逐步稳住阵脚后，纷纷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新的探讨和反思。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问题成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阵

营的首要课题。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学者开始了新的集结，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系，在1993～1996年间，分别在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伦敦等地召开了“中国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联合会议”、“国际马克思大会”、“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社会主义国际大会”等一系列参与性很广的国际会议。其中由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筹备和组织、欧美的十多家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刊物共同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已经定期化，成为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性大型学术会议，从1995年迄今已举行了五届，参会者愈益增多，包括了欧美和亚非拉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涌动和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和社会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演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就业临时化和失业阴影的笼罩、生活的不稳定、阶级和种族矛盾等资本主义固有弊病越发突出，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秩序，依然像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存在着一系列无法愈合的伤口。正因为如此，欧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着重探讨阶级关系、种族矛盾和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四是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极其广泛和密切的网络联系。以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为例，它自称“既是一个刊物、一套丛书、一个研究和聚会的场所、一个研究小组，又是一个向经常性的讨论开放的网址、一个在线论坛、一个国际网络”。它又在2002年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多家刊物一起创建了称为“K计划”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欧洲网络”。“K计划”这个名称，取自德语“阶级”（Klasse）、“资本”（Kapital）、“斗争”（Kampf）和“共产主义”（Kommunismus）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其宗旨是“通过重要的文献、研究成果和争论的流通，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作出

贡献”。这个“K计划”网又是作为“世界社会论坛”欧洲分部的“欧洲社会论坛”网络的组成部分。五是研究组织带有较浓厚的民间色彩，派别界限淡薄，观点呈现多样化，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用《今日马克思》杂志和丛书的主编、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雅克·比岱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今天之所以对西方青年一代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因为它“不仅是分析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而且前景广阔”。其迫切的现实价值还在于“资本主义在其当前的全球化阶段重又凸显出其初期的野蛮性……虽然有着再度扩张的闪光外表，却又显现出没落的征兆”。①

总之，当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虽然仍处于一个分化、聚合、动员、调整和整合的过程，但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倾向和趋势，以及对于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有益探讨、分析和见解。本着进一步开阔眼界和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的时代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的宗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以问题为主线，重点译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解读及对当代世界分析探索的著述，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探索的涌现，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一个相关的比照和参考。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现实问题，深入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创新才有所可能。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陆象淦

2008年11月于北京

① Jacques Bidet, *Explication et reconstruction du Capital*, Introduction, PUF, 2004.

前　言

牛津大学的地理与环境学院在2003年2月5~7日连续举办了三场克拉伦登演讲（Clarendon Lectures）。这一时机选择得非常恰当。伊拉克战争虽然表面上迫在眉睫，但毕竟还未真正开始，而且还存在些许可以避免的希望。这一希望进一步被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所点燃。2月15日，伦敦和巴塞罗那大约有一百万人涌上街头；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城市，其中包括美国的城市，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也不低于这个数字。联合国安理会的大部分成员国认为，由残暴和专制政体所带来的威胁可以通过外交方式加以解决。尽管反对之声如此强烈，然而在3月20日，美国还是对伊拉克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得到了英国和西班牙的支持。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这场战争的结果，尽管毫无疑问具有军事性质，但仍然还不明朗。这场战争是否将会以或可能将会以殖民占领、美国扶植的代理政府，抑或真正的民族解放而结束？

一方面，这些快速变动的事件使我很难策划一系列有关“新帝国主义”这一主题的演讲。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事件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们给全球安全所带来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威胁，又使得一些深层研究势在必行。因此，我决定尽我所能。

在追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的地方、文化及政治中心参加了由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和奥马·达波（Omar Dahbour）组织的，以“帝国主义”为主题

的长达一年之久的学术研讨会，并从中受益良多。我要感谢尼尔·史密斯和奥马·达波，以及其他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他们帮助我完善了很多观点。还有几位参与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计划的同事也对我的研究课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因此我还要感谢路易斯·雷尼翰（Louise Lennihan）、唐·罗博瑟姆（Don Robotham）、艾达·苏莎（Ida Susse）、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sad），特别是迈克尔·布林（Michael Blim）和那些为我们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双边学术研讨会进行打字录入的学生们。沿着我在此所构建的路线进行某种形式的修正的最初设想，最早模糊地产生于我和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同主持的双边学术研讨会上。因此我欠阿瑞吉一个很大的人情。我还要感谢我在牛津大学地理学院的同事们，是他们邀请我重返故里，并在如此正确的时间和如此正确的地点让我听到了那些演讲。我还要特别感谢玛利亚·凯卡（Maria Kaika）、杰克·兰顿（Jack Langton）和埃里克·斯温格多夫（Erik Swyngedouw），是他们给了我热情的招待，并对我的研究课题表达了浓厚的兴趣。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安妮·阿什比（Anne Ashby）给了我最大的帮助，简·伯克（Jan Burke）在激励我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多年以来，我从与他人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我希望我在这些演讲中可以很好地利用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智慧与聪明才智。

大卫·哈维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石油决定一切　/1

谁控制了中东地区，谁就能统治全球石油动脉；谁控制了全球石油动脉，谁就能统治全球经济，至少从不远的将来来看是如此。

关于两个产油国的故事
美国市民社会的内部博弈
石油决定一切

第二章　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　/24

固定在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应如何应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对外扩张的动力？资本的无限积累对于权力的领土逻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说，如果全球体系下霸权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资本逻辑又怎能支撑霸权？

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
霸权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兴起，1870～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历史，1945～1970 年
新自由主义霸权，1970～2000 年

选择方案
地区性霸权和反霸权

第三章 资本束缚 /72

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经济压力的时候，它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竞争与垄断、集中与分散、固定与变动、动力与惰性，以及各种不同范围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张状态，无一例外地都产生于资本的无限积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分子化进程。

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
空间经济的生产
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
资本循环
时间—空间修复
内部矛盾
调节机构的力量
国家重新勃兴

第四章 剥夺性积累 /111

美国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发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30年所发现的东西——“掠夺”，这种使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可能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重复，否则会使积累的动力突然停止”。

消费不足和过度积累？
马克思的保留
剥夺性积累
所有一切偶发事件
私有化：剥夺性积累的利刃
围绕剥夺性积累的斗争

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两面性
剥夺性积累的帝国主义

第五章 从认同到强制 / 148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性方案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新的“新政”。这就意味着要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新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从而控制从国际贸易条款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耳闻目睹的一切。这将导致重返一种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

延伸读物 / 171

参考书目 / 175

第一章
石油决定一切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以及一个“新生的”帝国主义在其中可能将发挥的作用。我力求从长时段的视角和通过我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镜头来实现上述目的。我努力从所有骚乱和动荡的表象中揭示出一些深层的变化，并以此开辟一个讨论的领域，即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世界并对此作出反应。

当然，我们每个人所能经历的最长时段是我们的生命。我最初的世界观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那段时间。当时，英帝国的概念仍然名副其实。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向我开放，因为世界地图上如此多的幅面标注的都是红色，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如果我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话，我可以翻开自己的集邮册——英国君主的头像遍布印度、沙捞越（马来西亚的一个邦）、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尼日利亚、锡兰（今斯里兰卡）和牙买加等国家和地区。但是我很快就认识到，英国的力量在不断下降，英帝国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分崩离析。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不断深入，英国全球大国的地位逐步为美国所取代，世界地图的颜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47 年印度独立与印巴分治，标志着英帝国衰亡的开始。起初，我认为这一事件仅仅是“理智的”和“公正的”英国统治被不理智的本土激情所取代，并回复到守旧派偏见的一个典型例子。然而随着非殖民化斗争的日益激烈，

英帝国统治的丑陋和邪恶的一面开始变得愈加明显。对于我和很多其他同时代的人而言，1956 年英国和法国试图收回苏伊士运河这一事件标志着其丑陋和罪恶达到了顶峰。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阻止了英国和法国使用武力来推翻阿拉伯自己的领导人纳赛尔的企图，而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纳赛尔与现在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样，是国际社会的威胁和“邪恶的化身”。艾森豪威尔更喜欢和平的遏制政策，而不是战争。这由此也说明，随着英国和法国实力的迅速衰落，美国已经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同时我也发现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很难再去否认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快速衰落但却与众不同的英帝国主义的阴暗面了。

当时对于一个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从布朗克斯到牛津的年轻学生来说，所有这些事情看起来都非常与众不同。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曾写到他是如何不能忍受那些“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父辈支配着英帝国和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像是《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影片中的临时演员，穿着晚礼服四处游荡（经常看起来是睡过了头），过着一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或者至少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父辈支配着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无疑是一出戏剧：英帝国时代已经结束；统治阶级的孩子们仍然靠日渐贬值的信托资金生活，仍然在继承着即将破产的公司……至少我知道，我正在这个世界上往前迈步”。[①] 我想知道在当前成千上万家失败的网络公司散布于美国土地，财务丑闻，股市暴跌导致每个人养老金领取份额下滑，以及突如其来的好战诉求的情况下，正如《纽约时报》在 2003 年 1 月 5 日的头版《美帝国：学会适应它

① 马歇尔·伯曼：《美国的刑罚和社会正义》，载 A. 梅里菲尔德、E. 斯温格多夫主编《都市的不正义》（M. Berman, ‘Justice/Just Us: Rap and Social Justice in America’, in A. Merrifield and E. Swyngedouw eds., *The Urbanization of In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第 148 页。

吧》[①] 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的感受是什么。对我而言，在一个帝国行将灭亡的那一刻才去认识这个世界，如同在公众宣布下一任官员诞生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一样，感觉都非常奇怪。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不断重复着此前的断言（在2002年7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中也是如此）："美国所有的反恐战争都是帝国主义的演习。这或许会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愿意将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帝国。但是在美国将大批士兵、间谍和特种部队派驻世界各地的情况下，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再偏爱所谓的"廉价"帝国，或希望承担更少的责任。美国应该准备承担更加重要和持久的责任，应该准备坚持不懈地实现重大改革的目标。美国这一主流媒体的看法应当给美帝国对世界而言非常重要的观点带来重大影响。

当然，伊格纳季耶夫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马克斯·布特（Max Boot）声称："美帝国主义可能是对付恐怖主义最好的一剂良药。"他表示美国应该更具扩张性："现在，阿富汗和其他一些麻烦国家正大声呼唤身着马裤、头戴太阳帽的自信的英国人曾经提供给他们的外来的、文明的管理方式。"随着他们光辉的帝国传统得到如此美好的回忆，英国也开始行动了起来。保守派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在电视讲座和据此而出版的著作中，通过真正爱

①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负担》，载《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2003年1月5日（M. Ignatieff，'The Burden'，*New York Times*，5 Jan. 2003，Sunday Magazine），第22～54页；还可参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如何阻止阿富汗解体：美帝国主义》，载《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2002年7月26日（M. Ignatieff，'How to Keep Afghanistan from Falling Apart：The Case for a Committed American Imperialism'，*New York Times*，26 July 2002，Sunday Magazine），第26～58页。

国主义的方式，不但纪录了英帝国缔造者的英雄事迹，而且指出了英帝国可能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和平、财富和幸福）指出，美国应当增强自己的决心，开展金元外交，并“完成从非正式帝国向正式帝国的转变”。正如很多人现在所宣称的那样，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已经成型，但是如果希望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从而给世界带来广泛的利益，就像19世纪后半期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所做到的那样，美帝国还需要获得更加明确的承认和作出更加坚实的承诺。①

尽管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说中宣称“美国没有帝国要扩张，也没有乌托邦要营建”，但他似乎很愿意作出上文所说的这种承诺。布什于“9·11”事件一周年之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文，阐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任务和面临的最大机遇：“我们将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影响，建立国际秩序和开放的环境，使众多的国家能在这种环境中蓬勃向前，实现自由的繁荣。一个自由与日俱增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反映了美国经久不衰的理想，使美国的盟友团结一致……我们追求公正的和平。”当谈到准备战争的时候，他写道：“让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取代压迫、仇恨和贫困”，“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已证明能使整个社会摆脱贫困”。他断言，美国“将促进温和、宽容以及人类尊严无可辩驳的要求——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司法平等”。他最后总结道：“今天，人类手中把握着进一步实现自由战胜所有夙敌的机遇。美国愿承担领导这项伟大使命的重任。”类似的言论还出现在美国此后不久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的

① 在此引用的很多内容都收录在B. 博登《“9·11”之后的帝国主义再创造》，载《选择：土耳其国际关系》电子期刊，2002年夏（B. Bowden, ‘Reinventing Imperialism in the Wake of September 11’,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Summer 2002）。这可以从网上查到，网址为http://alternatives.journal.fatih.edu.tr/Bowden.htm>。

前言中。[①] 这或许并不足以表明美国已正式宣称自己为帝国，但却毫无疑问地表明美国希望自己成为帝国。

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存在过各种截然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沙皇俄国、苏联、奥匈帝国、拿破仑帝国、英国和法国，等等）。透过这些千差万别的帝国，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如何理解、管理和积极地创造一个帝国，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有关帝国的相异的有时甚至是相冲突的观点，完全可能适用于同一个帝国。中华帝国经历过一段强劲的海洋扩张时期，但不知为何突然神秘地放弃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就一直在各种帝国的模糊概念里面来回摇摆。如果说小布什是一位表现得有点像拿破仑的美国总统，他希望进兵巴格达，随后有可能是德黑兰（政府内部的一些鹰派人物显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男人”），那么克林顿政府在鼎盛时期的行为则与奥斯曼帝国更加相像（有趣的是布什政府抨击克林顿政府过于“女人气”）。以前任财政部长鲁宾和现任财政部长萨默斯为代表的美国财政部一致认为，软实力比硬实力更加有效，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要承认多元文化并存。多边政治要优于单边政治。

另一方面，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直至尼克松治下的美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均借鉴了苏联创建卫星国而非其他的方式。唯一一个例外是日本，与匈牙利和波兰不同，日本在保证从政治和军事上屈从于美国的前提下，获得了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力。伊格纳季耶夫指出，现存的美帝国的形成实际上并不符合“心不在焉”说（英国喜欢称自己为“心不在焉”式的

① G. W. 布什：《夺取自由的胜利》，载《纽约时报》2002 年 9 月 11 日（G. 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 2002），第 A33 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可以在 www. whitehouse. gov/nsc/nss 上面找到。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负担》一文中就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版图扩张），它是在对此加以否定的过程中得以建立的：在美国，人们并不像谈论国内问题那样谈论帝国主义行为，人们也不允许国家将过多的精力放到除国内问题之外的其他问题上。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廉价帝国”，而非坚实的、能够作出长期承诺的帝国。①

有许多可以称之为“传统左翼”的人认为，美国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成为了帝国。20世纪60年代，涌现了大量对美帝国主义，尤其是对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作用进行分析的著作。同时，在那些新出现的依附派学者（如弗兰克）与那些秉承了霍布森、希法亭、列宁、卢森堡以及其他20世纪之交的理论家思想的学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中国，毛泽东则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他需要对付的首要敌人。但是，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一书在2000年的出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争论，给传统争论带来了挑战，并要求必须重新考虑左翼反对派关于帝国的去中心结构的观点，因为帝国产生了一些新的后现代特性。尽管对这一系列争论持批判态度，其他一些左翼人士也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的力量（无论用什么方式来解释这一力量）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因此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② 右翼和自由主义人士公开承认帝国和帝国主义，表明他们

① M. W. 多伊尔（M. W. Doyle）在其著作《帝国》（*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对帝国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关于美国的案例，也可参考 W. A. 威廉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帝国》（W. A.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② “新帝国主义”的主题已经在左派学者中间引起讨论，例如 L. 帕尼奇：《新帝国国家》，载《新左翼评论》（L. Panitch, ‘The New Imperial State’, *New Left Review*），2000，第5~20页；也可参见 P. 高恩、L. 帕尼奇、M. 肖《国家、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圆桌讨论》，载《历史唯物主义》（P. Gowan, L. Panitch, and M. Shaw, ‘Th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1年第9期，（转下页注）

也已承认了这一早就存在的现实。但这也表明，当前帝国主义可能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吸引力。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领域中公开讨论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哈特和内格里的著作在主流媒体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这就产生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所有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争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究竟有哪些是新的东西？

首先，我将通过分析当前事件来解答这一问题。在英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以及在其他几个国家的赞同下，美国已经发动了对伊战争。但是美国的这一行动遭到了不少传统盟友，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以及长期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爆发了广泛的群众性反战活动，很多人对布什政府为什么变得如此专注于对伊战争感到迷惑不解。这一现象表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驱动着布什政府的行为。然而，找到这一深层原因并不容易。只有深入到由误导性语言和虚假信息构成的庞杂的表层泡沫下面，才能真正找到我们想要找到的东西。

关于两个产油国的故事

2002 年 4 月，委内瑞拉爆发军事政变，查韦斯总统被赶下台，华盛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高兴。美国立即承认了新任

（接上页注②）第 3 ~ 38 页。其他评论有 J. 彼得斯、H. 威尔特梅尔：《全球化背后：21 世纪的帝国主义》（J. Petras, H. Veltmeyer, *Globaliz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Zed Books), 2001；R. 温特：《帝国主义视角下的全球化》，载《科学和社会》（R. Went, 'Glob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2002 ~ 2003 年度，第 473 ~ 497 页；S. 阿明：《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载《每月评论》（S. Amin,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2001 年 6 月，第 1 ~ 10 页；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M. Hardt and A.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总统——一个商人，并表示希望这个国家将重新获得稳定和秩序，从而为将来的稳固发展打下基础。《纽约时报》也用同样的语调发表了社论。然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民众马上就从中看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身影，并回想起了智利在1973年9月11日发生的流血政变，在那次政变中，社会党的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被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所推翻。现在，智利人民将那次政变讽刺地称之为他们的“小9·11事件”。在美国国务院关于智利1973年军事政变的档案中有一份中央情报局的电报，内容如下：“通过军事政变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是一项持续而坚定的政策……我们将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继续尽最大努力向智利方面施压，以最终实现这一政策。我们将尽可能秘密和安全地执行相关计划，确保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干预活动不为外界所觉察。”① 不难想象在将来某一时刻，关于此次委内瑞拉军事政变的相似的电报也会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上。

委内瑞拉的这次军事政变在三天后以失败告终，查韦斯重新掌握了政权。美国国务院谨慎地否认了此前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声称这完全是委内瑞拉的国内事务。他们表示希望委内瑞拉政府通过和平、民主与合法的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随后，《纽约时报》也遵照这一基调发表了社论，只不过进一步表示，或许轻易地接受推翻一个民选政府的做法——无论这个政府多么令人讨厌——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支持民主毕竟是美国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

另外一个重要的“欧佩克”成员国伊拉克与委内瑞拉相似的际遇也颇具启发性。美国声称将伊拉克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符合其利益。当然，与拉美地区相似的是，美国早在1953年就曾将伊朗民选的摩萨台政府赶下台，将伊朗前国王重新迎上

① 引自C. 约翰逊《反冲：美帝国的代价与后果》（C.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2000，第18页。

权力宝座。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所能允许存在的只是某些特定种类的民选政府。但是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声称要在伊拉克和整个中东地区建立民主国家，只不过是它对为什么要诉诸战争的一系列经常相互冲突的解释中的一个。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美国的支持者都对战争合理化的解释感到迷惑不解。事实证明，试图从一大堆假信息和不断变化的理由中间来识破事情的真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最初，美国试图将伊拉克与炭疽生物袭击相联系的做法遭到了彻底失败。虽然伊拉克有使用生化武器的不良记录，但大多发生在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战争期间，当时，美国国务院尽管清楚地知道伊拉克是战争的挑起者，但仍然故意误导世界各国相信双方对战争的爆发都负有责任。[①] 阿尔及利亚在人权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不良记录，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为此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反而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阿尔及利亚在严重违反人权、镇压国内伊斯兰反对派方面，与伊拉克非常相似（据统计，在最近8年里有12万人死于政府镇压）。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波恩斯（Williams Burns）甚至走得更远，他说："我们可以从阿尔及利亚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学到很多经验。"[②] 这或许可以对一个政府的高压政策在什么时候才是正当的这一问题为什么突然在美国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论作出了解释（《纽约时报》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接下来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

① J. 海特曼：《哈拉布甲：美国看起来并不介意毒气》，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3年1月17日（J. Hilterman，'Halabja：American Didn't Seem to Mind Poison Ga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7 Jan. 2003），第8版。

② R. 菲斯克：《反战案例：美国自我利益驱动下的冲突》，载《独立》2003年2月15日（R. Fisk，'The Case Against War：A Conflict Driven by the Self-Interest of America'，*Independent*，15 Feb. 2003），第20页。

模杀伤性武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海湾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军事力量严重下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认为，伊拉克不会再对这一地区的和平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这就使得美国政府所声称的伊拉克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这一论断变得非常可笑（布什总统更是奇怪地声称，伊拉克对美国的袭击将会严重地破坏美国的经济）。中央情报局断定，只有当萨达姆被激怒的时候才会使用生化武器——如果萨达姆有生化武器的话。这就更加令人不解，为什么美国决意要激怒萨达姆。这或许是因为伊拉克试图获得核武器，但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尤其朝鲜更是公开声称要进行核试验。武器核查员在最终获准进入伊拉克之后，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管怎么说，推翻萨达姆政权是美国的首要目标，而裁减军备只有在美国希望获得联合国的授权的时候才变得如此重要，因为联合国宪章不允许一国对另一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即使上述原因均无法得到证实，萨达姆也必须下台，因为他是一个谎言家（这一称谓被用到很多政客的头上，以至于其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笑话）、暴君（沙龙也是如此）、不计后果的人（未被证实）和邪恶的化身，因此必须将他打倒，这就使得中东地区的战争犹如某些长期上演的中世纪道德剧的一段情节一样（萨达姆扮演的是魔多，布什扮演的是勇敢的佛罗多，布莱尔扮演的则是佛罗多忠实的仆人山姆）。最后，对伊战争听起来就像是美国和英国承担起了某种神圣的使命，要将伊拉克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并在中东地区播种美国式价值观一样。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很难不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这一系列烟幕背后，一定掩藏着某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起初，看起来似乎真有一些难以揭露的秘密情报，但是每次努力从秘密档案中揭露出的那些情报，不是过于琐碎，就是很容易被驳倒，而英

国所揭露的那些情报虽然未经确认，但非常像是剽窃了一篇五年前的博士论文（《外交》杂志曾刊登了这篇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由于其过于草率，很难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情报部门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他们当中的一些成员对行政部门修改他们情报的方式感到非常不满。斯默尔认为，尽管新闻媒体均呈现出好战倾向（默多克旗下遍布世界各地的175家报纸——据信他们的编辑均严格遵守新闻独立的原则——一致声称战争是一件好事情，其他传媒巨头所掌控的媒体也是如此），而且政客也不断为此虚张声势，然而世界舆论的天平即便没有直接倒向反对战争的一边，也仍然对战争持深刻的怀疑态度。

因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已经公布的原因并不能使人信服；它们并没有披露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真相。那么，那些未经公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在此我们还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或许连这出戏的主角都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原因，或者即便他们理解的话，他们也会加以隐瞒和否定。

美国市民社会的内部博弈

2002年德国大选前夕，德国司法部长的一席话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她指出，布什政府在海外的冒险主义是为了转移其民众对国内难题的注意力。仅仅这一句话或许并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她的错误在于进一步指出，希特勒也曾采用过这一相同的策略。在此情况下，她被迫提交辞呈。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结果，那就是任何关于她前一部分论断的讨论都被迫终止。

事实上，长期以来，那些陷入国内危机的政府经常会采取海外冒险，抑或通过制造一个外部敌人以巩固国内团结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在上述事件中，这一观点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原因在于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国内的情况在各方面都要比此

前多年难于应付。自2001年初开始的经济衰退（“9·11”事件加剧了这种衰退）并没有被止住。失业率持续上升，对经济的不安全感四处弥漫。公司丑闻接二连三出现，仿佛稳固的公司帝国在一夜间就土崩瓦解。账目混乱（以及彻底的腐败）和管理混乱使华尔街声名狼藉，股票和其他资产的净值出现严重贬值。养老基金损失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的价值（如果它们的价值还没有完全损失，就像安然公司的员工所遭遇到的那样），中产阶级退休后的生活前景堪忧。医疗保健体系处于混乱之中，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盈余迅速蒸发，财政赤字数额日益庞大。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平衡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糟。长期以来，社会不公平现象不断呈上升之势，但政府盲目崇拜减税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态势的发展。环境保护问题遭受挫折。即使在市场失灵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政府仍然不愿再次对市场实施任何调控措施。最为严重的是，美国总统是通过最高法院五票对四票的判决，而不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所产生的。在“9·11”事件前夕，美国总统的合法性遭到至少半数民众的质疑。能够阻止共和党人在政治上大溃败的唯一可能就是“9·11”事件和炭疽恐慌（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声称萨达姆可能对美国进行炭疽攻击，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一名词）所导致的全民大团结——几乎相当于民族主义的复兴。尽管美国很快就以微小的代价（对美国而言）占领了阿富汗，但迄今为止不但本·拉登“是死是活”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反恐战争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引人注目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比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伊拉克更为有利的呢？况且，自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来，布什政府内部的鹰派人物就一直试图对这个“邪恶轴心”的重要支柱动用武力。从短期来看，美国政府这一声东击西的策略就像以往那样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公众基本上接受了如下观点，即基地组织与萨达姆政府有密切联系，不管

怎么说萨达姆都是一个非常危险和邪恶的敌人，需要利用军事手段将其推翻。在这一过程中，共和党人通过国会选举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布什总统也摆脱了自当选以来就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非法性阴霾。

但是，应该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促使看起来似乎是浅薄的政治机会主义转变成为美国地缘政治历史上引人注目的和持久的政治力量。首先，历届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就对伊拉克政权和泛阿拉伯运动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心存担忧。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克林·鲍威尔就拟定了用以对付伊拉克的军事应急方案。后来成为布什政府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也于1992年明确地赞成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他一直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这一观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促使伊拉克发生政权更迭成为一项公认的政策。1997年，一个新保守主义团队联合起草了《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该计划坚称实现伊拉克政权更迭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目标，并敦促美国政府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从人员构成来看，这一团队主要包括了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珀尔，以及其他一些布什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团队的核心成员。就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当时伊拉克早就已经进入了这一团队的视线。但是他们在1999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承认，“只有出现一个灾难性的、有催化作用的事件，例如一个新的珍珠港事件”，才能使军事打击得到国内外的一致同意。“9·11”事件为此提供了契机，只要他们能够将萨达姆和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了。[①] 由于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对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方面的事情都并不关心和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很

① R. 菲斯克：《迫在眉睫的战争与化学武器或人权无关，而与石油相关》，载《独立》2003年月18日（R. Fisk，‘This Looming War isn't about Chemical Warheads or Human Rights: It's about Oil’，*Independent*，18 Jan. 2003），第18页。也可参见网页 http：//www. newamericancentury. org。

容易就成功地将打击恐怖主义扩展到推翻萨达姆的统治上来了。在此基础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意见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除此之外，还需要了解这一内部动因的另外一个方面。美国是一个极度宣扬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如果不能对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话（动用财政贿赂除外），将会导致民主长期不稳定和出现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整个国家一片混乱，以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例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准确地阐述了这一市民社会的特征。

> 既然权力实质上只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那么一个完全建立在权力之上的团体，在面对秩序和稳定的时候，必将遭受溃败；其全面的安全保障表明，它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它只有通过获取更多的权力，才能维持现状；只有通过不断地增加权威和积聚力量，才能保持稳定。霍布斯所设定的共和国并不是一个稳固的政体，它必须经常从外部来寻求新的支撑；否则它就会在一夜之间倒塌，陷入无目的、无意义的私人利益的混乱状态……经常存在的战争可能性为共和国的持久存在提供了保证，因为它使这个国家在损害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权力成为可能。①

冷战早已结束，俄罗斯人踏雪穿过加拿大入侵美国的威胁也已不复存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没有了明确的敌人，除了市民社会中那些极度贫困和边缘化的群体之外，美国国内的经济繁荣为绝大多数人保证了不同层次的令人满足的幸福生

① 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H. Arendt,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8，第22页。

活。然而，正如阿伦特所预测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糟糕的十年。恶性竞争加剧，作为“新经济”的化身，那些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的暴发户四处炫耀他们的财富，各种骗局和欺诈行为层出不穷，丑闻（既有真实的，又有想象的）满天飞并迎合着人们的喜好，白宫内部流传着有关暗杀阴谋的恶毒谣言，国会试图弹劾总统，以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霍华德·施特恩（Howard Stern）和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为代表的媒体已经完全失去控制，洛杉矶陷入一片混乱，长期处于潜伏状态的内部敌对和暴力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市和俄克拉荷马州等地爆发，青少年在科伦拜校园事件中开枪射杀他们的同学，非理性繁荣超出了人们的常识，在政治进程中出现明目张胆的集体腐败。简而言之，市民社会已经远离了市民。美国社会似乎正以惊人的速度被割裂和打碎。正如阿伦特所预示的那样，随着美国的衰退，它正逐步退回到无目的、无意义的私人利益的混乱状态。

我猜想，乔治·布什在2000年大选的选举呼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一个越来越无法控制的文明社会提供一个坚定而牢固的道德界限的许诺。布什在任命政府成员的时候，将所有重要职位都留给了偏好威权主义政府行为的新保守主义者，如任命约翰·阿什克罗夫特为总检察长，由此新保守主义者替代了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者。然而毫无疑问，正是“9·11”事件的爆发最终推动美国彻底放弃20世纪90年代的那种动荡状况。它不仅打开了维护国家意志和宣扬国家团结的政治之门，而且为国内市民社会的有序和稳定提供了保证。反恐战争以及此后可能爆发的对伊战争，使美国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伊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使美国政府摆脱在国内陷入的困境，它还是在国内灌输新的社会秩序观念以及控制共和国的重大契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对政府的批评都陷入了沉寂，因为一旦批评政府，就被视为不爱国。国外的

邪恶的敌人再一次成为造成国内民众恐慌的主要力量。这种政治力量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点燃对伊战争之火的博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了起来。在下文中，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

石油决定一切

伊拉克战争的反对者经常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以石油为中心的战争。美国政府既不将这一观点作为谬论加以驳斥，也不完全对其置之不理。毫无疑问，石油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要想准确地断定石油是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一种以此为基础的过激的观点认为，华盛顿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侵占美国共有土地的石油黑手党。布什和切尼与石油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关于切尼曾担任总裁的哈里伯顿公司将在伊战后通过与石油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赚取大约 10 亿美元的报道，均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①] 尽管这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我仍然不能想象整个政治—军事集团或全体美国人民会以这种原因来支持战争。当然，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被驱逐出伊拉克，而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石油公司则在伊拉克受到欢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战争的反对者，就像和平裁军的反对者一样，已经由那些早已获得石油特许经营权的国家牢固地联合在一起。如果伊拉克能够保证裁军，那么联合国将会取消对它的制裁，现有的特许经营商将会从中获益。而通过战争在伊拉克实现政权更迭，则意味着几乎肯定将重新协商特许经营

① N. 班纳杰：《能源公司衡量其未来在伊拉克的可能》，载《纽约时报》2002 年 10 月 26 日（N. Banerjee, 'Energy Companies Weigh their Possible Future in Iraq', *New York Times*, 26 Oct. 2002），第 C3 版。

权。但是伊拉克控制着石油，即使在政权更迭之后，美国石油公司的前景也不一定就非常乐观。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方案就是美国在战后建立相应机构来取代伊拉克石油公司，或者是建立一些前线机构——比如建立一个国际财团，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美国在其中拥有否决权——来控制石油的开采和使用权。但是如果不能成功地使伊拉克内部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重大矛盾的话，就很难在伊拉克展开有关石油特许经营权的谈判。

然而，在有关石油问题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更为宏大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陈述中看到这一观点：谁控制了中东地区，谁就能统治全球石油动脉；谁控制了全球石油动脉，谁就能统治全球经济，至少从不远的将来来看是如此。[①]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伊拉克，而应将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重要性与全球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在伊拉克推行政权更迭的计划无疑是在公开表明，一个美国支持下的民主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将会使整个中东地区受益，甚至有可能带来其他国家类似的政权更迭（伊朗和叙利亚是最为明显的目标，接下来是沙特阿拉伯）。甚至美国政府也确信，一次普通的爆炸性事件将为整个中东地区的版图重组提供有利契机（就像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那样）。毕竟，中东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的附属品。众所周知，凡尔赛体系中有关中东地区国家的布局安排违背了阿拉伯人的利益，它将符合英法帝国主义利益的国家布局强加给了这一地区。这一布局应当被视为时代的错误和功能的失调。

① M. 克莱尔（M. Klare）在其著作《资源战：全球冲突的未来前景》（*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一书中出色地回顾了石油地缘政治的历史。

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法应该照顾到某些分离主义的利益（比如，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境内以联邦的形式实行自治，或者以巴士拉为中心，脱离伊拉克建立南部什叶派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它应该容许建立一个大巴勒斯坦来最终解决巴以问题，不但将约旦河地区，可能的话还要将沙特阿拉伯的部分地区包括进去。与之相反，联合国坚决表示要将维护伊拉克现有领土的完整作为任何战后解决方案的首要目标，对于这一点，美国至少在名义上表示赞同。

美国长期以来就在中东地区存在地缘政治利益。对美国在二战期间所开始推行的称霸全球的整体计划而言，中东地区至关重要。

> 控制被原先的大英帝国视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东地区，对于控制全球经济、军事和政治至关重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因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这一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公开和隐蔽的行动。1953年，美国推翻奉行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政策的伊朗民选政府，标志着这一系列行动的开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功。从1940～1967年，美国公司所控制的中东石油储藏量，从10%上升到接近60%，而英国所控制的中东石油储藏量，则从72%下降到30%。①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已经放弃了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所有军事存在，美国成为这一地区的唯一主宰。由于越南战争，美国选择利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代理人政府（surrogate state）来照看它在这一地区不断增长的利益。它还期望利用对

① 《美国的帝国雄心和伊拉克》，载《每月评论》（The Editors, 'U. S. Imperial Ambitions and Iraq', *Monthly Review*), 54/7, 2002, 第1～13页。

以色列异乎寻常和几乎绝对的支持来建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政府的稳固前哨。但是，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和提升石油价格，以及 1979 年伊朗巴达维政府的垮台，使这种通过建立远程代理人政府来实行间接统治的方式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为此，卡特总统提出了针对海湾地区的卡特主义，宣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中断海湾地区石油的流动。这意味着美国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因为石油的运输和分配体系和石油生产本身一样重要）和保证在这一地区永久驻军，并组建“快速部署部队”（Rapid Deployment Force）来应对任何突发性事件。在野蛮而残酷的两伊战争中，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秘密的鼓励和支持，但是伊拉克力量的急剧增长又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其入侵科威特之前就制定对伊战争计划（由克林·鲍威尔制定）。为什么美国驻伊大使会向国内表示对于任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为，美国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此举是为了诱敌深入，而非单纯地害怕出现灾难性的误解。

虽然海湾战争并未给伊拉克带来致命性打击，但美国却借此机会强化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这种状况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美国与英国在“禁飞区”的联合巡逻保证了可以实施持续的低空作战和对伊军事设施进行导弹攻击。甚至克林顿政府官员、一向鼓吹通过“软力量”来解决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那么在使用武力这一问题上，美国不应犹豫不决，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并不必然要取得其他国家的支持。[①] 1997～1998 年，美国军方费了很多周折才

①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矛盾与未来》（J.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no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迫使伊拉克接受第一轮武器核查人员进入其境内，以证实伊拉克是否遵守了海湾战争后所签署的和平协议中有关裁军的内容。导弹攻击和空中冲突的危险不断升级。为了不使此前的努力付诸东流，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一起建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并向它们出售大量军事装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共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售了42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其中沙特阿拉伯为230亿美元），以换取它们对美国在这一地区驻军的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实现了预先部署，它还在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大量的军事设施，这就使美国在这一地区具备了快速反应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其军事战略调整为同时能够应付两场地区性战争，伊拉克和朝鲜成为这一战略的操练对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有超过2万名士兵被派驻到海湾地区，为此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为40亿～50亿美元。

我之所以在此简要地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验证两个基本的观点。首先，自1945年之后，美国开始逐步稳定地增加其在中东地区的介入力度，这种态势在1980年之后突然被打破，从此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采取直接军事存在的方式插手中东事务。其次，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是长期策划的结果，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谋划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罩在战争之上的面具已被揭开，好战姿态已经取代了某种形式的缄默，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应该归功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氛围使公开的单边军事行动更容易在政治上被接受。从长期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除非伊拉克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就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否则美伊之间的对抗将在所难免。但是为什么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我想，石油仍然是问题的所在。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对全球石油的储藏量进行大概的

推测。石油公司通常都不愿意向外界透露它们掌握的信息，有时它们还会故意发布一些误导性信息。而各种对全球石油储藏量的估计，经常会差别很大。然而，绝大多数统计数字表明，自1980年前后以来，石油开采率要远远高于石油探测率。石油正逐渐成为稀有资源。我们知道，很多油田已经过了采油高峰期，世界上现存的很多油田在大约十年之内就将会枯竭。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本土的油田、北海油田、加拿大的油田、俄罗斯的油田以及中国的油田（情况更为不妙）来说都是如此。尽管其他一些油田的开采期限可能会更长一点，但是只有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等国的油田才能保证在未来5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不会枯竭。尽管一些新勘探的油田可能会改变目前世界石油的分布现状，但中东地区作为重要的石油产地，大多数战略家都必须面对其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的事实。

从需求一方来看，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石油进口，东亚和东南亚这两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几乎都缺乏重要的战略石油储备（目前，中国石油的需求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欧洲（除了英国和挪威之外）同样也完全依靠石油进口。当前，世界各国都正在努力开发石油的替代能源，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替代能源根本不可能取代石油在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更不用说石油公司和其他既得利益者会在此过程中百般阻挠）。因此，当前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获取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都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

这就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美国寻求从军事上和战略上牢牢控制住中东地区，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单边行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例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一个邪恶的、妄自尊大的独裁者可以取得对推动世界工业基础的自然资源的高度支配权，就此而言，美国没有什么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他又说：……不得不谨慎地向公众说明并向世界保

证，美国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保护世界经济持续增长”，而不是为了保护美国一己的私利；“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美国的野心……如果我们占领伊拉克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亲美的石油寡头来操纵伊拉克的加油站（就像我们在其他阿拉伯产油国所做的那样），那么这场部分是由于石油而引起的战争便是不正义的”。[①] 简而言之，这涉及美国到底是为了行使领导权，并寻求在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按照所有国家的利益规范中东地区石油的使用权，还是仅仅为了获取这一地区石油的控制权，从而实现其狭隘的战略利益。弗里德曼希望是前者，但如果是后者呢？

如果美国成功地推翻了查韦斯和萨达姆的统治，如果美国能够巩固或改革武装到牙齿的沙特政府，从而使其不再建立在专制统治的流沙之上（沙特政府面临着政权可能很快便会旁落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手中的危险），如果美国能够在占领伊拉克之后继续占领伊朗（有证据显示美国将会这么做），并巩固其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军事存在，以控制里海盆地的石油资源，那么它将有可能通过牢牢控制全球石油管道而在未来 50 年内有效地控制全球经济。欧洲、日本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现在尤其包括中国）都严重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而它们作为地区性政治经济大国，目前已经给美国在全球生产和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带来了严重挑战。对于美国而言，要想防止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确保其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还有什么比控制这些竞争者所赖以发展的重要经济资源的价格、生产和分配体系更为有效的方法呢？而要想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比利用其最为强大的武器——军事力量更为有效的手段呢？因此，我们还需要

① 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石油而战?》，载《纽约时报》2003 年 1 月 5 日“本周新闻回顾部分”（T. Friedman, ‘A War for Oil?’,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Week in Review section），第 11 版。

从军事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军队只有依靠石油才能运转。朝鲜或许拥有强大的空军，但如果缺乏燃料，它便将难堪大用。美国不仅需要确保自身用于军事的石油供应，而且在任何未来与其他国家比如同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如果美国能够切断其对手的石油供给线，那么作战的天平必将向其倾斜。然而，这种讨论只有当美国确信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遭到某种形式的威胁之后，才会变得有意义。在第二章里，我将从经济层面而非军事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第二章
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

尽管帝国主义是一个很容易脱口而出的词语，但它具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含义，为了方便起见，在本书中，我将从分析而非辩论的角度来使用这一术语。在此，我将所谓的“资本帝国主义”这一专有名词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为体的权力建立在拥有一定领土，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上面）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支配和使用资本占据着其首要的地位）这两种要素矛盾的融合。对于前者，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国家（或某些作为政治权力集团的国家联合体）在全世界维护其利益和实现其目标的斗争中提出和采用的各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对于后者，我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的流动，也即通过日常的生产、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通和文化冲击等，流入和流出不同的领土实体（比如国家或地区性权力集团）的方式。

阿瑞吉（Arrighi）所提出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①] 首先，二者行为体的动机和利益

① 乔万里·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G.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1994，第33～34页。

不同。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总是希望能够将货币资本投资到那些可以产生利润的地方，并谋求积累更多的资本，而政客和政治家则谋求维持或增加本国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权力。资本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尽管经常受到法律的约束），除了他们直接的社会圈子之外，他们不再为任何其他人负责；而政治家追求的则是集体利益，他们总是受到所在国政治与军事局势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要对全体国民，或者更经常的是要对一个精英团体、一个阶级、一个家族或其他一些社会团体负责。资本家的活动不受时空的限制，而政治家则只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及在像民主国家那样短暂的选举周期内活动。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公司可以任意地建立和解散、变更地址、合并或者是歇业，而国家则是长期存在的实体，它不能够迁移，除了地理征服这一异常情况外，它总是被限定在固定的边界之内。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对这两种逻辑进行比较。尽管公众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具有很大差异性，但是现存的这种国家与帝国的政治允许公开的争论和讨论。一些特殊的决策，比如是否进行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是否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如何解决战后困境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公众讨论之后才能通过。外交政策中心和政治/军事专家将会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没有不同意见的局面。然而，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最终都要制定一个明确的决策。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相当多的决策有时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有时是在各种利益和观点相互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艰难的政治进程得以制定和执行的（有时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甚至是依靠执政者独特的信念或超凡的魅力，或是两个有势力的政治人物之间个人斗争的结果）。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地理进程要更加扩散，因此便相应地更不容易形成明确的政治决策。个体（通常是商业、金融和公司）机构随处可见，其分子形式导致多重力量之间的相互碰

撞，这种碰撞有些时候会使各种力量得以抵消，另外一些时候则强化了某些总体趋势。除非通过间接的方式，否则很难操纵这些进程，而这往往也要在某种趋势已经建立起来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内部的制度安排在搭建资本积累舞台的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货币和财政杠杆（阿兰·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经常使用的策略）以及一系列财政和货币干预（其中包括税收管理、再分配政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以及直接规划等），无疑使国家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机构。但即使在那些威权主义国家和那些将国家政策、财政和工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分子化过程经常会失去控制。如果我准备购买一辆丰田汽车而不是一辆福特汽车，或看一场好莱坞电影而不是宝莱坞电影，将会给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把钱从纽约转账给黎巴嫩或墨西哥的穷亲戚，将会给这些国家间的财务平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看起来似乎很难对此作出预测。甚至想通过变化莫测的信贷体系来掌握资本和货币的流向，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所有心理上的无形的东西，比如投资或消费信心，都将成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凯恩斯才认为（借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和金融家的预见性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极其重要。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焦急地监控事后的数据，以期能够找出事情发展的趋势，预测出市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矫正，以确保这一体系能够相对稳定地运转。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根本的一点是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还通过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有关帝国主义和帝国的论著也经常假定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和谐：政治—经济进程受国家和帝国的战略所支配，国家和帝国经常脱离资本主义动机而运转。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逻辑经常会

相互竞争，有时甚至会完全对立。例如，如果完全从资本积累的直接需求方面来考虑，我们就很难对越南战争或伊拉克战争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冒险行动抑制而不是增加了资本财产。出于同样原因，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美国商业利益的急迫需求是通过贸易与商业扩张和对外投资机会的增加，尽可能使世界更广大的地区走向资本积累，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美国在二战后对苏维埃国家所采取的全面的领土遏制政策——这一政策为美国入侵越南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存在疑问的，甚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辩证的关系），而非一种功能性的或片面的关系。这两种明显不同但却相互纠缠的权力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打下了基础。然而在具体分析实际情况的时候，如何确保辩证双方同时发挥作用，避免落入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分析模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当一个国家产生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时候，通常都很难确定哪种逻辑所发挥的作用相对大一点。苏联的解体是由于里根政府所采取的高强度军备竞赛和阻断其经济复兴等战略所导致的，还是由于其国民内部的分子层次的变化（例如，从外部秘密渗透进来的金钱至上和资本主义文化形态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导致的？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当美国公开声称要在政治和领土层面建立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同时，经济力量甚至文化和道德影响力都正在从美国流向更加广泛的地区性国家集团（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尽管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仍然像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样行事，但我们是否正在见证美国在世界上霸主地位的崩溃和“新地区主义”在政治与经济力量中的上升？最近一次地区化倾向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在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这一前车之鉴，当前新的地区化倾向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扭转或控制这种地区性分裂行为？

这些都是一些大问题，我将在下文中尽力对此作出解答。

在第三章中，我将会把重点放到讨论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上面。但是我需要在此对其作出简单介绍，以便于更加详细地说明权力的领土逻辑在发挥作用时所受到的限制。从资本主义逻辑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的特征在于通过开拓非均衡性地理环境，并利用空间交换所必然产生的，我称之为“非对称性”的关系来进行资本积累。非对称性关系主要表现在不公平和不平等交换，在空间上连为一体的垄断力量，限制资本流动等不合理行为，以及榨取垄断租金等。通常存在于运转良好的市场中的平等环境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环境。特定领土在损害其他领土利益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幸福。

非均衡性地理环境不仅仅是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分布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劣所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由于财富和权力本身通过非对称性交换，日益高度集中于某些地区所造成的。至此又重新回到了问题的政治层面。尽量持久地保持这种对其有利的非对称性交换模式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责。例如，如果美国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全球资本市场，那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将从中获得特定优势。简而言之，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和国民团体，国家能够最好地协调这些进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国家将有可能会损失其财富和权力。

当然，在一些国家内部也存在大量的部分是由于非对称性交换关系而导致的非均衡性地域发展。诸如大城市和地方政府之类的次国家政治实体均急切地希望加入到这一进程之中。但是我们通常并不将其称作帝国主义。尽管有人喜欢将其称之为内部新殖民主义，乃至大城市帝国主义（比如纽约和旧金山），而且这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更愿意将次国家区域性实体可能发挥的作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放到非均衡性地域

发展这一更为广泛的理论中加以研究。这样做的结果是，至少可以暂时将“帝国主义”这一名词解释为国家内部的财产关系和全球资本积累体系内部的权力流动。从资本积累的观点来看，帝国主义政治需要最低程度地维持和开发那些通过国家权力所积聚的非对称性和自然资源优势。

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

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地理阶段，这两种逻辑中必定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就领土控制积累本身的目的而言，明显具有经济性后果。从强征贡赋、资本流动、劳动力、商品等角度来看，这可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效果。然而这看起来与领土控制（并不一定需要实际接收和管理领土）被视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手段的情形完全不同。尽管我们将会看到，有时领土逻辑更受重视，但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构想相区别的却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但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固定在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如何能够应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对外扩张的动力？资本的无限积累对于权力的领土逻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说，如果全球体系下的霸权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本性，如此运用的资本逻辑怎么能够支撑霸权？

汉娜·阿伦特敏锐的观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她说：“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阿伦特继续写道：“它确定了19世纪晚期‘进步的’意识形态，并以此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崛起。”[①] 然而，如果权力积累必然伴随着资本积

① 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1968，第23页。

累，那么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是霸权不断扩张和膨胀的历史。而这正是阿瑞吉对从意大利城邦到荷兰再到英国，直至现在到美国相继称霸这一历史进程进行比较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

> 正如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霸权角色对于一个规模和资源像联省共和国的国家来说太大一样，在20世纪初，那一角色对于一个规模和资源像联合王国的国家而言，也是太大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霸权角色都由一个国家——18世纪是联合王国，20世纪是美国——来担任，那个国家已经开始享受丰厚的“保护费”，也就是独享由绝对或相对的地缘政治上的岛国特性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但是，符合这两种情况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也占有足够的分量，能够在相互竞争的国家中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向改变均势。而且，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9世纪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在20世纪充当霸主所要求具备的领土和资源要比18世纪时多得多。①

但如果阿伦特是正确的话，那么任何霸权都必须无休止地延伸、扩张和增加其权力，以保证能进行资本的无限积累。但是，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警告的那样，这就产生了一个经常存在的危险，即过度扩张和过度延伸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霸权国家和帝国（罗马、威尼斯、荷兰、英国）的阿基里斯之踵。② 他（在1990年）关于美国也已经处于这种危险之中的警告，如果起初曾引起人们

① 乔万里·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1994，第62页。

②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和军事冲突》（P.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1990。

注意的话，那么很快便被人们抛诸脑后了。在《大国的兴衰》发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美国明显地将其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扩张到了存在过度延伸的危险的境地。这进一步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果美国已经没有足够大的规模和足够多的资源来控制在21世纪得到相当程度扩展的世界经济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依然严重存在资本的无限积累的情况下，何种政治安排之下的何种政治权力的积累才有能力取而代之。我将在下文里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但即使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些可能存在的阴谋。有些人声称，世界政府的出现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另外一些人则声称某些成员国间通力合作的国家联合体（与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论相类似，暗指诸如七国集团——现在的八国集团之类的会议组织）能够管理这些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加上一个不那么乐观的观点，即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使我们无法构筑这一空前强大的政治权力的积累，那么资本的无限积累将有可能陷入一片混乱，从而在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下，而非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束资本时代。

霸　权

那么，构成霸权的首要因素是什么？葛兰西本身对霸权一词的使用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以至于可以对此作出多种解释。有时，它仅仅指通过领导力以及被统治者的认同而运用的政治权力，以区别于支配权这种通过强制方式而运用的政治权力。另外一些时候，它似乎是指根植于政治权力运用过程中的强制与认同的特殊混合体。在使用霸权一词时，我通常采取的都是前一种解释，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我才会采取后一种解释。在论述国家内部关系时，我想借鉴阿瑞吉对霸权概念的解释：“一个社会集团，抑或一个民族国家的优势……可以通过两种方

式来展现：一是‘支配权’，一是‘知识和道德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支配着与之对抗的各个集团，并试图将其‘肃清’和征服，也许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它领导着同盟的集团。”在国际层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成就，“一个支配国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样板’，并因此将其他国家引上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可能会提高支配国的声望，从而增加它的力量……但是如果仿效完全成功，它就制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削弱了自己霸权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其称霸的力量不但没有膨胀，反而由于势均力敌而紧缩”。另一方面，领导权被用来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支配国引领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体系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其被广泛地认为是在追求一种普遍利益。这种意义上的领导权使支配国的力量得以膨胀”。①

这一论点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分力”与“合力”之间的区别。前者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其中霸权国家通过竞争从其他国家夺取权力，或通过领导一个地区联合体并给这一地区带来更大利益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近，地区性霸权利益的复兴（日本在其中领导着其他亚洲国家的“雁行模式”，或处于法德联盟领导之下的欧洲模式）表明，在全球资本的重组中，这种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所扮演的角色，或许要比“全球化”这一总括性词语所暗指的东西重要得多。② 但是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真正的霸权国家，需要运用领导权创造一种非零和博弈，其中所有各方的利益或是超出了它们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

① 乔万里·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G. Arrighi and B.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第 26～28 页。

② 参见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征》（J.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第 2 章。米特尔曼是诸多重视地区化主题的学者之一。

（比如贸易）而取得的共同收益，或是通过诸如创造和转移新技术、组织形式以及基础设施（比如互联网和国际法的内容）等方式，增强了它们对自然的合力。阿瑞吉强调指出，在世界体系内，合力的积累是称霸的唯一坚实的基础。然而，霸主的权力早已过时，它已被在强制与认同之间不断变动的平衡所取代。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在过去50年里，美国是如何实施霸权行径的。美国频繁地借助支配权和强制手段，从未放弃肃清其对手的努力。即使在国内，它也有一段野蛮的历史，尽管很多野蛮行径是在宪法和法治的掩护下进行的，这其中包括麦卡锡主义，谋杀或监禁黑豹党（Black Panther）的领导人，在二战中拘留日本人，对各类反对团体进行监视和渗透，现在更是准备用《爱国法案》和《本土安全法》代替《权力法案》。在国外，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更为野蛮的行径：支持伊朗、伊拉克、危地马拉、智利、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此仅仅列举了一小部分）等国家发动政变，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一有机会便在世界各国支持国家恐怖主义；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遍布世界上数不清的国家。

在对美国的上述行径进行研究之后，从乔姆斯基（Chomsky）、布鲁姆（Blum）、皮尔格（Pilger）和约翰逊（Johnson）等人开始，很多学者都将其描绘为地球上最大的“流氓国家”。[①] 尽管我们或许仅仅知道美国各种野蛮行径中的半数，但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很难从各种官方和半官方的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因为所有记载的东西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会严重扰乱人们的视线。肃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实现。运用经济力量来支配

① C. 约翰逊：《反冲：美帝国的代价与后果》，2000；约翰·皮尔格：《世界的新统治者》（J. Pilger, *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2002；W. 布鲁姆：《流氓国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指南》（W. Blum, *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London: Zed Books），2002；N. 乔姆斯基：《9·11》（N. Chomsky, *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2001。

其他国家（比如对伊朗和古巴实行禁运，或是在美国财政部的授意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实施的严厉计划）可以产生与军事力量相同的破坏性作用。美国金融机构和财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在造成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资产猛烈贬值，导致这一地区大规模失业，社会经济发展倒退数年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然而，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或者对此加以否认，甚至拒绝去听诸如此类的事情，或者即使已经有所耳闻，但仍然不愿承认肃清和强制作为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进行诚实交易的正常成本这一早已存在的事实。

但是，那些将注意力全部放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野蛮行径的评论家经常不会承认，强制和肃清敌人仅仅是美国霸权的一个局部的，有时甚至是起反作用的基础。认同与协作是美国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权力基础。如果美国不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同与协作，如果美国不能通过认同与协作来行使领导权以实现集体利益，那么美国早就丧失了霸主地位。美国必须至少获取国际的认同与协作，借此使其他国家相信，美国是为了它们普遍的利益，甚至在它如很多人所怀疑的那样，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取狭隘的一己私利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通过认同而行使领导权。

当然，在这一点上，冷战为美国提供了绝好的时机。美国不但自身极力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而且时刻准备积累更多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保护和提升全球资本的无限积累，使其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全世界的私有财产所有者在面临有可能爆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可以团结在美国的周围，得到美国的支持与庇护。私有财产权被认为是一种普遍价值，并被载入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之中。美国保证欧洲民主国家的安全，慷慨地帮助日本和德国重建战后满目疮痍的经济。美国还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千方百计削弱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苏维埃帝国的力量的同时，通过“遏制”政策悄然建立了其非

正式帝国的疆界（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尽管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罗斯福—杜鲁门政府时期外交机构的决策过程，并由此推断美国总是将其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但由于充足的利益已经流入足够多国家的有产阶级的腰包，因此美国宣称自己代表普遍（实际上是“有产者”）利益得到了广泛认同，那些附属群体（以及代理人国家）也感恩戴德般地接受了美国的领导。美国的辩护者会借用这种貌似合理的“慷慨”，以反驳那些强调美国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流氓国家的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将自己视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利益的代表者，而不管其中的谎言与真话其实一样多。例如，美国总是喜欢认为是它独自将欧洲从纳粹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完全抹去了红军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一个更加普遍的事实是，美国同时采用了强制和霸权两种手段，尽管它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这两方面之间的平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府的变动而有所改变。

长期以来，美国非常有效地在其阵营中行使领导权以实现资本的无限积累，并因此在世界各地传播美国做生意的方式。当然，美国在冷战时期并没有真正获得全球霸权。随着当前共产主义威胁实际上已经消失，美国的领导角色更加难以界定和维持。在这一问题上，那些希望设计美帝国主义和美帝国在21世纪未来的人并没有进行仔细讨论。而那些看到权力的地区分割正逐步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总体规则下的一种可资替代的政治架构格局的人，则提出了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仿效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已经通过美国化，搭上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列车。在此我与阿瑞吉的观点略有不同，因为我并不认为仿效总是能够产生竞争，并且总是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仿效美国的消费观、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资本的无限积累。然而，在那些由于仿效而

导致激烈竞争的领域，形势可能会骤然紧张起来（台湾地区完全从美国手中接过某些部门的生产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这也会给美国的国内形势带来重大影响（美国长期以来在钢铁、造船和纺织领域内的去工业化就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将这种仿效与其他方面的，事实上促使更大的合力得以形成的仿效区分开来。

政治权力通常是由强制、仿效和通过深化认同而行使领导权这三者的不稳定的混合体所构成。这三个构成要素本身也是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但是在领土逻辑中，究竟需要积聚哪些形式的权力才能确保一个国家实现自己的利益？威信、地位、尊敬、权威以及外交影响力等无形的权力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物质化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可能是霸权得以长期维持的三根支柱。然而，霸权国家的这三根支柱并非总是稳定和不变的。例如，自 19 世纪末期以来，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就一直不断地发生变化。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兴起，1870 ~ 1945 年

阿伦特认为，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①] 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846 ~ 1850 年，资本主义爆发了第一次严重的过度积累的危机（该词主要是指由于缺乏赢利性投资而导致的资本盈余，第三章中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欧洲地区经济出现崩溃，由此而引发了遍及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工人阶级也加入了进来）。此后在欧洲范围内，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器中的局部合并出现了不均衡性发展。为了解决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欧洲各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进行长期

① 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1968，第 18 页。

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家投资生产”理论的指导下，奥斯曼主持了对巴黎的大规模市政改造，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交通、供水和下水道等基础设施上面，并在住房和公共建筑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二是进行地理扩张，其中开拓跨大西洋贸易占据首要地位（美国是最主要的口岸）。但是到了1860年代中期，这些方式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吸收资本和劳动盈余。由于美国内战而被迫中断的跨大西洋贸易对此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内部无产阶级运动（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导致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诞生）则使欧洲各国的国内形势更加困难。美国在内战结束后也爆发了无产阶级运动。

随着固执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寻求解决方法的失败，欧洲的剩余资本被迫到国外寻找出路，从而在整个世界上掀起了大规模的投机性投资和贸易的浪潮，尤其是在大约1870年之后的日子里。由此，寻求我在第三章所称之为“空间—时间的修复”的资本主义逻辑急切地登上了世界的前台。保护这些海外投机并确保不会出现投机过度，迫使国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这种扩张性的资本主义逻辑。基于此，在国内，早已在美国掌权的资产阶级需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相对于以前的阶级的政治权力；在国外，或者是将旧的帝国主义国家彻底摧毁（比如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或者是将它们（比如英国）转变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逻辑。因此，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就成了重新定位领土政治以适应资本主义逻辑要求的必要前提。

在权力扩张过程中，资产阶级开始诉诸国家观念。然而，欧洲地区在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构建民族国家的浪潮（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在逻辑上指向的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统一，而非海外投机。而且，由于还没有淡化国家观念所象征的意义，其所假定的政治团结很难扩展到那些所谓的“其他人”。因此，民族国家本身并不能为帝国主义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那么，

应当如何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恰当的政治反应，以解决过度积累问题和满足全球“时间—空间的修复”的需要呢？答案是在民族资本占据首要地位的帝国计划的背后调动起民族主义、侵略主义、爱国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在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范围与民族国家发挥作用的范围基本上实现了一致。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意味着推迟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资本与她所称之为“暴徒”的联合。她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帝国主义尝试的实际危险——将人类划分为主人和奴隶，高级人种和低级人种，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所有一切都试图将人们以暴徒为基础统一起来——完全视而不见很不正常。”她认为，从理论上讲，“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可能存在一条鸿沟”，“但从实践来看，这个鸿沟可以并且已经被部落式的民族主义和彻底的种族主义所填满”。[①] 当然，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不可避免。但是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第二国际的崩溃，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纷纷表态支持本国政府。这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众多以国家为基础，并因此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得以形成（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也建立了以工业为导向的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推行自己特殊的种族优越论，并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使人相信这种伪科学，它们还时常将自己视为为了生存而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竞争的有机体。

长期以来潜伏在后台的种族主义，现在跃上了政治思想的最前线。这就方便了帝国主义各国将我在第四章中称之为“剥夺性积累”（剥夺那些未将劳动力与土地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原始人、野蛮人和劣等人）和用此前帝国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野

① 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1968，第32页。

蛮方式榨取殖民地贡赋（比利时和日本或许是最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合法化。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从种族主义角度考量，我们可以将纳粹和大屠杀看做是某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尽管它们并非是由这一历史—地理轨迹所决定的。

由于剩余资本谋取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迫使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力量竭力占领更多的领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潜在的矛盾根本无法得以解决。正如列宁所准确预示的那样，这最终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长达五十年的对抗与战争，其中民族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或建立势力范围（尤其是1885年瓜分非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其中包括英法两国瓜分中东地区）；运用帝国力量掠夺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资源；以及四处散播恶毒的种族优越论。然而，所有这些措施用来应对封闭的帝国疆域内部的剩余资本问题时，都以失败告终。随后的1939～1945年，整个世界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尽管帝国主义的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英国霸权和至少有限的自由贸易，但我认为阿伦特正确地看到了在1870～1945年这段时间里，以国家为基础的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即完全通过种族主义手段，并通过构筑民族团结以在国内推行法西斯主义，在国外推行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已经逐步消亡。

在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霸的过程中，美国逐步建立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帝国主义模式。内战结束后，美国资本主义得到了飞速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美国都取得了领先地位。美国政府并没有像欧洲国家政府那样，受到封建残余或贵族残余的重压，它广泛地代表了企业阶级和工业阶级的利益，而且自独立以来，资产阶级就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这已经在宪法中被明确了下来）。美国的

政治权力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保护个人主义，强烈反对任何威胁私人财产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利润率的行为。美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这使它不可能存在像欧洲和日本那样的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美国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拥有充足的内部扩张空间，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领土逻辑都可以从中找到施展的舞台。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形式（主要针对黑人和土著居民）与排斥“非高加索人种”，拒绝吸收那些主要是非高加索人聚居的地区（比如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观念交相呼应。

天定命运论赋予了美国自身独特的扩张性种族主义和国际理想主义以动力。从19世纪末期开始，美国逐渐学会在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名义下，隐藏其明确的领土扩张和领土占领意图，并如尼尔·史密斯（N. Smith）所指出的那样，最终将领土扩张和领土占领隐藏在众所周知的“全球化”这一华丽的辞藻里。[①] 在地理扩张似乎是经济扩张不可或缺的那段历史时期里，美国也曾仿效欧洲帝国主义的模式，并通过“门罗主义”宣布整个美洲大陆应当脱离欧洲的控制，美国应当在美洲大陆占据主宰地位。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梦想则是，将“门罗主义”变成普遍适用的原则。但是在南美地区，美国遇到了一系列共和国，它们就像美国一样，通过独立斗争的方式将自己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美国必须制定另外一种帝国统治的方式，名义上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但实际上通过综合运用特权贸易、经济援助、庇护主义以及隐蔽的强制手段等，对这些国家加以支配。尽管在国际贸易问题上，美国一向主张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既没有对加强“门户

① 尼尔·史密斯：《美帝国：罗斯福的地理学家和全球化的先驱》（N.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开放”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也没有在这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后凡尔赛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民族自决的原则尽管没有付诸实施，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但至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美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主要是由于国内阶级统治的失败，而非美国资本缺乏地理扩张的机遇所造成的结果），并最终陷入了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而导致的世界大战的泥淖。

但是由于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均保持强硬的孤立主义立场，而且长期以来美国害怕纠缠于外部事务会给自身的统治方式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推动美国成为帝国的力量时断时续，非常有限，而且主要是隐性的，而非公开的，主要是政治上的，而非资本主义所驱动的，除了拥有特殊海外利益的个人公司不顾廉耻地动员政治力量，以便于随时随地地保护他们特殊的项目之外。美国不但是剩余资本的生产者，而且还是剩余资本潜在的吸收者，尽管它在20世纪30年代完全没有发挥吸收剩余资本的潜能。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一些阶层甚至反对罗斯福新政中关于通过重新分配财产来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的谨慎的尝试。在一个存在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和阶级分层的多民族聚居的国家里，很难形成国家内部的凝聚力，这也产生了霍夫施塔特（R. Hofstadter）所称之为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害怕一些“其他事物”（比如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仅仅是“外部的煽动者”）成为缔造后方政治团结的关键性力量。[①] 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和首要对付的“恶棍”（对中国的担忧，其中包括中国移民问题退居其后）。

① R. 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及其他论文》（R.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历史，1945～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强大的国家。它控制了整个世界的科技和生产，美元（在世界上绝大多数黄金供应的支持下）取得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其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唯一的真正对手是苏联，但与美国相比，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人口，而且其军事能力和工业能力都遭到了严重削弱。苏联承受了对抗纳粹的战争损失，事实证明，列宁格勒保卫战和随后摧毁德国军队在东线的绝大部分作战能力，对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美英联军迟迟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激怒了斯大林。推迟开辟第二战场或许是美国和英国为了让苏联遭受更多的战争冲击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但这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苏联借此占领了欧洲大片领土并在战后拒绝退出，并在整个东欧地区甚至在东德建立了卫星国。对于苏联而言，保护其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其领土控制。

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内部的精英集团和私人部门设计了一个战后解决方案，以确保世界的和平、经济发展和稳定。在这一方案中，领土扩张被严格禁止。自詹姆斯·麦迪逊开始，长期以来，避免进行海外扩张一直是美国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因为美国人担心进行海外扩张将会破坏美国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弥合这种担心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霸主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之间的裂痕，已经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欧洲帝国主义借用种族主义来缓解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样，美国试图利用抽象的普遍主义来隐藏其帝国野心。尼尔·史密斯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否认领土和地理作为帝国权力的一部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1941年《生活》杂志的封面评论上，亨利·卢斯（Henry Luce）以这一

观点为基础，发表了著名的题为《美国世纪》的文章。作为一名孤立主义者，卢斯认为历史赋予了美国全球领导者的使命，美国必须积极地接受这一使命，尽管这是历史强加于美国的。卢斯认为，历史赋予美国的是世界性的和普遍的权力，而非特指领土上的权力，因此他更喜欢谈论美国世纪，而非美帝国。史密斯写道：

> 然而，帝国的地理语言暗示的是一种可塑的政治——帝国的兴起与衰落，以及容易遭受挑战——“美国世纪”则暗示了一种必然的命运。在卢斯的语言里，排除了任何有关美国主导地位的政治遁词。一个国家怎能挑战一个世纪？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并非是通过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力竞争而取得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欧洲文明达到顶峰的标志。就像世纪更替一样，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是历史的必然。在超越了地理界限的情况下，美国世纪超越了帝国，远离了非难。①

苏联的领土扩张和急速增长的力量与美国政治的“偏执狂风格”产生了冲突，冷战由此爆发。从美国国内来看，这导致了奉行压制政策的“麦卡锡主义”的诞生，言论自由遭到限制，任何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相关的东西都遭到明令禁止。联邦政府对激进思想进行了清洗，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均被取消。联邦调查局对所有反对派团体进行了渗透。作为应对苏联威胁，维护美国内部安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上述所有行为都得以合法化。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美国实现了国内政治上的一致与团结。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利维坦将秩序强加于由于个人

① 尼尔·斯密斯：《美帝国：罗斯福的地理学家和全球化的先驱》，2003，第20页。

利益而可能导致的混乱之上。劳动力在强制和诱骗下，与资本建立了全面契约，将他们的工资与提高生产率结合了起来（一种完全值得仿效的福特制模式）。在反共产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的名义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

在国际上，美国将自己视为自由（主要是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权的首要守卫者。美国为世界各国需要保护的有产者阶级或政治/军事精英提供经济和军事保护。作为回报，这些有产者阶级和精英支持他们所在的国家奉行亲美政策。这意味着从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对苏联的势力范围进行遏制。[①] 美国对其帝国疆域的界定采取了消极的方式，即所有没有直接被苏联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地区都被包括进来（即便中国早就脱离了它的控制，美国仍将其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美国承认与苏联帝国之间不可能爆发正面对抗，但它还是抓住一切机会来削弱苏联的力量——这一政策引起了一系列重大灾难，比如在阿富汗，美国支持“圣战者”组织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抗苏联，没想到后来却必须在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目标的反恐战争中对“圣战者”组织进行镇压。在美国看来，共产党所控制的领土每增加一寸都意味着它又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有关“谁将中国交给了毛泽东”这一问题在美国引起激烈反责，这一反责后来又成为麦卡锡主义的急先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确立了两项关于国内战略实践的首要原则，这两项原则一直沿用至今。第一，确保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允许出现对财富和权力的彻底再分配，不允许出现对精英阶层或资产阶级的挑战）；第二，确保国内资本积累和消费持续增长，以保证国内和平、繁荣与平静。[②] 参与国际事务不能干扰国内消费，因此美国更偏爱伊格纳季耶夫所谓的

① 引自《美国的帝国雄心和伊拉克》，2002，第3~13页。

② 这是W. A. 威廉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帝国》一书中的中心论点。

“廉价帝国”。美国总是利用其超强的军事力量来保护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代理人国家。1953 年，美国在伊朗推翻奉行油田国有化政策的摩萨台总统，让伊朗前国王取而代之（所有行动均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进行的），然后借助他来照看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利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关键的地理区域，比如与苏联对峙的前线国家，美国总是动用其经济力量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经济体（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对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其他一些易受苏联攻击的前线国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援助）。由于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进入这一地区对于美国而言也至关重要（罗斯福尽管身患重病，但仍然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后归国的途中，在中东地区略作停留，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谈论有关持续开采石油的重要性）。

美国将自己置于集体安全体系的领导地位，利用联合国甚或北约之类的军事联盟来限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爆发，并且抵制苏联，其后是中国的影响。它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隐蔽行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压力，以保证建立或维持友好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甚至准备支持推翻民选政府的行为，并直接或间接地推行肃清那些据认为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政策。在伊朗、危地马拉、巴西、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智利，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美国都是这么做的。美国还通过选举和其他一些隐蔽的方式对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进行干涉。然而美国在中国和古巴的行动都遭到了失败，而且随着苏联模式作为一种在没有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下快速现代化的方式日益具有吸引力，共产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发展。

在“自由世界”内部，美国试图为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资本的高速积累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秩序。这就需要拆除此前存在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帝国。非殖民化需

要在全世界建立民族国家和实行民族自治。在处理与这些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美国主要借鉴了其在战前处理与拉丁美洲独立共和国之间关系的经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了控制这些新独立国家，美国同样将特权贸易、经济援助、庇护主义以及隐蔽的强制手段作为自己的首要武器。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美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运用这些武器，从而使自己成为轮轴，世界其他国家则通过一根根辐条与其相连。所有试图对美国这一压倒性力量进行挑战的集体行动，都被美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所瓦解，通过这一战略，美国利用单个的联合来限制集体自治，即便这些国家正在走向联合，就像欧洲地区那样。

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在这些新独立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建立了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国际架构，以保证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此同时，美国还建立了一整套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并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上其余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美国作为超级帝国主义国家这一地位的确立，是建立在领导所有现存的有产者阶级和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集团的基础之上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不仅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成了这一世界的霸主。事实上，美国一直积极鼓励世界各国出现这类精英集团和有产者阶级，并不断促使他们发展壮大：美国已经成为在世界各地推进资产阶级力量发展的主角。在罗斯托（Rostow）经济成长“阶段”论的指导下，美国竭力促进各国经济实现“起飞”，从而促使它们提升大众消费，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①

① W. W.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但是，要废除以欧洲为基础的帝国主义，还需要正式否定曾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发挥调和作用的种族主义。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许多报告一方面否认了种族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试图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第二个阶段找寻一种合适的私人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普遍理念。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国必须将自己描述为文明的标尺，个人权利的堡垒。美国还需要在国外培育亲美主义者。由此，美国开始对“颓废的”欧洲价值观展开大规模的文化攻击，同时大肆宣扬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金钱成为文化生产的主导力量和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影响因素（这是一个纽约从巴黎手中“偷走”现代艺术思想的时代[①]）。文化帝国主义在维护全面霸权的斗争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武器。好莱坞、流行音乐、文化形态甚至所有的政治运动，比如公民权利领域的运动，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美国的对象。美国将自己构想成自由的灯塔，其独一无二的力量能够将世界其他国家带入永恒的、和平与繁荣的文明世界。

然而，美国还逐渐被认为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发动机，是能够将世界其他国家纳入自己轨道的超级大国。由于它所提供的市场机遇，美国经济的大规模内部转变（仅仅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有所停滞）对于世界而言，变得极为重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在教育、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和遍布全国的郊区城市化中的投资，以及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吸收了大量资本和产品。让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懊恼的是，美国在这些年里变成了发展型国家。除了很少一些关键领域，比如战略资源领域之外，美国很少依赖榨取世界其他地区的价值。直到20

① S. 奎柏：《纽约是如何偷走现代艺术思想的》（S.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trans. A. Goldhammer, G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产总值中由对外贸易所带来的部分还不足总数的10%。尽管美国也有一些公司在海外投资，比如国际电话电信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ITT）在智利进行投资（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为联邦调查局所操纵），或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在中美洲进行的投资，而且这些公司给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对外政策带来重要影响。

但除了控制战略矿物和石油外，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可谓名不副实。为了实现经济层面的海外扩张，美国将目标对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大量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向欧洲，导致欧洲在抵制塞尔旺－施赖贝尔（Servan-Schreiber）所谓的“美国的挑战”[①] 这一问题上变得困惑起来。作为回报，美国向其他国家开放了国内市场，并接受了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产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经济强劲发展之势。通过“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实现了快速增长。利润被重新投资于经济增长以及新技术、固定资本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更新上来。[②] 然而在上述时期，（与商品相反）资本外流仍然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在欧洲地区，这就使得各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相当谨慎。金融投机所发挥的影响仍然非常有限，而且受到地域限制。各个民族国家在分配问题上，“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国家财政支出的论调与四处可见的阶级斗争交相辉映。在这一时期，工会组织变得相当强大，社会民主福利国家遍布整个欧洲。社会工资成为人们斗争的其中一个目标，甚至在美国都是如此。工会组织在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1945～1970年，在美国全球统治和霸权的支配下，资产阶

① J. J. 塞尔旺－施赖贝尔：《美国的挑战》（J. J. Servan-Schreiber，*American Challenge*，New York：Scribner），1968。

② P. 阿姆斯特朗、A. 格林、J. 哈里森：《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与崩溃》（P. Armstrong，A. Glyn，and J. Harrison，*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The Making and Break Up of the Great Boo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

级的政治统治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增长。在美国的领导下，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达成了一种全球性的默契，以避免相互之间爆发毁灭性的战争，并在资本主义日趋一体化的背景下，共同分享在核心地区的利益。通过非殖民化和“发展主义”，资本积累的地理扩张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遍目标。扩大再生产似乎运转得非常之好，其次生效应甚至外延到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尽管程度有限，且大小不一。从美国国内来看，劳动力在劳资关系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由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利益被扩展到了下层社会，甚至被扩展到了一些少数民族（尽管这种扩展并不充分，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动荡所证明的那样）。尽管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经常给美国带来威胁，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通过一系列内部调整和在国内外进行空间—时间的修复，这一威胁基本得到了控制。美国希望利用这些策略来使资本主义体系克服导致20世纪30年代大灾难的经济问题，并使资本主义世界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

然而这第二个阶段也并非没有矛盾。首先，在国际上正式否定种族主义使美国在国内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困境。因为种族歧视当时在美国还非常猖獗，最终被世界很多国家视为范本的美国民权运动有其国内动因，如黑人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领导的城市暴动；但国际因素也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人权实践与人权的普遍性背道而驰，以及“有色人种的”外交官在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去往华盛顿特区的途中，发现不允许他们入住汽车旅馆。美国在移民政策上的种族选择遭到了人们的抨击。移居美国的人们开始改变他们的特征。

其次，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使美国在国际竞争面前容易遭受攻击。这一时期，资本流动主要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基本上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得

到了飞速发展，给美国在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带来了挑战。随着美国国内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吸收剩余资本能力的下降，过度积累日渐成为困扰美国的一项重大问题，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也日益激烈起来。

再次，当民主和建立在有产者利益之上的秩序与稳定发生冲突时，美国通常选择的是后者。因此，美国从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转变成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压迫者，即使这些运动只是为了寻求一种非资本主义（更不用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方式来改善经济福利。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在变更资本主义方面所进行的尝试经常遭到残酷镇压（就像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博什，巴西的古拉特以及智利的阿连德的遭遇一样）。甚至在欧洲地区，美国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颠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对于一些野蛮的独裁政权，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沙特阿拉伯、伊朗的王权统治，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由于它们拥护美国的利益，因此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得到了美国无条件的支持。由于长期受困于中心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空环境，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并最终导致了反依附运动的爆发。发展中国家的阶级和民族解放斗争日渐聚合为一种反美政治。反依附与反殖民主义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就像此前的欧洲帝国一样，政治权力的领土特性对于维持美国霸权而言至关重要。在此我同意伊格纳季耶夫的观点，即美国并没有通过否认而获得帝国声望，它只是通过否认地理的重要性和利用各种花言巧语来隐藏其在领土方面的意图，尤其是对它自己，而非其他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最后，冷战和美国在国外到处陷入困境这两种后果，将赋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职演说中所批评的、危险而强大的“军工综合体”以更多的权力。通过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以及通过夸大威胁和捏造外部危险以构筑一种持久的战时经济来给予其

更多的权力，这一综合体存在支配美国政治的危险。为了从经济上生存下去，国防工业需要旺盛的武器出口贸易。对于美国的资本积累而言，武器出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也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的过度军事化。

在1970年前后，这一资产阶级统治全球的第二个阶段走到了终点。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所有帝国政体都曾面临的典型问题——过度延伸。事实证明，对共产主义采取遏制政策（并试图将其摧毁）并没有取得美国所预期的成果，相反，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日渐增多，这就使其与永无止境的消费主义这一黄金法则相结合的政策——大炮加黄油政策——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因为军费支出只能为剩余资本提供短期出路，根本不能为减缓国内资本积累的矛盾提供长期的解决办法。美国的发展型政府由此出现财政危机。美国对此作出的直接反应是利用铸币特权印制更多的美元。[①] 这就导致通货膨胀遍及整个世界。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所看到的那样，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大量流通中的“虚拟”资本再也难以收回，新一轮破产浪潮（最初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行业），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在二战后支撑美国超级帝国主义的一系列固定国际安排的相继崩溃。与此同时，在世界上所有的核心国家里，工会力量的不断增长迫使社会支出和工资开支不断上涨，利润由此下降。滞胀由此产生。很多政府由于大规模投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而债台高筑，由此导致整个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纽约在1975年陷入大规模破产标志着财政危机达到顶峰）。此外，随着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它们日益增强的竞争力不但给美国在生产领域的主导地

① 关于铸币特权的重要性问题，可参考《帝国主义，美元化和欧元》，载利奥·帕尼奇、柯林·莱伊编《2002年社会主义记录》（‘Imperialism, Dollarization and the Euro’,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London: Merlin Press), 2002, 第153～174页。

位带来挑战，而且在某些生产领域还超越了美国。由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领域不再仿效美国，美国失去了维持霸权的一个关键支柱。美国的经济地位似乎不再稳固。过剩的美元涌入世界市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构筑的整个财政系统遭到崩溃。

新自由主义霸权，1970～2000年

此后，一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主要在美国的监护下诞生了。黄金作为衡量货币价值的物质基础被抛弃，世界从此进入没有物质实体加以衡量的货币体系时代。早已通过欧洲美元（eurodollar，存储于美国之外的美元，可以在任何地方轻松地进行借寄）市场自由流动的货币资本，将有可能完全从国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尼克松政府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政府相互勾结（现在已经官方文件证实），共同推动国际原油价格在1973年出现飙升，此举给欧洲和日本经济带来的损害，要远比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害严重得多（美国在当时还没有严重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美国银行（而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它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喜欢的机构）获得了将石油美元重新注入世界经济中去的垄断特权，这样就把欧洲美元市场带回了老家。[①] 纽约因此成为全球经济的金融中心（这与金融市场内部的去管制化相结合，使纽约从此前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纽约人的财富取得了惊人的增长，消费水平空前提高）。

由于在生产领域受到威胁，美国转而通过金融领域来维持自己的霸权。但是为了保证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美国必须向国际贸易开放所有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这是一个缓慢的进

①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1999。

程，其中需要利用国际杠杆，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美国施加压力，以及正式将新自由主义经济视为新的正统经济）。它还需要改变资产阶级从生产活动到金融资本机构的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金融权力应当被用来规范工人阶级的运动。这为正面打击劳工力量和降低工会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利契机。里根总统所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摧毁强大的专业空运管理组织（PATCO），这等于向其他工会组织提出警告，如果它们胆敢组织工人进行罢工，那它们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就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工人阶级到处开展运动以保护他们所赢得的权利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劳工的斗争浪潮席卷了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矿工在英国和美国获得了领导权）。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工人阶级为了保护其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和在福利国家里所取得的地位与获得的特权而进行的后卫战斗，而非试图进行转型变革的进步运动。这些后卫战斗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工权利的下降和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相对降低，而在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形成了规模巨大、既无组织又无纪律的无产阶级。这就给世界各地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产生了向下的压力。便于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与产品日益增强的地理流动性相结合，为剩余资本进行赢利性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从短期来看，这激化了世界范围内剩余资本的生产问题。不过，这也导致失业率猛增，工资水平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得到有效控制。横亘在国家之上的债务为投机活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反过来又使国家权力更容易受到来自金融领域的影响。简而言之，金融资本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美国霸权的核心舞台，并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对工人阶级运动和国家行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国家里。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在科技领域和组织机构上所发生的一

系列转变使制造业变得更加灵活和更具地理流动性，上述所有转变就不会产生其所产生的结果。运输成本的降低，加上各级政府的政治转变为制造业提供了有利的商业环境和降低了相当一部分重新安置所需的固定资本投入，这就使制造业资本的地理流动性得到大幅提升，从而导致金融资本日渐出现过度流动的局面。尽管转向金融力量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利益，但这即便没有给美国自身的工业结构带来灾难性影响的话，也使其遭受了重大创伤。离岸生产成为可能，对利润的渴求则使其变成现实。美国的一个又一个工厂、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在一波连着一波的去工业化浪潮中遭到打击，这种打击首先体现在低附加值的商品上（比如纺织品），但是随后逐步扩展到从钢铁业和造船业到高科技产业等一系列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美国被迫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尤其是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联邦政府甚至不得不撤手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联邦政府对该公司实行的国有化曾在短期内颇具成效），以使其免遭倒闭的命运。然而，随着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逐步削弱，它开始将金融力量的触角伸向整个世界。美国由此而获得了巨大利益，世界其他地区的前所未有的廉价商品潮水般涌入美国，从而推动了美国一直致力于推动的永无止境的消费主义。美国越来越依赖对外贸易，建立和保护不对称的贸易关系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核心目标。

事实已经非常明显，到1980年前后，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沦为竞争异常激烈的全球制造业市场中的一个综合性竞争者，只有在生产率和产品设计与发展方面取得优势地位（通常都是暂时性的），美国的制造业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简而言之，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已经丧失了霸主地位，并开始需要政府对其加以扶持（比如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美国政府同意美元对日元贬值，以使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出口更具竞争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出现停滞，美国政府又被迫实行美元对日

元升值的政策）。除了一些特殊的部门，比如农工联合企业和国防工业之外，其他所有经济领域都被迫从生产技术到劳资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性调整。在那些美国公司仍然比较强大的经济领域，有的公司开始对产品的某些零部件实行离岸生产，有的公司甚至将整个产品都放到美国之外进行生产，并日益增加海外生产的份额，即便在将利润遣返美国的过程中，有大量财富流向了生产所在国。在其他一些领域，由专利技术和许可法所赋予的垄断特权成为美国丧失其在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后所获得的最大慰藉。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正逐步走向一种食利经济，而在国内，美国则正逐步走向一种服务经济。然而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创造了足够的财富来保持消费主义这一社会和平的基础。

从国际层面来看，金融资本越来越具有易变性和掠夺性。一次次的资本贬值和资本损失作为一剂良药（通常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的好意之下），被用来应对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无法保持资本积累平稳进行的情况。在此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例子，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美国金融资本侵入了拉丁美洲整个经济并重新获取了它们的资产。在其他一些国家，仅仅是实行了出口贬值。1997年，对冲基金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货币的攻击，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它们实行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陷入金融危机，公司大量破产，成千上万的人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境地。这场危机还大大提升了美元的地位，确定了华尔街的主导地位，大幅增加了美国富人的资产价值。阶级斗争开始围绕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金融资本的掠夺性行为，以及私有化所带来的权利缺失等问题展开。人们开始将反对帝国主义的矛头转向对抗主要的金融化机构——其中主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然而在一些特定的国家里，由于便于国外资本进一步渗透

而产生的债务危机（1980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2/3的成员国经历过债务危机，有的国家还不止两次）可以被用来重组其国内的社会生产关系。[①] 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公司接管了这些国家的金融体制、产品市场以及逐步壮大的公司。通过攫取从海外赚取的高额利润，中心地区的低额利润得到了有效补充。我所称之为“剥夺性积累”（见第四章）的行为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私有化是其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的核心特征。各国对“剥夺性积累”的反抗，开始取代由于扩大再生产而导致的劳工斗争，成为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核心。

虽然主要建立在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之上，但这一世界金融体系仍然具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特征。随着金融化网络开始在各国金融中心以及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金融家按照等级进行排列的基础上覆盖了世界各地，东京、伦敦、法兰克福以及其他一些金融中心也加入到这一行动中来。与此同时，跨国资本主义公司开始出现，尽管这些公司可能在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建有总部，但它们以早期帝国主义阶段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扩展到整个世界（列宁和希法亭所描述的托拉斯和卡特尔均与特定的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克林顿的白宫政府以及罗伯特·鲁宾全能的财政部在华尔街投机者的推动下，试图通过高度集中的多边主义来应付的世界（在此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当前，多边主义日渐体现为全球经济的地区化，北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欧盟）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建立的以贸易关系为基础的松散的利益同盟已成三足鼎立之势。由于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开放金融市场并加强了市场准入的相对自由度，因此这些地区性组织很难再次沦为类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段时

①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1999，第49页。

间极具破坏性，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自给自足的竞争性实体。然而在这种三足鼎立的态势下，美国仍然依靠其巨大的消费市场、压倒性的金融力量以及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冷战的结束突然消除了长期以来对全球资本积累地带的威胁。资产阶级集团无疑继承了这个世界。福山曾预言历史的终结即将到来。短期内，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列宁是错的，而考茨基则可能是对的——各主要资本强国有可能在“和平”协作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超帝国主义（当前具有代表性的是七国集团——在俄罗斯加入后变成了八国集团，尽管该集团处于美国霸权的领导之下），而且金融资本的世界性（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为标志）将可能是其最基本的意识形态。①

尽管金融力量无疑令人敬畏，但其还远没有达到无所不能和毫无限制地推行自己意志的地步。与工业、农业活动中的价值创造相比，金融化永远更容易受到攻击。在所有股票联手抛售和货币贬值过程中，都会出现新的和重要的工业生产联合体。例如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诸如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之类的地区性联合体，抑或诸如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之类的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实体，不仅能够熟练地应对金融压力，而且能够创造出一种反作用力，从而证明在实际价值的生产面前，金融资本——当前主要集中于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地区——是多么脆弱。这种工业生产联合体很多都是地区性的，它们或者处于一个国家内部，或者处于几个国家之间，这种地区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将在第三章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① P. 安德森：《国际化摘要》，载《新左翼评论》（P. Anderson，‘Internationalism：A Breviary’，*New Left Review*），2002 年 3 月，第 20 页。在这篇文章中，安德森讲述了“某种类似考茨基的东西”是如何实现的，而一些自由派理论家，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也已经注意到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对美国的金融霸权进行反击的微妙阵线，已经在世界生产领域的空隙中悄然兴起。这一阵线形成的标志是贸易收支盈余的累积，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然而，这些盈余重新流入金融系统，似乎又在表明华尔街仍然处于金融领域的运转中心。因此，尽管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霸权遭到了国内外的公开怀疑，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种怀疑大部分都烟消云散了。美国的安全以及其在世界金融领域的支配权都得到了保障。美国国内资产名义价值的繁荣，以及以大幅提升生产率和遍布各地的网络公司为此基础的“新经济”的崛起，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以此带动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了可观的资本积累速度。消费主义这一保持美国内部和平的黄金法则，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核心区域得到了令人惊讶的繁荣。

现在，这一体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就像在1973～1975年那样，这一困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政治经济生活中反复无常和混乱不堪的权力冲突使人们很难拨开笼罩在眼前的迷雾（尤其在金融领域），从而找出事实的真相，然而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揭露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世界生产能力过剩的核心区域的条件下（并试图去调查这两个地区货币异常贬值的原因），这两个地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恢复（尤其是韩国）迫使超额生产能力（过度积累）这一普遍性的问题重新回到了全球事务的前台。美国网络公司大量破产导致著名的“新经济”的崩溃，随后财务丑闻戏剧性地揭示出“虚拟”资本可能很难收得回来，这些不仅破坏了华尔街的信誉，而且给金融资本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带来了问题。随着资产名义价值的下降，大规模资本贬值的危险日益迫近，人们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危险的具体表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养老金，因为人们发现已经越来越难以将其进行兑现）。

因此，必须打开一些新的利润丰厚的资本积累场所（比如

中国），如果此举行不通的话，就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资本贬值。这就产生了如下问题：谁将承担新一轮资本贬值的冲击？哪些领域将出现新一轮资本贬值？在此种情况下，全球经济的“地区化”倾向将更加令人不安。人们已经开始能够听到20世纪30年代那种极具破坏性的地理竞争的回音。如果不是世界贸易组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条款的限制，美国在2002年通过提高钢铁进口关税而抛弃资本贬值将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投机泡沫的爆发揭露了美国在资本贬值面前的脆弱性。在经过十多年引人注目（尽管“不理智”）的繁荣和殷切的消费主义后，早在“9·11”事件给管理体系带来重大打击之前的2001年初，美国经济的全面衰退就进一步表明了这种脆弱性的存在。难道美国一直处于上升态势的消费主义这一黄金法则面临即将被打破的命运？

导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急剧恶化的国际收支状况。布伦纳（Brenner）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快速增长的进口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但它也使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并导致美国外债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而且“由于资本外逃和美元贬值，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①] 但是这种脆弱性具有两面性。如果美国市场出现崩溃，那么那些依靠美国市场来消化其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也将随之遭殃。中国和日本等国的中央银行之所以乐意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主要也是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它们可以借此资助美国的消费主义，从而为它们的产品创造市场。现在，它们可能发现自己正在为美国的海外战争融资。

但是，美国的霸权和优势再一次面临威胁，而且这次威胁

① R. 布伦纳：《繁荣和泡沫：世界经济中的美国》（R.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 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2002，第3页。

似乎更为严重。这次威胁根源于美国试图依靠金融资本这一不稳定的基础来维护其霸权。阿瑞吉曾指出，从历史上来看，金融扩张“不仅仅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进入了成熟期，它还预示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①] 如果金融化有可能揭开优势从一个霸权国家向另一个霸权国家转移的序幕（就像在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那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金融化将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毁灭的行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包括国内赤字和国外赤字）不可能永远不受控制地扩张下去，其他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也不可能永远有能力，并且永远愿意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世界各国对美国财政的支持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从2003年初开始，平均每天有23亿美元流入了美国。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生活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严格的经济紧缩和结构调整计划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中。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美国。正如彼得·高恩（Peter Gowan）所指出的那样：“华盛顿所拥有的操纵美元价格和利用华尔街国际金融支配权的能力，使美国政府可以不去做那些外国政府必须去做的事情：观测国际收支；调整国内经济以确保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观测公共和私人负债水平；建立有效的国内金融媒介体系以确保国内生产部门的强劲发展。”美国经济已经“摆脱了所有这些苦差事”，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所有国民经济核算的正常标准已经遭到极大扭曲，并已不再稳定”。[②]

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的权力与强加在各国头上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一种既共生又寄生的关系，该体系建立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之上，之后通过构建新的国际金融框架而得到进一步完善。索德伯格（Soederberg）指出，该体系

① 乔万里·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999，第123页。

②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1999，第123页。

显然是“美国政府的附属物”，尽管它也为“所有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①] 但是该体系对集中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型”国家的约束甚至破坏，迫使这些国家准备退出这一体系。马来西亚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它突然并非常成功地放弃了新自由主义规则，拒绝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例，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实行严格的资本控制。现在还不清楚在地区性联盟形成并最终退出该体系之前，这一体系将遭到何种程度的破坏，更进一步说，华盛顿共识的心脏地区将遭到何种程度的破坏，到目前为止极力维护美国利益的新金融框架将遭到何种程度的破坏。另外我们也不清楚美国是否仍将遵循该体系的相关准则，就像其在提高钢铁进口关税这一问题上所表现的那样。从这点来说，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美国参议院在批准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时候，还带有一个附加条款，即美国可以忽视和拒绝任何被认为对美国利益严重不公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我们对美国的这种既将自己视为法官，又将自己视为陪审团的行为早已习以为常）。

更重要的是，对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的反抗与不满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在形式上与嵌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阶级斗争决然不同）正在逐步转变为另外一种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球性运动。那些曾经温顺的从属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比如韩国），现在已经扩展到拉丁美洲国家——所兴起的反对美国霸权的民粹主义运动，即使不存在将这种群众性的抵抗运动转变成抵抗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危险，也有可能逐步转变为一系列政府领导的抵抗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反帝国主义开始呈现出一

① S. 索德伯格：《新国际金融》，载利奥·帕尼奇、柯林·莱伊编《2002年社会主义记录》（S. Soederberg,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mposed Leadership and “Emerging Markets”’, in Panitch and Ley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第175～192页。

种不同的色调，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美国进一步明确其帝国目标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如果它还想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的话。如果美国的霸权遭到削弱，那么它必将存在转向采取更为强制性的战略的危险，就像现在它发动对伊战争那样。

选择方案

可供美国选择的方案非常有限。尽管阿瑞吉及其同僚并没有指出任何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外部挑战，但他们还是非常担心地指出美国

> 与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相比，显然更具有力量把衰落的霸权转变为剥削性的优势。如果体系最终崩溃，那将主要是因为美国拒绝调整和包容。相反，对于美国而言，调整和容纳东亚地区的新兴经济力量，是其不经重大灾难就能向新世界秩序转变的关键所在。①

布什政府转向“单边主义”，转向压制而非认同，转向更为公开的帝国幻想，以及转向依靠其超强的军事力量，这些均表明美国正在采取一种高度危险的方式来维持其霸权，通过军事手段控制全球石油资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这发生在美国逐步丧失其在生产领域，现在是金融领域（尽管目前并不是很明显）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努力获取剥削性优势极具诱惑力。我们很难设想这是否将最终导致美国的霸权体系在重大灾难中崩溃（或许又回到了列宁所假定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更不用说作出预测。

① 乔万里·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999，第288～289页。

然而，美国即便不能完全脱离其帝国主义轨道，它也可以通过在国内进行大规模财富再分配，改变资本流入生产领域的方向以及更新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下大力气改进公共教育和修复明显遭到损坏的基础设施将是初始阶段比较好的选择）来降低其所面临的危险。制定一项工业战略来复兴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的制造业也将会对美国有所裨益。如果美国还想走得更远的话，这项战略还应当包括重新组织国内的阶级关系，变革美国自内战以来就拒绝进行系统考虑的那种社会关系。由国家进行资助的私人消费主义必须被以公共福利为导向的方案所取代。但这将需要进一步实行赤字财政和/或征收更高的税率，以及国家发号更多的指令，而这恰恰都是美国统治阶级所坚决反对，甚至是拒绝加以考虑的；任何打算实行上述政策的政客无疑都将湮没在资本主义舆论及其思想家的反对声里，而在势不可挡的金钱政治面前，他们无疑也将在所有选举中落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反击和切断国家与社会支出等措施，有可能是在当前形势下，为数不多的几条能够从内部保护资本主义免于自我损害和更具风险的良方。采取一种新的“新政”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种危险，但我们无法确定在全球体系面临着压倒性的生产过剩的情况下，这一新政是否真的能够发挥作用。牢记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将使我们受益匪浅：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罗斯福“新政”解决了大萧条问题。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战争的阵痛之后才重新将领土战略纳入正轨，从而使经济得以重新回到持续而又广泛的资本积累的稳定道路上来。

试图通过自我约束推行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严厉计划，将给美国政治带来更大的灾难。任何外部力量试图这么做（比如通过资本外流和美元贬值），肯定都将引起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的强烈反应。我们很难想象美国

会平静地接受和适应东亚力量的显著增长，而且在此我同意阿瑞吉的观点，即美国同样也不会承认我们正处于通往亚洲作为全球霸权核心的重大转变之中。美国不可能会安静与平和地接受这一事实。无论如何，美国都需要重新定位其对亚洲资本主义的政策——此举已经初露端倪，转变当前亚洲依靠美国市场的现状，培育亚洲自己的内部市场。各国逐步撤回投资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不断增长的债务对于继续保持美国内部的消费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方式，更不用说利用债务为战争融资了。1973～1975年危机的教训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资本主义逻辑并不必然产生好的结果，大炮加黄油的政策也并非永远万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布什政府将军事力量视为其唯一残存的绝对力量。美国公开谈论将帝国作为一种政治选择，有可能是在为了全世界和平与自由的花言巧语下，掩饰其从世界其他地区勒索贡赋的真实意图。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为美国提供了反对全球经济领域内任何危险性权力转移——包括经济上与军事上——的便利途径。当前的国际形势与1973年非常相似，欧洲、日本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对海湾地区石油的依赖性，都要比美国严重得多。如果美国成功推翻查韦斯和萨达姆政权，如果它能够稳定或改革当前建立在专制统治的流沙之上的、武装到牙齿的沙特政府（其政权有可能很快就要落入伊斯兰激进派的手中），如果它能够从伊拉克前进到伊朗（这存在很大可能），巩固其在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存在并以此控制里海盆地的石油资源（中国也正在竭尽全力争夺里海石油资源），那么美国将有希望通过牢牢控制全球石油命脉，从而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并确保在未来50年内的霸主地位。在此我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即美国还必须依靠自身是否能够说服世界相信其正在行使领导权，正在利用全球石油供给守护人的身份来致力于发展集体权力，抑或其是否正在损人利

己的基础上维护自身的地位。简而言之，美国到底是在诉诸强制性的支配权，还是在通过霸权而行使领导权。事实上，美国最有可能采取的战略是在后者的掩饰下采取前者的行为。但是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没有获得足够的国际支持，这表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美国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怀疑。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并且遭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亚洲国家以及紧跟其后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反对。联合国，尤其是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在伊拉克开采石油的权利）三个常任理事国不愿授权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的态度无疑表明了上述观点。与此同时，海湾地区兴起的反美斗争浪潮不但异常复杂，而且很难对其作出预测。从当前形势来看，从巴基斯坦到埃及的所有地区都存在着不稳定的可能性。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领导下，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权结构和领土构成——由英国和法国通过凡尔赛和约的附属协议而武断建立——都将得以重组和固定这一过于自信的观点，由于太过牵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尽管美国政府内部有很多战略家似乎相信这是可能的）。

然而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美国到了非打出其最强大的一张牌——军事优势——不可的地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会强制性地动用武力。从美国过去十年左右发布的国防计划文件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洞悉其在军事领域的政治战略。美国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其军事优势，防止和阻碍任何竞争对手发展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将防止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将其军事战略转变为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战争（有趣的是，美国在1995年选定的两个目标分别为伊拉克和朝鲜）。而切尼—沃尔福威茨主义则走得更远，该主义最初形成于老布什政府晚期，通过《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有

趣的是该计划重复了卢斯的行动，即用“世纪”这一概念的迷雾来掩饰其帝国的领土诉求）而得以巩固。该计划声称，美国应该抛弃固定的联盟（因为这种联盟具有很大局限性，比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根据具体情况发展与具体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将不再受制于其盟国的观点。美国保留了在必要的时候单独动用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权力。美国还公开声称其拥有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权力，以防止核武器、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的攻击，保证获得关键的战略原料（比如石油），以及防止恐怖主义袭击或其他形式的威胁（比如经济绞杀）。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在1991～1992年制定的这些国防政策在现在得到了忠实的执行。通过仔细研究这些国防政策的档案，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得出如下结论：

> 美国的计划是统治这个世界。尽管当前主要表现为“单边主义”，但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控制整个世界。这就要求美国必须维持其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防止世界舞台上兴起新的竞争对手并给其带来挑战。这还要求美国既要控制其敌人，又要控制其盟友。这不仅要求美国必须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抑或最为强大的力量，而且要求美国拥有绝对强大的力量。①

阿姆斯特朗进一步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帮助打倒苏联之后，美国现在却正在寻求那个“邪恶帝国”曾经遭到谴责和反对的政治。克林·鲍威尔曾生动地指出，美国应当成为“街区里的霸主”。他进一步自信地指出，世界的其他国家将会

① D. 阿姆斯特朗：《迪克·切尼的美国赞歌：设计全球统治的蓝图》，载《哈泼斯杂志》2002年10月（D. Armstrong, ‘Dick Cheney’s Song of America: Drafting a Plan for Global Dominance’, *Harper’s Magazine*, Oct. 2002），第76～83页。

很高兴地接受这一点，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不会滥用那种权力”。

另外一件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如果苏联解体是由于军备竞赛而导致的经济过度扭曲而造成的，那么美国盲目追求军事优势是否会破坏其自身权力的经济基础？地区性军事投入耗费巨大，且不断呈上升之势。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每年在海湾地区的军费支出就已经达到了40亿~50亿美元。仅仅截止到2003年9月，布什政府就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了750亿美元。据可靠估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支出将不可能低于2000亿美元，而这还不包括一些计划之外的灾难，比如地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内战。在美国的计划中，其“正常的”军事开支应该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军事开支的总和。过度延伸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联邦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危及公共服务领域的条件下，情况更是如此。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将对能否继续维持自罗斯福以来就一直盛行的黄金法则——在海外进行帝国扩张的支出不应该干扰国内永无止境的消费主义——产生怀疑。为了石油和继续维持境况不佳的霸权，美国将不仅需要牺牲自身宝贵的血液，它可能还需要牺牲其整个生活方式。美国当前正在追寻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将被权力的资本逻辑撕得粉碎。

地区性霸权和反霸权

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地区构架——其中北美居于首位——并非十分稳定。欧盟内部的正式安排似乎为建立至少能够与美国经济相抗衡的统一的欧洲经济提供了可能性。这似乎预示着地区霸权的形成，抑或美国真正竞争对手的出现。[①] 欧盟内部的

① 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征》，2000。

资本主义逻辑尽管并非十分强大，但其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欧洲各国正逐步扩展和巩固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沟通。向单一货币的转变并没有付出多大代价就取得了成功，欧元给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带来的潜在挑战尽管还比较弱小，但已是不争的事实（萨达姆提出用欧元而非美元来结算其售出的石油，可能是美国坚决推翻萨达姆政权，而非仅仅要求伊拉克进行裁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欧盟在政治上还处于分裂状态，其总的领土逻辑还仍然模糊不清。美国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对欧洲分而治之，从而阻止任何欧洲层面的明确的领土逻辑的形成。美国还试图通过一种双重战略，即一方面坚持将新自由主义规则作为交换关系和资本流动的基础（以此突出世贸组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稳定住某些能够影响欧盟内部政治的政治和军事杠杆，从而防止“欧洲堡垒”的出现。这就需要美国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与欧洲单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并与之发展关系，这还需要美国培育特殊的盟友（比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以波兰为中心的东欧国家也将作为平衡力量被包括进来）。

虽然美国自身现在打算抛弃固定的联盟，但它仍然紧抓北约不放，尽管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美国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由于它想将欧洲的军事计划和军事发展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例如，美国支持欧洲应当发展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的观点，但前提条件是新建立的快速反应部队必须仍然归北约指挥。对于美国而言，北约与欧盟不相一致对它非常有利，因为这样的话欧盟试图将领土逻辑转变为一致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举措将变得更加困难。

欧洲内部的分裂，其中主要是亲美国家与那些谋求维护政治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分裂，已经严重到根本无法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地步。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欧盟不可能为其面向整个世界的“权力的领土逻辑”营造稳固的基础。但这一局

面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改变，尤其是如果美国继续对来自欧洲的意见采取轻视和置之不理的态度的话。欧盟毫无疑问构成了一个地区霸权，但是当前它对美国所构成的潜在挑战只限于生产和金融领域。

从当前形势来看，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给美国的优势地位所带来的挑战要比欧盟所带来的挑战严重得多。随着这一地区的财力和生产力不断得以积聚，它从北美以及欧洲那里都夺得了一些权力，尽管从欧洲夺得的权力要比从北美少得多。与欧洲不同的是，这一地区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建立正式的政治—军事权力结构的意图，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的是网状的而非正式的，资本主义的而非领土的。当前，美国无论如何都会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保持对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韩国在最近有摆脱美国控制的趋势）的控制，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很难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然而尽管这一地区将因此而很难发展稳固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但其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看起来却越来越势不可挡，并且有希望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霸主地位，特别是随着中国以及比中国稍逊一筹的印度这两个经济大国逐步加入东亚和东南亚阵线。我们将在第三章对这些转变背后的经济后果进行讨论。由于中国不像日本那样为美国所操纵，而且其有能力，并时常似乎愿意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扮演地区性领导者的角色，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问题。对于维持美国全球霸权而言，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在欧洲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同等重要。从这方面来说，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将给美国带来巨大收益，如果它感觉有必要遏止中国的地理野心的话。然而总体来看，在保持世界足够开放，从而相对降低资本主义逻辑发挥作用的障碍与保持领土逻辑足够稳定，从而防止出现任何对美国军事和政治优势构成重大挑战的局面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上述并非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领土权力的唯一格局。尽管领土安排的相对固定性对其流动性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盟国之间的关系不但可能，而且的确会发生快速转变。例如，当美国的对伊政策在2003年初引起了法国、德国、俄罗斯，甚至中国顽强的联合抵抗的时候，辨认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很久以前曾预言将会非常轻松地在地缘政治上主宰这个世界的欧亚权力集团的模糊轮廓成为可能。美国长期以来就对这一权力集团的出现感到不安，这可以从它之前的一系列举措中看出来，比如对戴高乐于20世纪60年代向苏联主动示好和威利·勃兰特于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东方政策”作出的强烈反应。亨利·基辛格也强烈表达了美国仍然非常担心这种结盟的心情，他强调说，这种新的结盟关系预示着将重新回到19世纪时的那种均势政治，只是这次加入了令人沮丧的东西，即“美国并不必然将会衰落”，他因此也承认了这一结盟关系形成的可能性。[①] 布什政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组织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反联盟，这表明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重新结盟可以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的外交和军事保护关系非常容易被灾难性的错误所拆散。因而，美国入侵伊拉克应该具有更广泛的意图。美国不仅是为了借此控制中东地区，从而控制全球石油管道，并因此控制全球经济，它还希望借此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桥头堡，当这一桥头堡与从波兰到巴尔干的一系列盟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将会成为欧亚大陆一个强大的地缘战略支点，并有可能破坏欧亚权力集团任何形式的联合；而且，这无疑必然是与资本的无限积累永远相伴随的政治权力无限积累的下一步。

① 引自P. 泰勒《威胁与反应，新闻分析：不断加深的裂痕》，载《纽约时报》2003年3月6日（P. Tyler, ‘Threats and Responses. News Analysis: A Deepening Fissure’, *New York Times*, 6 Mar. 2003），第1版。

冷战的结束明确表明世界正在产生巨大的改变。权力的领土逻辑正处于变化之中，其结果仍然还不确定。当前，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关系显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布什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领土逻辑已经逐步清晰，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有关帝国和新帝国主义的争论会以美国为中心的原因。但是资本主义逻辑内部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均衡正在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这些力量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完全依靠于更好地理解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于这一问题，我将在第三章进行详细论述。

第三章
资本束缚

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与重组，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不断预言其即将终结的情况下，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简直就是一个谜，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列斐伏尔（Lefebvre）认为他在自己著名的评论中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即资本主义是通过空间生产而生存下来的，但不幸的是，他没能正确地解释为什么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它又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①] 当然，尽管列宁和卢森堡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并利用了完全不同的论述形式，但他们都认为帝国主义——一种特定的全球空间生产和利用的方式——是这一谜语的答案，尽管他们还认为这一解决方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因此充满了根本性的自我矛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在20多年之前开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针对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危机倾向，提出了“空间修复”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时间—空间修复”的理论）。[②] 这一理

---

① 亨利·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rans. F. Brya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②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被收集在大卫·哈维的《资本的空间》（*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书中。这一主要观点也可以在大卫·哈维的《资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repr. London: Verso Press, 1999）一书中找到。

论的核心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长期趋势，从理论上讲，它来源于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呈不断下降并导致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这一理论的重新阐释。[①] 这种危机最典型的特征是接踵而至的资本盈余（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的形式）和劳动盈余，以及没有任何明显的方式可以将它们在赢利的基础上集合起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当时生产能力的闲置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剩余商品难以售出，失业率前所未有。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资本盈余贬值，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到破坏，并且劳动盈余的损耗也达到了悲惨的境地。由于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赢利机会，因此最关键的经济问题（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相比）就是资本问题。要想避免资本盈余贬值，必须寻找赢利方式来吸收这些盈余。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选择。但这一选择不可能完全脱离时间转换，其中剩余资本被转移到长期项目之中，要在多年之后才能通过这些项目所支持的生产活动来收回成本。由于地理扩张经常需要投资长期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运输和通讯网、教育以及科研等等），因此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的话，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产生。比如，美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通过在当时仍不发达的地区开展面向未来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吸收可资利用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从而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顺便提一句，纳粹在那些年里也按照这一思路修建了高速公路。）

因此我认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逻辑（与领土逻辑相对）应当在为资本盈余问题（在此我想重复的是，我们应当将资本盈余，而非劳动盈余作为分析的重点）找出“时间—空间

① 关于这一理论，可参考《资本的限制》，1999，第6章和第7章。

修复”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为了理解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必须首先描述资本是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运行，从而创造其本身的历史地理学的，尽管这种描述可能过于笼统和简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将尽力将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我的核心论据。下面，我将首先列举一些把国家作为一种领土架构，一种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赖以存在的领土架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实例。

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

只有建立了某种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资本积累才能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一个拥有警察权的强大政府或一个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垄断者能够保证上述制度框架的运转，并为其提供明确的宪法性安排。因此，国家形成与资产阶级宪政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历史地理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当然，资本家并非绝对需要这一框架来维持生存，但如果没有这一框架，他们肯定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在有可能不认可和不接受他们的商业法则和商业模式的环境中，他们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批发商和经销商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荣誉规则或行为准则而得以生存下来（就像现在在中东很多地区的街头货币交易一样）。他们在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网络（有时依靠的是家庭关系——就像罗特希尔德家族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以及亲属关系），并在支持或反对国家权力的基础上，用他们自己的暴力工具（就像商业资本家经常所做的那样）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商业活动，使其免受敌对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威胁。如果国家权力不利于（就像在很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或不关心他们的活动，他们可能就会去反对国家

的法律。[①] 这种无视法律的现象可能会以不正当的方式出现，如黑手党、贩毒集团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甚至在一些强烈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内部也不例外。在其他一些事例中，资本家可能会为自己获取一些受到保护的飞地。欧洲中世纪的城镇特许状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在封建关系的夹缝中营造了一个孤岛。东印度公司或哈德逊湾公司贸易站，以及中国现在为吸引外资而建立的经济特区，则是另外一些例子。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可以，而且也确实利用亲属关系、散居族裔、宗教和种族纽带，以及语言习惯等各种各样的手段，编织了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网络，从而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独立于国家权力框架之外的操纵空间的网络和框架。

然而，对于资本主义活动而言，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其首选，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市场制度和契约法则（其中包括劳动力方面）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证，监管框架能够遏制阶级冲突和调节不同资本集团（如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农民和食利者）之间的利益诉求。此外，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活动，资产阶级国家还会建立保证货币供应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和插手外部事务的政策。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通过合适的方式运转，而且即使它们能够如此运转，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以此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如何建立的，是由谁建立的，以及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是否能够或是否准备去支持或反对资本积累的过程。就像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在资本的最初或原始累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但利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人们接受资

① 相关的例子可参考张鹂《城市的外来者：中国流动人口中的空间、权力和网络的重置》（L.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本主义制度安排，而且将其获取的资产私有化，并使之成为资本积累最初的基础（如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剥夺教会财产，或英国政府实行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除此之外，国家还在其他方面发挥着各种各样的重要作用（比如税收）。国家形成和国家政策的差异也往往非常重要。英国政府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法国政府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在英国，商业资本主义要远远强大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而在法国，则是农业资本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两个国家甚至在对它们的立场进行解释和辩护的时候，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英国推崇的是托马斯·孟（Thomas Munn）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的主题是通过贸易积累金条）一书中所宣扬的重商主义，而法国则支持重农主义思想，认为所有财富（价值）均来源于土地，贸易和工业在财富的创造中只是一种寄生的形式，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国家权力敌视私人财产的积累可能会抑制这个国家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通常会限制过度剥削劳动力的行为，并将自己置于劳动阶级的利益之上。但这种国家并没有废止资本的存在，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有可能会成为资本积累的积极推行者。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型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则是直接采取行动（通常是抑制劳动力的工资和消费）来影响资本积累的动态发展。但在那时，这种国家干涉主义早已存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崛起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国家，国家权力的强有力的支持——如果不是强制性支持的话——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法国统制经济（dirigiste）的传统（20 世纪 60 年代的戴高乐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其资本积累具有了明确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将其与英国区分开来（每个人在坐火车旅行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一点）。而且毫无疑问，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中，当人们奋起反抗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一些更具普遍性的外交关系的时候，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并且

将一直会是最基本的载体。

国家并非是唯一重要的领土行为体。国家联合体（既可能是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那样非正式地网络在一起的地区性权力集团，也可能是像欧盟那样比较正式地联合起来的地区性权力集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次国家行为体，如地区政府（美国各州）和大都市区（巴塞罗那加上加泰罗尼亚，或西雅图湾地区）的数量则可能要更多一些。政治权力、领土治理和行政管理在各种不同的地理范围内被建立起来后，随之构建了一套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政治环境，这也正是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得以产生的环境。

但是将资本主义的演变仅仅描述为国家权力在国家间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对位置和霸权的竞争性争夺，大多数世界体系理论都持有这种观点）中的表现是非常有限的。这种观点，如同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演变描述为似乎完全不受权力的领土逻辑的影响一样，都是错误的。但是阿瑞吉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相对固定和独具特色的权力的领土逻辑，是如何与资本积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流动性实现一致的呢？[①]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明确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是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实际运作的。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假设早就存在一套由国家权力保证和推动的适当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

空间经济的生产

在许多早期的著作中，关于空间经济是如何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这一问题，我曾提出了一个详细的理论。[②] 在此，我

① 乔万里·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999，第48～49页。

②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制》，1999；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2001；大卫·哈维：《都市体验》（David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

仅简要地对这一观点的核心部分做出解释。

货物和服务（包括劳动力）的交换几乎总是伴随着位置的转换。从一开始，它们便勾画出一组互相交叉的空间运动，从而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交往地理学。这些空间运动受到路程阻力的限制（它们在土地上所留下的轨迹忠实地记录了这些阻力的影响），并时常通过降低这种阻力来使经济活动在空间中聚集起来。劳动的领土和空间的分离（城镇与乡村的不同是其最为明显的早期形式之一）产生于这些在空间之上的相互作用的交换过程。因此，资本主义活动产生了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即便是在不考虑资源禀赋和物理可能性的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资源禀赋和物理可能性进一步增强了地域和空间的差异性及专业化逻辑。受竞争所驱使，个体资本家总是寻求在这一空间结构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总是被推动着向那些低成本或高利润的位置转移。一个地区的资本盈余可以在另外一些获利机会还没有完全丧失的地区找到赢利。对个体资本家而言，区位优势所发挥的作用与技术优势所发挥的那些作用是很相似的，并且在一定的情况下一方可以替代另一方。

在某些方面，上述观点是与古典区位理论［在冯·屠能（von Thünen），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和廖什（Lösch）的著作中均有所提及，后来艾萨德（Isard）在其著作中对此进行了综合］有些类同。[①] 其主要区别在于这些著作通常寻求在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中确定一种空间平衡；而本文则认为，资本积累过程被认为是永恒扩张的，因而其永远都会对实现平衡的倾向造成破坏。此外，古典区位理论假定了一种与实际资本主义活动很少有关联的经济理性。例如，它根据距离生产地的径向距离界定了所谓的“货物的空间范围”，基于

① W. 艾萨德：《区域和空间经济》（W. Isard, *Location and the Space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56。

此而形成的市场价格（根据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加以计算得出）超出了消费者能够或者愿意支付的范围。但货物并不是自动流向市场的，是商人把它们带入了市场。商业资本家的历史作用在于不断探查和降低空间障碍（经常被认为超出了“理性”的范围），并为贸易开发出新的运动形式和空间。例如，当面临本地市场的束缚和高昂的运输成本的时候，中世纪的商人们变成了行商，开始在广阔的地域内流动出售他们的货物。依照完全相同的方式，竞争行为促使破坏性技术动态的强大推动力渗入资本主义经济（正如个体资本家通过采纳先进技术来寻求竞争优势一样），因而资本家在寻求有利（例如低成本）位置时，便在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分配中产生了一种永远变动和不稳定的状态。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地理学景观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

然而，正如空间秩序的新古典理论家［张伯伦（Chamberlain），霍特林（Hotelling）和廖什］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空间体系内的竞争是一种垄断竞争。[①] 这种奇怪的杂种竞争形式最初产生于位置的唯一性所带来的排外性。空间位置总是具有某种垄断的优势。土地私有制从根本上带来了某种垄断权力：没有人能够在我已经修建工厂的地方再来修建工厂。而且如果这个地方还附带某些特殊优势的话，那么这些优势就只能属于我一个人。这便使资本家所偏好的垄断控制，而非公开竞争在空间经济中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尽管资本主义的抽象理论（包括其新自由主义变体）始终在呼吁理想化的竞争，但是资本家却热切地渴望得到垄断权力，因为它能够带来安全、可预见性和更为普遍的和平存在。此外，竞争的最终结果是垄断或寡头独占，而且竞争越激烈，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越迅速地聚合为如下状态：

① 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E. Chamberla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A. 廖什：《区域经济学》（A. Lösch,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trans. William H. Woglo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Wolfgang F. Stolp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最近30年以来，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的经济政策，从而导致许多经济领域（从航空业、能源业到媒体业和娱乐业）的垄断和寡头独占都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提升。只要有可能，资本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利用，并且确实利用了很多空间战略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垄断权力。控制关键战略位置或资源丰富的地区是一件重要的武器。在某些情况下，垄断权力变得非常强大，从而抑制了资本主义地理学的推动力，并极有可能带来地理学惰性和经济停滞。这种通过竞争获取利润而带来空间推动力的趋势，遭到了空间内由垄断权力所形成的合力的阻碍。正是从这些垄断中心出发，世界上出现了帝国主义实践和要求建立帝国的呼吁。因此，列宁和希法亭恰如其分地强调了垄断和帝国主义之间重要的内部联系。

作为理解帝国主义经济逻辑的关键，我在第二章中所确定的非对称性交换是由垄断性竞争所产生的。结果的不平等具有一种特殊的空间和地理表现，通常为特权和权力集中在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过去，高昂的运输成本和其他运动障碍（如关税、通行税和配额）意味着存在很多本地垄断。过高的路程阻力使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吃本地的食物，喝本地的啤酒。然而，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通过诸如WTO等制度安排打破阻碍贸易的政治壁垒后，这种类型的保护便瓦解了。我可以在巴黎吃到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蔬菜，也可以在匹兹堡喝到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啤酒。甚至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巴兰（Baran）和斯威齐（Sweezy）所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寡头独占状态的实例，[①] 如今也发现自己遇到了来自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进口的严峻挑战。因而，资本家

① P. 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P. Baran and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来构建和保护他们垂涎三尺的垄断权力。他们为此而做出了两项主要行动：一是努力实现资本大规模集中，并以此通过财权、规模经济和市场地位来谋取主导地位；二是通过专利权、许可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来保护技术优势（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这也是区位优势的替代物）。绝非偶然的是，后者已成为WTO内部重点协商的焦点，并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

所有这些都旨在强调，能够使商品、生产能力、人和金钱在空间中流动是多么重要。在此，运输和通讯产业的发展状况至关重要。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改变了空间条件（路程阻力），并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内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对于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倾向的背后的原因，我已在别处进行了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①] 但是，可以从理论上推出并且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记录相一致的是：有一种永不停息地减少（如果不是消灭）空间障碍的动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永不停息地加速资本周转的冲动。运动成本和运动时间的减少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引人注目的必要性。“全球化”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固有的本质，资本主义活动地理学景观的演变正经受着时空压缩一轮又一轮的无情驱动。

这一进程的其中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果是永无止境地推动地理范围发生变化，而资本主义活动正是在这一范围内得以存在的。正如19世纪铁路和电报的诞生彻底重组了地区专业化，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城市化和“区域性”的范围和多样性一样，

① 参见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制》；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第Ⅲ页。

最近一轮的革新（从喷气式飞机、集装箱运输到因特网等每一个事物）已经改变了将经济活动连接在一起的范围。正如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些推动力，霸权力量的转换范围将在物质上变得不可能，并在理论上无法为人所理解。政治上的领土重组，例如欧盟（这一梦想肇始于启蒙运动时期，在19世纪早期得到圣西门等乌托邦思想家的积极倡议）不仅变得更为可行，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经济上的必需。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转型只是这些物质转换在空间关系中的一项功能；事情要远比这复杂得多。但是，在我们所看到的政治重组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确实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正是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相互作用的关键点。

运输和通讯产业内的特殊情况为我们阐明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只有将某些物质基础设施固定在空间中，才能实现在空间之上的流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缆网、纤维光学体系、电网、自来水和污水体系、输油管等构成了“嵌入在国土中的固定资本”（与飞机和机械等另一种可以移动的固定资本形式不同）。这种物质基础设施吸收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的回收取决于它们在原地的使用情况。如果把资本投到一个港口，而这个港口没有一艘轮船停泊，那么这笔资本就相当于打了水漂。尽管投资到国土中的固定资本推动了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的空间流动，但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它还要求空间的交互作用遵循投资的固定地理学模式。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嵌在国土中的固定资本（其中包括工厂、办公室、房屋、医院、学校以及嵌入在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中的资本）极大地阻碍了地理变迁和资本主义活动的重新安置。我们再次发现了导致地理学惰性而非推动力的力量。那些固定在纽约、伦敦或东京、大阪的物质基础设施中的资本是巨大的，而且正如纽约经济在“9·11”事件后的短暂中断所清楚显示的那样，任何阻断资本

流入或流经这些位置的事件都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此外，各种各样的投资模式为个体资本家获取依附于地理位置的垄断特权打开了更多的道路。如果一个开发商碰巧掌握着一块土地，而这块土地正好位于一条高速公路的大的交叉口，那么他肯定能够从这块土地自身的价值，以及从对这块土地的投资（如办公大楼和旅馆）中获取巨大的投机暴利。

我们可以从到目前为止的叙述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经济压力的时候，这一地理学景观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竞争与垄断、集中与分散、固定与变动、动力与惰性，以及各种不同范围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张状态，无一例外地都产生于资本的无限积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之中。而且，这些紧张状态被牢牢地固定在资本主义体系普遍的扩张逻辑，即资本的无限积累和永不休止地获取利润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之中。正如我在过去曾多次强调的那样，由此而带来的总体结果是，资本主义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因此，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历史地理学景观之中。

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

在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导致资本积累的地理学模式发生了被动性变革。但是，我所确定的紧张与矛盾也可以产生能够获得稳定状态的地理学结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如此。我将这些相对稳定的结构称之为“区域”，也就是区域经济体，这些区域经济体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与生产、分

配、交换和消费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结构性一致。生产的分子化过程可以说是集中到了“区域性”的生产上面。当然，这并不是我独有的发现。对于很多历史和经济地理学家，以及诸如西德尼·波拉德（Sydney Pollard）等经济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领土概念，因为他们强调区域性发展，认为区域发展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所强调的是工业生产区域——现在被称之为“马歇尔主义”）到佩鲁（Perroux，他所强调的是增长极）再到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所感兴趣的是“自组织”区域经济体），在经济学理论中，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就看到了区域组织的产生对于理解资本积累的推动力而言，既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又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①] 最近，一些政治科学家如米特尔曼，在解释全球经济内部正在发生的复杂变动的时候，也开始强调区域组织在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②]

这种类型的区域分界线始终是模糊的和易渗透的，然而每个领土内部的连锁流动都产生了足够的结构性一致，从而使得这一地理区域与其所属国家经济体或更大范围的经济体内的所有其他区域都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结构性一致通常会大大超越单纯的经济交流，该一致性由于总是包含人们的态度，从而可能主要是文化价值、信仰，甚至资本家之间和他们所雇用的人们之间的宗教和政治联系。为了生产和维护集体财产，人们必须在区域内部建立某种治理体系，并将这一体系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管理体制中去。统治阶级和霸权阶级联盟会在这些区域内部得以形成，并给这些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带来重大影响。

①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与经济理论》（P. Krugman,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95。

② 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征》，2000。

他们不得不为公共财产而担忧，并可能因此而发现他们被迫从事公共设施提供的行为。为了支撑经济活动，他们保护和传播了文化与教育价值以及很多其他方面的市民生活，同时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得以建立，从而加强了最初表现为全球经济内部区域性实体的一致性。贸易与竞争的模式、关键产业或科技联合体以及特殊劳资关系与技术的专业化和集中化，将众多区域经济体松散地连接成为某种地理发展不均衡的整体。这些区域经济体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关系的实际状况，完全依靠于其所产生的阶级结构，以及就治理这一问题本身和围绕这一问题所产生的阶级联盟形式。①

然而，在此必须确认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种非正式、易渗透但却难以确认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区域性”——在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中必然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应的，这些区域经济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区域间竞争和专业化也就成为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特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一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中运转的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所实现的不断发展的区域性，是如何与通过国家和帝国政治所表现出来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产生联系的？

初看起来，答案似乎是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直接的联系。例如，据波拉德估计，18 世纪末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地区经济体的地理范围不超过 20 英里，它们实际上只是幅员广阔的大不列颠王国的一个个小岛，这些小岛之间的边界至少在 200 年前就已经确定。② 但是这些小岛所创造的驱动力最终吞没了整个英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运输和通讯系统的革新，这些小岛逐步成长并被并入更大的区域，这些区域涵

① 大卫·哈维：《都市体验》，1989，第 5 章。

② 悉尼·波拉德著，科林·霍尔姆斯编《论英国的工业革命》（S. Pollard, *Essay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ed. by Colin Holmes,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2000，第 219～271 页。

盖了诸如伯明翰和整个英格兰中部地区，曼彻斯特和整个兰开夏郡南部与西约克郡大都市区。这些区域的影响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的政治与利益在整个英国的治理过程中，发挥了虽非决定性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产生了自己独特的学科派别，如科布顿和布莱特所领导的倡导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学派”，敢于像追求整个英国的利益一样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正如人们将其拟人化为“激进的乔”张伯伦一样，伯明翰则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将会在下文看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公平地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政府的政治被那些区域性的利益所俘获，而那些区域性的利益则并不必然代表英国其他地区的利益（甚至贫困的苏格兰地区也偶尔掺和进来）。从伦敦经伯明翰与英格兰中部地区直至兰开夏郡南部与约克郡大都市区的轴线，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都在主宰着英国的政治，目前，这一轴线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相同版本的故事在欧洲比比皆是，当然，在美国历史上，随着国家权力从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转移到南部、西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区域和地域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下游地区（上海）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从经济上（尽管并非是政治上）主宰着中国的其他地区。总之我要说明的是，领土国家经常屈服于内部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利益或利益联盟，也就是说，直到其他一些区域崛起并反抗和取代它，这种局面才会结束。这种影响力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从一个范围转移到另一个范围，正好是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的

① A. 马库森：《区域：经济学和领土政治》（A. Markusen, *Region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erritory*,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1987; A. 马库森：《利润循环，寡头垄断和地区发展》（*Profit Cycles, Oligopol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李思名等：《中国的区域、政体和经济：后改革时代空间转型研究》（S. - M. Li and W. - S.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分子化过程完成后所产生的被动革命。但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是：区域性具体发挥作用，必须依靠自身在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所产生的逻辑。在适当的时候，上述所建立起来的区域将会在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此处仅仅按照一些领土逻辑来定义全体国民）作为整体来决定自己位置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国家相对于上述过程并非完全无能为力，抑或必然处于被动状态。一旦它认识到培育和获取区域推动力将是其获取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它就能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来谋求对那些推动力施加影响。最初，它或许是无意中做到了这一点。比如在19世纪，国家修建道路和通讯系统最初是为了行政管理、军事管制和保卫领土。但一旦建立起来之后，这些基础设施为货物、劳动力和资本流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在很多实例中，此种投资则是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而奥斯曼在1853年之后重新修建巴黎的市政道路最初是为了对难以管理的民众进行军事管制，还是将其作为打破中世纪的道路网给城市发展带来的限制、推动资本更便于流通的一项措施，至今还存在争论。[①] 而且有意思的是，尽管连接美国各州之间的高速公路系统最初几乎肯定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修建的，但政府却是在国家安全和国防的名义下来获得公众认同的。

但是国家能够利用其手中的权力，通过控制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在运输、通讯、教育和科研等方面的投资）或出台计划法和设置管理机构来协调地区性的差异和推动力。国家还有权力来实现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基本制度方面的改革，这也将会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当地方银行为中央银行所取代的时

① 大卫·哈维：《巴黎，现代性之都》（D. Harvey,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候，货币资本在整个国家内部的自由流动改变了区域性推动力。最近的例子是美国废除限制性的地方银行法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接管和合并区域性银行的浪潮，改变了美国的整个投资环境，使其逐步脱离地方特性，转而开始构建更加公开和更具流动性的区域性结构。在一些特定的实例中（新加坡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政治国家实际上可以通过在其国界内部系统地掌控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以此开始建立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区域性经济。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那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对于资本流动而言就像是一块磁铁，国家因此而不再依靠通过为资本投资构建避难所来增加自身的权力。这样一来，国家就永远都能够利用其源自空间的垄断力量来力争为任何可以利用它们的人提供垄断特权。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当区域建设的分子化过程溢出了政治国家的边界，或者是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需要有一个超越这些边界的出口的时候，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当然，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区域经济体横跨国家间的边界，如艾尔帕索和华雷斯市，或底特律和温索尔，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诸如欧盟之类超国家行政机构的建立，或甚至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或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等共同市场的建立，也可以被看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但真正重大的问题是，当产生于次国家区域经济体的剩余资本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赢利性投资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而且它已经给国际体系中的帝国主义实践带来了压力。

所有这一切必然产生如下结果：首先，不管国家政权如何看待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这一过程几乎肯定都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其次，这些分子化过程（尤其是在金融资本领域）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国家政权；最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政治国家必须付出很大努力来掌控分子化流动，以使其在国内

外发挥积极的作用。从外部关系来看，国家必须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那些时常产生于空间交换的不对称方面，并且总是试图以最强硬的姿态打出垄断控制这张牌。简而言之，国家必须参与地缘政治斗争，并在可能的时候采取帝国主义行为。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更加具体地看到这一点。

资本循环

尽管我在前文有关时间—空间的动力学分析中，给予了普遍矛盾和不稳定足够的重视，但我却忽视了资本主义产生过度积累危机的普遍趋势。我们现在需要更加密切地研究空间生产的普遍过程是如何陷入危机形成和解决的过程之中的。由于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需要引用实例，因此我打算接受布伦纳所提供的实证分析。布伦纳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和不间断的过度积累问题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①] 这将为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主义的多变性提供一个舞台，因为即使从中期来看，一系列临时性的“时间—空间修复”都没有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

“时间—空间修复理论”的基本观点非常简单。特定地域系统（territorial system）的过度积累意味着该地域出现了劳动盈余（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资本盈余（表现为市场上大量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掉的商品，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或缺少生产性和赢利性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盈余）。这种盈余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吸收：（a）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b）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

① R. 布伦纳：《繁荣和泡沫：世界经济中的美国》，2002。

(c) 在某种程度上将 (a) 与 (b) 结合起来。

最为有趣的是 (a) 与 (b) 之间的结合体，但是我将首先单独从时间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如图 3-1 所示。资本流通脱离了直接的生产与消费领域（初级循环），在改变方向之后，或者进入了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所构成的二级循环，或者进入了社会支出和科研与开发的三级循环。二级和三级循环将过剩资本吸收到了长期投资之中。其中在资本的二级循环中，资本流通被分成两部分，一是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厂房和设备、发电能力、铁路网、港口等），二是创造了消费基金（比如住房）。二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也比比皆是（高速公路既可以为生产活动服务，又可以为消费活动服务）。进入二级循环的一部分资本被嵌入在国土中，在适当的位置形成了一系列实物资产——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建筑环境（包括从工业区、港口和机场、运输和通讯网到排污和供水系统、住房、医院、学校等方方面面的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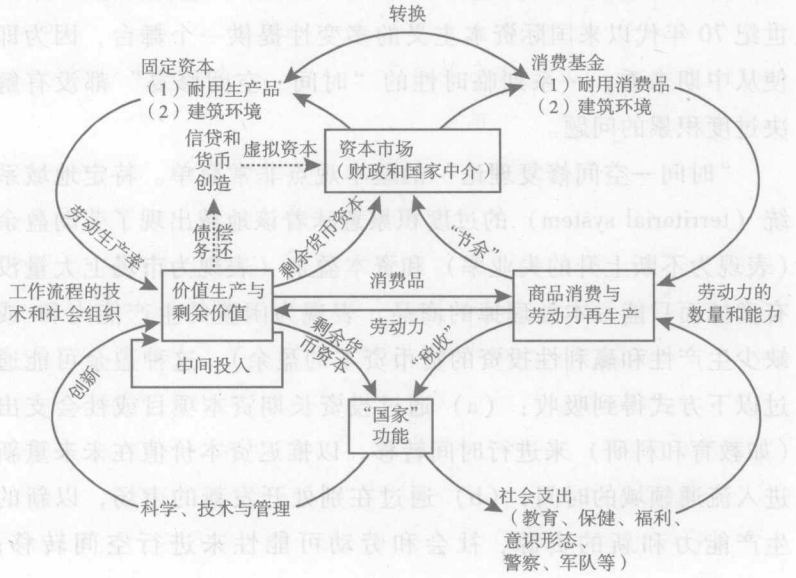


图 3-1 资本流通路径

施)。这些投资通常构成了某一个区域的物质中心。简而言之,它们在区域性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坦率地讲,它们远非经济活动中一个次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而且确实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地理扩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进入三级循环的资本——具体为在社会性基础设施领域的长期投资——同样也被分别投入到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是直接以生产为导向的科研与开发或技能培训,二是提高人们所处的社会条件(比如通过教育和卫生保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级循环(例如卫生保健预算)经常会吸收巨额资本。该种投资的其中一部分可能还被认为具有有效的区域稳定性。比如说教育系统,一旦在某一特定的空间被从行政和财政上组织起来之后,它就很难再四处移动。

当前产生的资本盈余可以而且正在被吸收到资本的二级和三级循环之中。如果这些投资有助于未来的资本生产力,那么它们则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生产价值。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即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在科研和开发领域的投资,或更加有效的运输和通讯系统放宽了资本进一步积累的路径。如果事情的确如此,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将最终流回资本的初级循环,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且到时可能需要另外一轮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基础设施投资。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投资缓和了过度积累问题。但是资本的二级和三级循环也可能产生过度积累问题,也就是说,住房、工作场所、工厂和港口设施,以及教育系统的容纳能力都将出现盈余。在上述情况下,资产将会在二级或三级循环中自动终止贬值。

二级和三级循环内部的过度积累经常会成为发生普遍危机的导火索。然而很多对资本积累的动力学的分析却经常会忽视这一点的重要性(比如布伦纳就是如此)。例如,1973~1975 年危机的起点是世界范围内房地产市场的崩溃,纽约房地产市场

紧接着出现倒闭；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停滞，其起点为土地、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领域内投机泡沫的崩溃，从而使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灾难（有趣的是，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增加在公共建设工程领域的支出来周期性地弥合这一灾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起点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自2001年中期所有其他经济部门都开始陷入低迷以来，美国和英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成为在房地产市场和建设领域的持续投机。从一种严重的回流效应来看，我们发现2002年美国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0%来自于消费者重新为他们膨胀了的住房价格筹措抵押贷款和将他们赚取的额外薪水用于直接消费（这实际上是将过度积累的资本全部投入初级循环）。单在2002年第三季度，英国消费者就借了190亿美元以应对房屋价格的上涨，从而保证自己的消费。一旦这种房地产泡沫出现破裂，将会发生什么是一件值得认真关注的事情。[①] 我们还不得不将中国政府目前正打算实施的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所可能发挥的效能看做是一个可能的方式，其中全球过度积累在最近的将来至少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局部的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修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和其附属的郊区城市化工程，以及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帮助吸收剩余资本具有相同的作用）。

但是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财政和/或国家机构在调节资本在三级循环的流动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衬衣和鞋子的剩余资本不可能会被直接地转移到机场或研究机构。国家和财政机构拥有关键性的力量来创造和提供信贷。它们实际上创造了大量或许可以称之为“虚拟资本”的资本（尽管纸面资产或期票没有

① C. 德·阿库勒：《密切关注房地产繁荣》，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3年1月23日（C. de Acule, 'Keeping a Wary Eye on the Housing Boo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3 Jan. 2003），第11版。

任何物质后盾，但是它们可以被用作货币）。[①] 假设它们所创造的虚拟资本大致等同于固定在衬衫和鞋子生产中的过剩资本，而且这些虚拟资本被转移到以未来为导向的项目，如高速公路建设和教育之中，那么经济将会重新恢复生气（这其中或许还包括由于教师和建筑工人购买而增加的衬衫和鞋子的需求量）。如果在建筑环境或社会改良方面的支出被证明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将会在以后推进更有效率的资本积累方式），那么虚拟价值将会得到补偿（或者是直接通过债务偿还，或者是间接通过诸如高额报税来还清国债的方式）。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和高额税收来自我偿还的理论经常会被各国付诸实施，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重建巴黎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②] 但是这一理论也并非总会发生作用，而且在建筑环境或社会支出领域的过度投资还可能会导致这些资产贬值或难以偿还国债。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们认为在教育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将最终得到补偿，并且将为进一步积累创造新的基础。然而这种局面完全没有发生，而且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所陷入的财政危机（其中包括纽约市政府的财政危机），其部分原因在于此种类型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生产的过度投资（越南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甚至在面临财政失败的时候，这种投资都有可能最终被证明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因为它们当中有很多只要存在那里，就具有物质性使用价值。20世纪初期，主要来自于美国（特别是巴尔的摩）的剩余资本被投入到伦敦地铁系统的建设，尽管这些地铁系统很快陷入破产，但却为此后的数代人留下了可资

① 我对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范畴的阐述，可参考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制》，1999，第10章。也可参见苏珊·斯特兰奇《疯狂金钱：当市场脱离政府》（S. Strange, *Mad Money: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

② 大卫·哈维：《巴黎，现代性之都》，2003。

利用的地下通道。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奥林比亚 & 约克房地产公司，该公司主要通过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破产的房产，然后将其据为己有的方式来获取财富。然而，它在金丝雀码头开发自己的项目的时候也陷入了一团糟，由于该项目无法实现足够的投资回报率，从而被银行取消了赎回权。银行估算出该处房产的价值并将其出售给了投资者。从那时开始，购买该处房产的投资者似乎还从中获利不少（当认识到其获利可能性之后，奥林比亚 & 约克公司以较低的价格买回了该处房产的部分产权，从而成为其中的一个股东）。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这种尝试性的第一波投资经常会陷入破产，从而将利润留给了那些以最低的价格购买这些贬值资产的人。因此，资产贬值，特别是资本二级循环中的资产贬值，在为资本积累创建一个全新基础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时间—空间修复

就我看来，“修复”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整个资本的其中某一部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取决于其经济和物理寿命），以某种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和国土之上。某些社会支出（比如公共教育或医疗保健体系）也通过国家投入而变得地域化，在地理上被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时间—空间“修复”喻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那么，修复的物质意义和比喻意义如何并在什么时候产生了冲突呢？

空间的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方面的法规与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然而，这种地理扩张、重组

和重构经常会威胁已经固定在空间（嵌入在国土）中但还没有实现的价值。这一矛盾不但不可避免，而且由于新的地域实现有效运转也需要在物质性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方面投入大量固定资本，因而将会不断重复出现。大量固定在空间中的资本成为别处实现空间修复的障碍。纽约市房地产的价值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并非微不足道，其在1975年贬值（2003年再次出现贬值）所带来的威胁不仅已经被视为是对该市本身的威胁，而且已经被视为是对整个资本主义未来的威胁。如果资本确实发生转移，那么在它身后会留下破坏和贬值的痕迹；资本主义核心地带（比如匹兹堡、谢菲尔德和鲁尔），以及世界上很多的其他地区（比如孟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经历的去工业化正是这种实例。换句话说，如果资本没有或不能转移，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一定会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衰退或萧条而直接贬值。

然而，上述矛盾产生于时间—空间转移的动力学中。如果某一特定区域内（比如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存在资本盈余和劳动力盈余，而且这种盈余不能在内部得以吸收（或者通过地域调整，或者通过社会支出），那么如果不想使它们贬值的话，就必须将它们送到其他地方，以寻找新的土地来获取利润。这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实现。比如，到处都可以发现销售剩余商品的市场。但是将上述盈余所送到的地方必须拥有可支付的手段，比如黄金或货币（例如美元）储备，或可以进行贸易的商品。盈余商品被送出，货币或商品随之流回。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过度积累问题只能在短期内有所减轻（它仅仅是将盈余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转化为另外的商品形式，尽管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后者通常为廉价的原材料或其他可以带来新的赢利机会的生产所需品）。如果某一地域并没有可资交换的储备或商品，那么它必须或者找到它们（就像19世纪英国强迫印度所做的那样，利用其所生产的鸦片与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从而在中

国榨取白银），或者进行赊账或接受援助。如果是后者，一个区域会向另一个区域出借或捐助货币，并让其利用这些货币来购买自己生产的剩余商品。英国在19世纪对阿根廷就是这么做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盈余也主要是通过贷款给美国，支持美国消费者购买日本商品来加以吸收的（尽管在这一实例中，美国也拥有一定优势，即其可以印刷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并因此而获得铸币税；如果美国选择这么做的话，它就能够通过调控美元的国际价值，用贬值的货币来对日本进行支付）。美国军工企业所采取的其中一个策略是以“安全”为由，要求美国政府借款给外国政府（比如最近一段时间的波兰），用来购买美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此种市场和信贷交易至少可以短期内在特定的地域减轻过度积累问题。特别是在地理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由于一个地区出现的盈余可以为其他供应缺乏的地区所消耗，上述手段可以发挥很好的功效。

但是诉诸信贷体系同时也导致一些地区容易受到投机资本和虚拟资本流动的冲击，这既有可能促进又有可能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如近年来所发生的那样，这一制度甚至还被用来强迫投机资本和虚拟资本进行野蛮贬值。自1980年以来，地区债务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很多贫穷的国家（甚至一些大国，比如1998年的俄罗斯和2001年之后的阿根廷）发现难以偿还自己的债务，于是便威胁不再偿还。为了解决这一困难，由19个债权国所组成的常设机构，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巴黎俱乐部得以建立，以便为那些难以还清自己债务的国家重新制订还款计划。自2000年以来，大约有37个国家被迫接受这一路线，而外界则给予了巴黎俱乐部越来越多的压力，要求其完全减免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债务。然而，谢里尔·佩耶（Cheryl Payer）所称之的“债务陷阱”实际上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将最贫穷的国家都“拉拢”进资本循环体系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它们可以成为剩余资本的“接收器”，而且它们也认为自己应该

承担这一责任。[①] 那些接收国将不得不因资本贬值而付出代价，而那些债权国则会完全避免资本贬值的损害。于是，接收国的资源便很容易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

资本输出，尤其是伴随着劳动力输出的资本输出则与之完全不同，它通常会具有长期性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盈余被送到其他地方，以加快新的地域空间的资本积累。19 世纪，英国的资本和劳动盈余在美国以及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殖民地找到了出路，在那些国家建立了新的和充满活力的积累中心，并为英国商品带来了大量需求。美国在最近所实施的国际援助几乎总是与购买其商品和服务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这些援助实际上发挥了支持美国经济的效用。由于那些新地域的资本主义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发展到这些输出国最初产生资本过度积累的程度（如果它们能够一直发展的话），因此这些国家完全有希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从中获利。特别是当其他地方的商品需求被嵌入到国土的固定资本中的时候更是如此。间接投资可以被用来支持修建铁路、公路、港口、水坝，以及其他可以作为未来稳定的资本积累基础的基础设施。但是这些建筑环境领域长期投资的投资回报率，最终取决于接收国是否具有强有力的积累活力（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除非借出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得到了接收国的保证）。英国在 19 世纪后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借款给阿根廷的。通过针对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马歇尔计划”，美国清醒地认识到其经济安全（且不说冷战背景下的军事因素）依赖于这些空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劲复苏。

正如最后这个例子所充分展示的那样，由于资本积累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将最终产生剩余，并将通过地理扩张来寻求吸

① 谢里尔·佩耶：《债务陷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第三世界》（C. Payer, *The Debt Trap: The IMF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收这些剩余，因此新的矛盾将会出现。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和德国的资本成为美国资本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与美国资本在20世纪超越英国资本（并且帮助摧毁了大英帝国）非常相似。在此始终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国家通过强劲的国内发展，在什么时候达到资本过剩而必须寻求空间修复的关键点。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空间修复进程，它首先通过贸易；然后通过诸如直接投资之类的资本输出，最初主要投资于欧盟和美国，最近则大规模投资（既有直接投资，又有间接投资）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最后是向国外提供贷款（特别是支助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韩国在20世纪80年突然转向外部，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接踵而至，它们不仅向世界范围（中美地区和非洲，以及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跨国资本市场输出金融资本，而且还输出一些具有严重缺陷的劳动管理实践，比如转包制。因此，甚至那些最近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追随者也很快就发现它们需要“时间—空间修复”，以解决它们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最近那些拥有固定区域的新崛起者，如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从纯粹的接收者变成纯粹的输出者，而且与此前同类国家和地区相比，它们发展的速度相对要快很多。但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成功的区域不得不通过它们自身的“时间—空间修复”以尽快调整发展的后劲。中国大陆由于以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吸收了大量盈余，在很多生产和出口领域正在快速地取代上述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自1980年以来，布伦纳所指出的普遍性生产能力过剩可以通过这一方式被分解成霸权经济俱乐部（美国、日本、欧盟三足鼎立）的“时间—空间修复”和主要发生在从东亚到东南亚乃至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的一系列层叠的和高速增长的“时间—空间修复”，此外，自冷战结束之后，东欧地区也迅速出现了一系列“时间—空间修

复”。虽然这些层叠的“时间—空间修复”可能根据各地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被记录下来，但实际上它们是不同区域通过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子化过程所建立起来的物质和社会关系。如果从台北与上海工业区之间日渐紧密的经济联系来看，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关系现状似乎应该不是现在这样。

这一过程可能产生两个普遍性的结果。首先一个结果是，一个接一个新的“时间—空间修复”不断得以开启，剩余资本得到了暂时性的吸收。我所称之的“转移危机”具有使资本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地区的效果。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仍然保持相对稳定性，即使某一部分经历了周期性的困难（比如这一地区的去工业化和那一地区的部分贬值）。这种地区之间的移动性所产生的总体效果是临时降低了过度积累和贬值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尽管有些时候地区性的危险可能会非常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1980年左右以来所经历的地区移动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一类型，尽管这种变动性是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为了金融资本、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的利益而故意操纵的（如果不是控制的话）。当然，在每一个阶段都会产生诸如哪些将会是可以为资本流入带来利润的下一个空间及其原因等一系列的问题。

从当前来看，中国明显是一个可以吸收剩余资本的候选国。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简短的分析，因为这不仅说明中国拥有为解决过度积累问题而进行临时性“时间—空间修复”的潜力，而且这还与全球体系内霸权的转移有关。当然，中国已经成为国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接收者。中国所接收的纯国外直接投资已经从1991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大约500亿美元。而且中国市场的成长速度也非常快，最近几年以来，城市居民的收入以11%的速度增长，农村居民的收入以6%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国内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对国外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2001～2002年，有很多跨国公司，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在

中国的销售利润占据了其利润总量的绝大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国内市场所拥有的巨大潜力，而且一些国外直接投资，如在微电子领域的国外直接投资，其投资导向不仅是为了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且还是为了在中国国内进行销售。然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长期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前景。自1998年以来，中国就设法通过债务融资投资巨型项目（这些项目使已经建成的三峡大坝相形见绌），以吸收其巨大的劳动盈余。中国目前正在筹划一个超大型的项目（至少要花费600亿美元），将长江的水引向黄河。各主要城市都将修建地铁和公路。中国还计划新修8500公里的铁路，以便将内陆与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连接起来，这其中包括修建上海与北京之间的高速铁路和青藏铁路。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都在进行维修改造。奥运会正在刺激北京进行大规模投资。中国上述活动的规模，要远比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采取的措施大得多，而且其完全有能力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吸收资本盈余。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赤字财政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很高的风险性，一旦这些投资不能及时地使它们的价值返回资本积累进程，中国马上就会被财政危机所吞没，这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后果。[①] 然而，这应该是“时间—空间修复”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因为这种“时间—空间修复”具

① J. 康恩：《中国大量投资大型项目以求稳定》，载《纽约时报》2003年1月13日（J. Kahn,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13 Jan. 2003），第A1、A8版；《中国制造，中国消费》，载《纽约时报》2003年1月5日商务部分（'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Business section），第1、10版；D. 奥特曼：《中国：伙伴还是对手，抑或兼而有之》，载《纽约时报》2003年3月2日货币和商务部分（D. Altman, 'China: Partner, Rival or Both', *New York Times*, 2 Mar. 2003, Money and Business section），第1、11版；T. 克兰普顿：《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推动邻国发展》，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3年1月23日经济展望部分（T. Crampton, 'A Strong China May Give Boost to its Neighbo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Economic Outlook, 23 Jan. 2003），第16～17版。

有全球性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中国吸收了过度积累的资本，而且还因为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天平正在向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倾斜，甚至或许在中国的领导下，亚洲地区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更加有理由来遏制中国从里海盆地和中东地区日渐增长的石油供应需求。

然而，第二个可能的结果则是随着各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强大态势面前在世界舞台上相互竞争，国际竞争正呈现出越来越猛烈的态势。从长期来看，由于这些区域并不能全部获得成功，随之而出现的结果或者是那些最弱小的区域屈从并陷入严重的局部性贬值危机，或者是各个区域之间爆发地缘政治斗争。后一种情况可能通过权力的领土逻辑转变为国家之间的对抗，其形式主要为贸易战和货币战，但其背后则经常隐藏着军事对抗的危险（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就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空间修复”呈现出一种更加邪恶的形态，因为它转化成了输出局部性和区域性资本贬值和资本耗损的行为（1997～1998年发生在东亚、东南亚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就属于这一类型）。然而，上述情景如何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不但取决于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而且取决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为。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完全得到了验证。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是如何实际产生作用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探讨。

内部矛盾

在《法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一书中，黑格尔谈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一极为财富的过度积累，另一极为制造了一群乞丐）是如何驱使其通过对外贸易、殖民

或帝国主义行为来寻找解决方法的。[①] 这样一来，他就否定了可能存在通过内在机制解决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问题的方法这一观点。列宁引用了赛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的观点，指出在海外进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避免国内战争的唯一可能的出路。[②] 特定领土范围内社会结构内部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状态，无疑会影响“时间—空间修复”的推动力。

19世纪末期可以为此提供非常有趣的例证。比如像约瑟夫·张伯伦（他以“激进的乔”而闻名于世）之类的人。由于张伯伦与伯明翰自由制造业的利益紧密相连，因此他最初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比如19世纪5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并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教育改革和其他改进社会性和物质性基础设施的项目中来，以此提高伯明翰这个他所生活的城市的生产和消费水平。他认为，这将为剩余资本提供一个生产性出口，并最终会获得回报。作为自由保守主义运动的一名重要成员，他亲身感受到英国日渐兴起的阶级斗争浪潮。1885年，张伯伦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呼吁有产阶级不能仅仅去提高他们作为私有财产拥有者的个人权利，他们还需要认识到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改善下层人民的生活环境，为了国家的利益在社会性和物质性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然而在接踵而至的有产阶级的反对声中，张伯伦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并且自此之后，他成为帝国主义最热烈的鼓吹者（最终在任殖民大臣期间，张伯伦带领英国陷入了南非布尔战争的深渊）。这一时期，类似这种改变自己职业轨迹的人还有很多。法国人朱尔·费里（Jules Ferry），在19世纪60年代是国

① G. W.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G. W.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Kno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② V. I. 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文选》（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Selected Works*, vol.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

内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的热情支持者，但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之后，他却成为殖民主义的倡导者（他带领法国陷入了东南亚的泥潭。1954年奠边府战役失败后，法国最终陷入了泥潭的深渊）。甚至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发表了美国的边疆并没有关闭的著名言论之后（尽管美国在南部和西部所蕴含的新的投资价值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也开始放弃国内改革，转而支持帝国主义行动。

在上述所有这些例子中，他们转向帝国主义的自由模式（这种模式以进步和教化的使命作为其意识形态）都不完全是因为经济上的势在必行，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愿意放弃其所拥有的任何特权，并因此通过国内的社会改革从内部解决过度积累，即使是在面临日益严重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时候也是如此。霍布森（J. A. Hobson）认为这是关键性的问题，并且需要采取社会民主政策来加以解决。[①] 因此，在评估帝国主义企图和到国外寻求“时间—空间修复”的驱动力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必要仔细考虑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以及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建立起来的特殊的阶级联盟形式（其中包括工人和资本家以帝国企图为核心所建立的阶级联盟）在国内所发挥的作用。在1884～1945年间，正是这种国内政治迫使诸多欧洲国家到国外去解决它们所存在的问题，这也为该时期欧洲帝国主义所采取的形态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比如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有太多的自由主义者甚或激进分子变成了妄自尊大的帝国主义者，有太多的工人阶级运动与帝国主义计划结合在了一起。然而，这需要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掌控住国家政策和军事权力。因此，

① P. 该隐：《霍布森和帝国主义：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和金融，1887～1938年》（P.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Radicalism, New Liberalism and Finance, 1887 – 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正如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我认为正如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解释一样，阿伦特将19世纪末期形成的帝国主义解释为“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非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也是正确的。[①] 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第五章中进行详细讨论。

调节机构的力量

在此，我们还必须承认金融和机构的安排与力量（特别是国家的力量）在资本积累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调节作用。然而，我们需要仔细地辨别这种调节机构可能呈现的不同形态，以及这些不同形态可能给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所带来的影响。比如，亨德森（Henderson）在他关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如何在1997～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分析中认为，新加坡（除了货币贬值外，其他经济领域基本没有受到破坏）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经济和政治几乎完全陷入崩溃）遭受危机打击程度的不同，显示了它们的国家和金融政策的不同。[②] 新加坡在国家强有力的政策下，杜绝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保护了金融市场，而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则由于放开了它们的资本市场，从而没能杜绝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和保护本国金融市场。这种不同确实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不同实际上决定了哪个国家将会遭受猛烈的货币贬值冲击，哪个国家则将会幸免。

关于这一点，我在此除了承认该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之外，不能再进行过多的分析。无疑，以国家、超国家和金融力

① 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1968，第32页。

② J. 亨德森：《不平衡危机：东亚经济风暴中的制度基础》，载《经济和社会》（J. Henderson，‘Uneven Crises：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Turmoil’，*Economy and Society*），28/3，1997，第327～368页。

量为一方，以资本积累更加普遍的动力学（通过生产和选择性贬值）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完全紊乱的形态，已被证明是对自1973年以来人们所谈论的不均衡性地理发展和帝国主义政治的描述的最为重要和最为复杂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认为高恩正确地看到了自1973年之后，彻底重建国际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维持其霸权地位，压制欧洲、日本以及此后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注。美国的这种举措始于1973年危机之中，当时尼克松总统采取了高油价和金融去管制的双重政策。美国的银行正是在那个时候被赋予了循环使用由海湾地区所积累的数额庞大的石油美元的专有权利。[①] 上述做法使美国重新回到全球金融活动中心的位置，而且当其与美国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还顺便帮助纽约摆脱了经济危机。这还导致了强大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金融体系的建立，该金融体系拥有控制全球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大力量，并且能够利用信贷操纵和债务管理来制造或破坏很多弱小的国外经济体。高恩进一步指出，这一货币和金融体系被历届美国政府用来“作为其在经济战略方面推动全球化进程和与之相关的国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强大的工具”。这一体系茁壮成长于危机之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掩盖了危机，保证了美国的银行不会遭受损失（国家通过结构调整等手段进行赔付），其他发生地区性危机的地方的资本外流不会终止华尔街力量的增长……”[②] 这一体系的目标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与其他任何可能的地区实现联合），强迫别国打开其国内市场，尤其是资本和金融市场（现在，美国正在强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这么做），以及将其他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其最高形式为世界贸易组织）强

①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1999，第21页。

②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1999，第4章。

加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关于这一体系，有两个方面需要加以重点说明。首先，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经常被描述为为整个世界打开了自由和公平竞争之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被固定在空间中的时候，其必然要产生垄断性竞争，导致非对称性交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如列宁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上述论点在高度垄断和寡头独占（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面前根本站不住脚。例如，美国曾不止一次地使用拒绝进入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一武器来迫使其他国家遵从它的意愿。这是始终附着于空间关系的不对性交换的一个重要形式。关于这方面最近（也是最粗暴）的例子来自于美国的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他声称如果巴西新当选的工人党总统卢拉（Lula）不赞成美国在美洲的自由市场计划，那么他将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向南极洲进行出口”。[①] 中国的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被迫放弃更好的选择，转而向投机资本打开自己的金融市场（韩国此前也在美国财政部的要求下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尽管它们之前曾因紧闭国内市场而免遭货币贬值的损害。现在，美国计划将美国式的开放市场准入作为向贫困国家进行国际援助的“世纪挑战账户”的前提条件。作为接受援助的回报，这些国家必须采纳与美国一致的制度安排，由此而被迫将自己置于垄断资本所拥有的超级力量的摆布之下。

另外，在生产一端，核心资本主义地区所拥有的垄断地位有效地控制了种子、肥料、电子设备、计算机软件、药品、石油制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打开新的市场并不会带来新的竞争，而仅仅是为垄断力量的扩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并由此而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态、经济和政治后果。无论是向整个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输出跨国资本以制造鞋子和衬衫，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社论，2002 年 12 月 31 日，第 4 版。

还是向世界各地销售可口可乐，情况都是如此。大多数评论家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使一些看似善意的行动，比如“绿色革命”，其结果也类似于如下情形，即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农业出口不断增加，财富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农业部门，其他部门则高度依赖垄断性进口。为了弥补在美国市场上的损失，美国烟草公司开始抢占中国市场，这种做法无疑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使中国公众的健康大受其害。在所有这些方面，新自由主义者通常所声称的公开竞争而非垄断性竞争，公平和自由的贸易，完全都是在市场崇拜掩盖之下的骗人的谎言。

甚至连自由贸易的倡导者都欣然承认，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和金融资本的自由运动存在巨大的不同。这马上就产生了如下一个问题，即人们究竟是在谈论哪种市场自由。有些人，如巴格沃蒂（Bhagwati），坚定地支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但却坚持认为这必然也适用于金融流动。[①] 这就是问题的困难所在。一方面，对于生产性投资和将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或地域重新分配到另一个生产领域或地域而言，信贷资金的流动必不可少。在一个空间上分离，一处空间具有盈余，而另一处空间则出现亏损的世界上，信贷资金的流动在保持消费需求（比如住房）与生产活动之间潜在的平衡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金融体系（无论国家是否干涉）对于调整资本积累的动力学而言，都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金融资本还包括大量非生产性活动，其中货币仅仅是被用来通过在商品期货、币值、债务和其他类似领域的投机活动，以此获取更多的货币的工具。当数额庞大的资本被用于这一目的后，开放的资本市场就会变成投机活动的工具，它们当中的一些，正如我们

① J. 巴格沃蒂：《资本神话》，载《外交》（J. Bhagwati,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77/3, 1998, 第7～12页。

在20世纪90年代所看到的互联网和股市的泡沫一样，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与对冲基金在数以万亿计的作为平衡货币的美元的支持下，迫使印度尼西亚甚至韩国陷入破产（无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具有多强的实力）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华尔街上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与推进生产领域的投资无关。它们只是单纯的投机行为（它们因此被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甚或“秃鹫资本主义”）。但是这些活动对资本积累的动力学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将政治—经济权力首先重新集中到美国，其次集中到其他核心国家的金融市场（东京、伦敦、法兰克福）方面时更是如此。

国家重新勃兴

正是基于此，作为领土政治实体存在的国家和帝国重新要求在资本的无限积累和过度积累的连续剧中扮演领导性的角色。只有国家才是政治实体，才是政治有机体；只有国家才能最好地架构制度安排，操纵资本积累的分子化力量，从而保持这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而言最有利的非对称性交换按其设定的模式运转。例如，如果我们发现世贸组织口头上赞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却支持不平等贸易（通过不平等贸易，富国通过压制穷国而维持了它们的整体利益），那我们就没必要为此大惊小怪了。这就是典型的帝国行为。由于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英国在19世纪支持自由（不平等）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然而当这一政策一旦开始有利于其他国家的时候，英国就不再支持了。随后，美国先是举起了“门户开放”，接着又举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到当前的布什政府时期，它甚至花言巧语地将自由与自由贸易等同起来，而根本无视自我决定的自由与外部强加的自由市场和不平等贸易规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对立。从这一方面来说，帝国主义就是将制度安排和制度条件强加于其他国家，并

且通常是在人类普遍利益的名义之下。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这正是布什政府当前政策的主攻方向。“我们追求”，当布什总统谈到战争的时候说，“公正的和平，让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取代压迫、仇恨和贫困”。而后两者“已证明能使整个社会摆脱贫困”。美国将会把这一（市场）自由传遍全世界，而无论其喜欢与否。

然而，上述一切是否能真正实现，完全依赖于政府，特别是那些最初生产然后控制剩余资本分配的核心国家政府采取何种统治方式和其阶级联盟的主要形式。这些国家通过“时间—空间修复”的主要路径，对金融体系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并因此而处在了调整空间交换所必然存在的非对称性以对自身有利的位置。美国的“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由于能够控制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能够利用其他金融和政府机构网络向整个世界实施巨大的金融权力，因而已经于近年来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已经网络化并被成功地拉入（通常利用信贷安排而被有效地“迷住”）金融和政府（其中包括超国家）机构连锁的结构框架中，这种权力中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加以运作。

随之而出现的一幅普遍性画面是，在一个时间—空间呈网状分布的世界上，剩余资本以金融的形态流动，与此同时，政治和经济权力被聚合在重要的节点（纽约、伦敦、东京），或者是寻求沿着生产性的道路支出和吸收盈余（时常在广大的空间，如从孟加拉到巴西或中国，实施长期性的项目），或者是利用投机性力量，通过将贬值危机转嫁到那些易受攻击的领土，从而摆脱过度积累的体系。当然，那些易受攻击的领土上的人们将不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丧失财产、工作和经济安全，更包括丧失尊严和希望。依此类推，由于那些最易受到攻击的领土最先遭受打击，因此那些领土内部最易受到攻击的人们将成为所有损失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墨西哥、泰国和

巴西农村的穷人成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劫掠行为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通过生产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利用一系列“时间—空间修复”来吸收资本盈余而得以生存下来，而且还通过贬值和破坏得以生存下来，因为贬值和破坏被用来作为治疗通常被描述为那些借款者的财政挥霍的良药。当然，那些不负责任进行借款的人也应当承担责任的观点未经统治精英的考虑就遭到了摒弃。这将需要对世界各地富有的有产者阶层进行挑战，要求他们更多地注意到自己的责任，而非他们私有财产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令人满意的利润率。但是正如约瑟夫·张伯伦所发现的那样，从政治上来讲，掠夺和贬低遥远地区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种族、民族和文化层面存在差异的人们），要远比对抗国内压倒性的资产阶级力量容易得多。时间—空间积累在过度积累问题上邪恶的、破坏性的一面既成为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成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土以调节资本的无限积累和政治权力的无限积累的重要的创造性补充。

如果官方言辞想要获得人们的信任，那么就应该对当前调节世界范围内资本流动的制度安排复合体进行调整，以支撑和维持扩大再生产（增长），避开任何通向危机的道路，并严肃地提出降低贫困的问题。但是，如果该计划陷入失败，那么它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进行积累。正如外交战争一样，由国家权力支撑的金融资本的介入经常相当于其他方式的积累。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掠夺性的一面所建立的邪恶同盟构成了“秃鹫资本主义”的利刃，它一方面进行野蛮的实践和强迫性的贬值，另一方面又促进整个世界取得了和谐的发展。但是我们将如何来解释这些“其他方式”的积累呢？

第四章
剥夺性积累

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积累具有双重性。

> 一方面，资本积累关注的是商品市场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地点——工厂、矿山和耕地。就此而言，积累纯粹是一种经济过程，其最重要的阶段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交易……在此，无论和平、财产与平等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敏锐的科学辩证法都需要揭示出所有权如何在积累的过程中变成攫取别人的财产，商品交换如何变成剥削，平等如何变成阶级统治。资本积累的另外一个方面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其主要方法为殖民政策、国际贷款体系——获取利益范围的政策——和战争。暴力、欺诈、压迫以及掠夺是公开进行的。这就要求努力去发现在这种混乱的政治暴力和权力竞争背后严肃的经济规律。①

她认为，资本积累的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相连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只能通过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才能得以实现”。

---

①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R.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A Schwarzschild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消费不足和过度积累?

卢森堡将其分析建立在一种对资本主义危机倾向的独特理解上面。她认为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即普遍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工人遭受剥削，其消费能力远低于他们生产的商品，而资本家则至少部分地被迫进行再次投资，而不是消费。在适当考虑各种有可能弥合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假定的裂痕的方式之后，她断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贸易为保持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提供了唯一系统的方法。如果那些社会形态或地域不愿意与之进行贸易，那么就必须通过暴力和武力（例如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它们这么做。在她看来，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核心所在。这一论点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尽管卢森堡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如果希望将这一体系长久保持下去，就必须保持（必要的时候采取强制措施）非资本主义区域的非资本主义状态。这就为19世纪后半叶众多殖民国家采取残酷的压制政策提供了依据。

现在，很少有人赞同卢森堡关于消费不足是导致危机的原因的理论。[①] 与之相反，过度积累的理论则认为缺乏赢利性投资的机会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有些时候，缺乏足够的有效消费需求也可能是问题的部分原因——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过度依赖所谓的“消费者信心”（换句话说亦即冲动的顾客无法将他们的信用卡保存在自己的钱包中），并将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是否稳定的指针。卢森堡认为她所看到的裂痕可以很容易地

① M. 布利尼：《消费不足理论》（M. Bleaney,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London: Methuen），1976；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A.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

通过再次投资得以弥合，因为再次投资自身就产生了对资本货物和资本投入的需求。而且正如我们在“时间—空间修复”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导致了一系列帝国主义活动，从而非常有助于这一体系的稳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其他地方打开了对投资货物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诚然，不同部门和地域之间的不均衡状况可能会加剧，商业周期和地区性衰退也可能会出现。但是，如果投入成本（土地、原材料、中间投入和劳动力）能够大幅下降的话，即使面临有效需求停滞不前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形成积累。因此，在保证持续获利机会方面，获取廉价的投入与获取广大的市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就意味着不但应该迫使非资本主义区域开放其贸易（这也非常有用），而且应该迫使它们允许资本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在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领域进行投资。

对于任何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而言，其普遍性的推动力并非来自阻止非资本主义区域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这些区域应当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势。从这一观点出发，19 世纪晚期出现的殖民压迫就完全是一种弄巧成拙的行为，因为在此过程中领土逻辑抑制了资本主义逻辑。例如，英国由于害怕竞争而阻止印度发展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力量，从而阻碍了该地区进行“时间—空间修复”的可能性。对于英国而言，大西洋经济所具有的开放与活力要远比它在印度建立的压迫性的殖民帝国更能发挥作用。毫无疑问，英国肯定能设法从印度榨取剩余价值，但印度从来都没有成为英国剩余资本的沃土。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正是由于大西洋贸易的开放与活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才变成可能。如果阿瑞吉是正确的，且资本的无限积累需要政治权力的无限积累，那么这种转移将不可避免，任何试图避免这种转移的努力都将导致灾难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封闭帝国的产生几乎肯定是 20 世纪 30 年代过度积累问题无法得以

解决的一个原因，而且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土冲突奠定了经济基础。领土逻辑主宰和阻碍资本逻辑，并因此而通过领土冲突迫使资本逻辑陷入几乎是定期的危机之中。

20世纪历史地理学证据的分量完全验证了过度积累的论点。然而，卢森堡的系统性表述仍有很多有趣的地方。首先，她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为了保持自身的稳定必须永远能够获得“自身外部”的东西的观点值得深究，特别是其回应黑格尔的设想，也就是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迫使其从自己的外部寻求解决方法。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马克思关于产业后备军的观点。[①] 在缺乏可以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积累需要劳动力的增加。这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得以实现。人口的增加非常重要（大部分学者很容易就忘记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一观点的责难）。资本还可以从农民阶级中间劫掠“潜在储备”，甚至还可以从殖民地和其他国外地区获得廉价劳动力。如果上述方式都失败的话，资本主义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力量来制造失业（裁员），从而直接形成由失业工人所构成的产业后备军。这种失业必然会向工资水平施加向下的压力，并因此为资本的赢利性使用开启新的机会。

现在，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为了进行积累，资本主义确实需要“自身外部”的东西，但是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工人实际上在某一特定时刻被抛出了体系之外，以便于在接下来的某一时刻将他们与资本积累的目标结合起来。借用当前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的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主义必须创造，而且经常创造其自身的“他者”。鉴于此，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需要某种类型的“外部”东西的观点可谓中肯了。但是资本主义既可以利用早就存在的外部（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内部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K. Marx, *Capital*, trans. B. Fowkes, New York: Viking), 1976, 第25章。

某些尚未被无产阶级化了的领域——比如教育），又可以积极地来创造它们。我计划在下文里认真对待这一“内外”辩证关系。我将会对由扩大再生产和经常性的暴力剥夺过程所构成的“组织关系”是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趣的是，阿伦特也沿着相同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萧条源于推动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

> 帝国主义扩张由一系列奇特的经济危机所引发，过分储蓄所导致的资本生产过剩和“剩余”货币在本国范围内再也无法找到生产性投资场所。权力的投资有史以来第一次无法为货币投资铺平道路，相反，权力的输出却卑顺地跟在货币输出的后面，因为在遥远的国度中无法控制的投资威胁着将社会广大阶层转变为赌徒，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用佣金利润来代替生产利润。帝国主义时代之前的10年，即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诈骗、金融丑闻和股票市场投机行为的增加。

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来看，上述预想似乎完全应验。但是阿伦特对资产阶级反应的描述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她认为他们“第一次认识到，简单的掠夺，这种几个世纪以前造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和开启了所有更深层次积累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得以重复，否则积累的动力可能会突然停止”。①

① 前引自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1968，第15、28页。

阿伦特认为，在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所指的“原始的”或“初期的”积累过程在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中，包含了一种通往帝国主义的重要和持续的力量。就像劳动供给的例子一样，如果资本主义必将面对并必须克服过度积累的压力的话，那就总是需要大量外在于它的资产。如果这些资产，如空地或新的原料产地都没有现成的，那么资本主义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来制造它们。然而，马克思并不认同这种可能性，除了利用技术革新而产生失业，从而制造产业后备军之外。关于这一点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马克思的保留

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是建立在某些关键的初步假设上面的，这些初步假设基本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设相一致。这些假设包括：自由竞争的市场及私有财产的制度安排、法理个体主义、契约自由，以及由“促进型”国家所保证的合适的法律和统治结构及它所确保的货币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和循环媒介的完整性。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被很好地确立了起来，劳动力已经变成通常按照其合适的价值进行贸易的商品。“原始的”和“初期的”积累已经发生，积累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和平、财产与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尽管是通过剥削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这些假设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计划或当前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正如卢森堡曾明确承认的那样，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市场自由化——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将不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国度，其中所有人都会非常富裕。相反，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平（过去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对此进行了印

证，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等一直牢牢坚持这一政治路线的国家更是如此）。马克思预言，这还将产生严重的和持续增长的不稳定，并最终会带来长期的过度积累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危机）。

这些假设的缺点在于它将建立在劫掠、欺骗和暴力基础之上的积累归类为“原始阶段”，而这一阶段已被认为与现在不再相干，或如卢森堡所认为的那样，被认为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封闭的系统。因此，对资本积累漫长的历史地理学中“原始的”或“初期的”积累过程中的掠夺行为所持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的重新评价，急需得以有序进行，最近就有几位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①] 既然将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过程标上“原始的”或“初期的”的标签过于奇怪，那么我将在下文里用“剥夺性积累”这一概念来代替它们。

剥夺性积累

如果仔细分析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描述，我们可以揭示出一系列的进程。[②] 这其中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对农业人口的强行驱逐；将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共有的、集体的、国家的，等等）转变成排他性的私有财产权；劳动力的商品化，压制其他形式的（本土的）生产和消费；对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国主义式的占有；交易和税

① M. 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古典政治经济和原始积累秘密的历史》（M. Perelman,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在 *The Commoner*（www. thecommoner. org）上，对新圈地运动以及原始积累应被理解为单纯的历史还是一个持续进程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德·安格利斯（DeAngelis）对此进行了很好地总结，参见 http://homepages. uel. ac. uk/M. DeAngelis >。

②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76，第 8 章。

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奴隶贸易；高利贷和国债，以及最终的信贷制度等原始积累的基本方法。国家，由于垄断了暴力和法律权力，在支持和促进上述进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都与国家的立场息息相关。国家在发展中扮演角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总是使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织并非必然和谐。

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之中，上述马克思所提及的有关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过去30年间，墨西哥和印度等国逐步加快了转移农业人口和制造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步伐；很多以前的共有财产资源，比如水资源，已被私有化（通常是按照世界银行的要求）和纳入积累的资本主义逻辑；其他生产和消费形式（本土的，甚至像美国的小商品生产和消费）遭到了压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小农经济为农业综合经济所取代。并且奴隶制度不复存在（尤其是性贸易）。

多年以来，人们通过对马克思有关原始积累的描述——这些描述从本质上而言只是一种简单的概括，而非系统性的研究——进行了仔细研究，认识到其中有一些需要修复的漏洞。比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需要对那些被无产阶级化群体的前资本主义技能、社会关系、知识、思维习惯和信仰进行一系列的压制和挪用。但亲属结构、家族与家庭架构、性别与权力关系（其中包括那些通过宗教及宗教机构所行使的权力）都有自己发挥作用的空间。在某些时候，早前存在的结构由于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不相协调，不得不被暴力压制，但目前存在的很多证据表明，它们同样有可能被挑选用来作为某种工人阶级自愿形成而非强制形成的基础。简而言之，原始积累既需要挪用和选用早前存在的文化和社会成就，又需要对抗和取代这些文化

和社会成就。各国斗争与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不尽相同，因此正如汤普森（Thompson）等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工人阶级“自己制造了自己”，当然尽管这从来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①]由此而带来的结果通常是在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留下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痕迹，以及在如何定义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差异。无论无产阶级化过程多么具有普遍性，它都不能产生相同种类的无产阶级。[②]

现在，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正如列宁、希法亭和卢森堡等人在20世纪初所认为的那样，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1973年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已经完全展现出了其投机性和掠夺性的特征。股票促销、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由通货膨胀而导致的整体资产的破坏、由合并和兼并所带来的资产剥离、债务责任水平的提高，使得大众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都陷入用劳役偿还债务的境地，以及公司诈骗、利用信贷和股票而进行资产剥夺（通过股市崩盘和公司倒闭来劫掠养老基金并使其彻底毁灭）——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安然公司的倒闭就剥夺了很多员工的生计和养老金领取的权利。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好好看一下最近以来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重要的金融资本机构作为剥夺性积累的利刃所实施的投机性劫掠。

①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② 可参见C. 弗里曼《全球经济中的高科技和高跟鞋》（C. Freeman, *High Tech and High Heels in the Global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李静君：《性别和中国南方的奇迹：工厂女工的两个世界》（C. K.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强调知识产权（即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表明，遗传物质、物种血浆（seed plasmas），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产品的专利权和许可权现在可以被用来对付大众，而那些大众本来在研发这些物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少数大医药公司的利益，生物剽窃呈猖獗之势，掠夺世界遗传资源库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被大规模商品化的结果。文化形态、历史和智力创新领域的商品化也需要大规模的剥夺（在这方面音乐产业可谓臭名昭著，其占用和剥夺了草根文化和创造力）。对迄今公共资产（比如大学）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更不用说横扫整个世界的私有化浪潮（水以及所有种类的公用事业），显示了新一波的“圈地运动”。就像过去一样，国家经常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强行推行上述过程，即便违背民意也在所不惜。用以保护劳动和防止环境退化的监管框架的倒退，必然导致权利的丧失。通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共有财产权（政府养老金、福利和国家医疗保健等权利）又回到了私人的手中，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推行的其中一项最为恶劣的剥夺政策。

资本主义已将弱肉强食和掠夺与欺诈行为变成其固有的属性。但是正如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在暴力和权力争夺纠缠在一起的情况下，通常很难为经济活动确立严厉的法规”。剥夺性积累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其实现的方式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

那么，剥夺性积累是如何帮助解决过度积累问题的呢？在此重复一下，过度积累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过剩的资本（或许还伴随着过剩的劳动）被搁置起来，没有可以看得到的赢利性出路。然而，在此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本盈余。剥夺性积累所

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其中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活动。就像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描述那样，这需要占用土地（也就是圈占土地）和驱逐常住民，以此制造出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然后再将土地投入到资本积累的私有化洪流。最近几年以来，私有化（比如英国在社会住房、电信、运输、水利等方面的私有化）为过度积累的资本打开了广阔的赢利空间。苏联的瓦解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将迄今为止无法利用的资产大规模地释放到资本积累的洪流中。在过去的30年里，如果这些新的积累区域没有开放的话，谁能预见过度积累的资本将何去何从？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自1973年以来一直处于长期的过度积累的困难之中，那么将所有一切都进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决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廉价的原材料（比如石油）释放到上述体系之中。报业大王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曾指出，解决我们当前经济困难的方法是将每桶油价控制在20美元，而不是3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所有默多克的报纸都如此热心地支持对伊战争了。①

然而，通过对现有资本资产和劳动力进行贬值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标。人们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贬值后的资本资产，然后利用过度积累的资本再次将其投入赢利性的资本循环之中。但是这需要此前进行一波贬值，亦即出现某种形式的危机。为了使这一体系合理化，危机可能会在精心安排、操纵和控制之下进行。这通常就是国家实施的经济紧缩方案（利用利率和信贷制度等重要杠杆）所通常包含的内容。有限危

① D. 柯克帕特里克：《默多克先生的战争》，载《纽约时报》2003年4月7日（D. Kirkpatrick, 'Mr Murdoch's War', *New York Times*, 7 Apr. 2003），第C1版。

机可以通过外力被强加于资本主义活动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领域。这就是由超级大国（比如美国）所支持的国际金融体系（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之下）如此强势的原因。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创造一些贬值的（在某些时候是被低估了价值的）资产，然后利用在其他地方缺乏盈利机会的资本盈余对这些资产进行赢利性使用。韦德（Wade）和维内罗索（Veneroso）在分析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抓住了这一问题的本质。

> 金融危机通常会导致所有权和权力转移到那些能够保证自己的资产完整无缺和有权制造信贷的人手中，从这方面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西方和日本的公司是最大的赢家……大规模的货币贬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和所推动的经济复苏相结合，甚至可能促成了世界各地在过去50年以来和平时期国内财富向国外所有者最大规模的转移，与之相比，拉丁美洲的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从国内转向美国所有者的手中，或墨西哥在1994年之后步拉丁美洲的后尘也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这让我们想起了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大萧条期间，资产重新回到了它们合法的拥有者手中。"①

区域性危机和高度本地化的货币贬值成为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的一种初级手段。1997～

① R. 韦德、F. 维内罗索：《亚洲危机：高债务模式与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载《新左翼评论》（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第3～23页。

1998 年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①] 类似的例子还有将人们驱逐出工作岗位，以此制造出产业后备军。有价值的资产被抛出循环过程从而被迫贬值。它们被闲置起来，陷入休眠状态，直到剩余资本抓住它们，在资本积累中获得新生。然而，由此而带来的危险在于这种危机可能会失去控制，从而变成全面的危机，抑或“他者化”将激起对创造“他者”这一体系的反抗。国家干预和国际机构的其中一项主要职能是，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的本质所在。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而言，这意味着精心安排这些进程以有利于它们特殊的利益，而与此同时却声称它们正在担当伟大的领导者，正在组织“解救”（如 1994 年的墨西哥）以保证全球资本积累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然而正如任何投机性赌博一样，它也存在着失败的危险：在俄罗斯已经失去一切，只好简单宣告破产之后，在韩国经济（在经历了几个月艰难的谈判之后）似乎即将崩溃，并有可能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98 年 12 月突然而真切地感到了恐慌，这也由此说明这种积累方式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跳舞。[②]

在这种谈判活动中，尽管压制和服从之间的斗争不尽相同，但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霸权是如何利用金融机制而得以建立的。这些金融机制一方面维护了霸权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引导附属国走向假设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道

① R. 韦德、F. 维内罗索：《亚洲危机：高债务模式与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载《新左翼评论》，228（1998），第 3 ~ 23 页。其他关于这一危机的描述，请参见 J. 享德森《不平衡危机：东亚经济风暴中的制度基础》，载《经济和社会》，28/3，1997，第 327 ~ 368 页；C. 约翰逊：《反冲：美帝国的代价与后果》，2000，第 9 章。

② 彼得·高恩在《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一书中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路。因此，连接剥夺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纽带是由金融资本和信贷机构所提供的，而这一切则依然是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

所有一切偶发事件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剥夺性积累的偶发事件中找到铁律呢？当然，我们知道某些层面的剥夺性积累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并且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这些方式既包括合法的，又包括不合法的。比如，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著名的“炒楼”行为。一处劣质房产被以极低的价格购得，经过表面的装修后，在售房者所安排的按揭贷款的帮助下，以昂贵的价格出售给一个渴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低收入家庭。如果这个家庭难以按期付款或应付严重的维修问题，而这通常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栋房子则会被收回。这并不完全是非法行为（购房者要小心了），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掠夺了低收入家庭，骗取了他们数额少得可怜的存款。这就是剥夺性积累。这种类型的活动（合法的和非法的）比比皆是，它们使一个阶级掌握了财富，而另一个阶级则失去了财富。

但是相对于扩大再生产而言，剥夺性积累是如何，在什么时候，又为什么会从这种幕后状态转变成积累的主导形式呢？这或许与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危机是如何形式的，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存在部分关系。但是这也可以反映出坚定的企业家和发展型国家为了“加入体系”和直接从资本积累中获取利益而付出的努力。

任何社会形态或地域被拉入或将自己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都必须在原始积累的法则之下，经受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广泛的结构、制度和法制上的改变。苏联解体正说明了这一

问题。在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建议下，俄罗斯实行了“休克疗法”，由此而出现了一段野蛮的原始积累时期。社会灾难不断呈扩大之势，以私有化和市场改革为基础的资产分配既不公平，又不是特别有利于伴随着扩大再生产而出现的投资活动。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原始积累过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上海周边地区迄今为止成功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这些企业是都市区大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被迫关闭，或者进行了私有化，这就逃避了社会福利和养老金的义务，创造了一个失业和贫穷的工人群体。为了让其余的中国企业远离世界市场残酷的竞争，中国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这却导致了对此前适合这些企业发展的环境的贬值和破坏。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但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在那些偏僻的地区出现大量的地区性社会灾难，以及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冲突。

剥夺性积累在此可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发展在国家权力强力支持下取得成功突破的必要代价。剥夺性积累既可能由内部所驱动（比如中国），又可能为外部所强加（比如东南亚出口加工区新殖民主义的发展，或布什政府现在计划附加于穷国援助项目的结构改革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变化的背后隐含着内部动机与外部压力相互交织的因素，墨西哥即为这方面的例子。20 世纪 80 年代，墨西哥放弃了对农民和当地居民早已孱弱的保护，这部分来自于美国要求其接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路线，以此换取财政援助和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进入美国贸易市场的压力。甚至即使这一动机似乎主要来自于内部的时候，外部环境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与 20 世纪 30 年代闭关锁国政策在封闭帝国盛行一时，甚至 20 世纪 60 年代由国家所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严格控制资本流动相比，现在对于中国而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使其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1973 年之后的形势——从表面上来看应该是美国强迫其他

国家开放市场——为所有渴望将自己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联合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也因此而导致了诸如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勃兴。这一机遇的来临为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去工业化浪潮（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有些国家甚至比去工业化更进一步），但与此同时，它也使新兴工业化在投机资本、时间—空间竞争，甚或更进一步的剥夺性积累浪潮面前，显得更加脆弱，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便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易变性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的过程。

一般而言，由危机而导致的贬值通常会对社会财富和社会制度造成破坏。这种情况通常会出现在信贷体系难以运转、资产流动性不复存在和企业被迫陷入破产的时候。对于所有者而言，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资产，只好被迫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那些拥有流动资产的资本家。但是此种情况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20 世纪 30 年代大沙窝地区（Dust Bowl）的变迁，“俄克拉荷马的原住民”大规模地移民到加利福尼亚［斯坦贝克在其《愤怒的葡萄》（Steinbeck，*Grapes of Wrath*）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戏剧化的描述］，成为美国农业综合经济逐步取代小农经济漫长历史过程的暴力先驱。这一变迁最初的杠杆一般都是信贷体系，但或许其中最为有趣的方面是表面上为了帮助和保护小农经济而建立的一系列国家机构，在促进这一它们应该阻止的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破坏性的作用。

1973 年之后，剥夺性积累变得愈加明显起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补偿长期以来伴随着扩大再生产而产生的过度积累问题。这一发展的主要工具是金融化，以及国际金融体系主要在美国的要求之下，能够不时地在某些部门，甚或整个国家进行从温和到野蛮的贬值或剥夺性积累。但是新的领土进行资本主义发展和采取资本主义形式的市场行为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那些寻求将自己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甚或现在的中国大陆）所完成的原始积累即是明证。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而言，它不仅需要金融化和自由贸易，还需要采取截然不同的途径来部署国家权力——通常在剥夺性积累中扮演主要角色。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和与之相关的私有化政治象征着这一转变的大部分内容。

私有化：剥夺性积累的利刃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该理论彻底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所有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的理论，认为需要保护私有财产安排、市场制度和创业活动。最初，该理论只是作为孤立的和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忽视的思潮而存在，到了20世纪40年代，冯·哈耶克（von Hayek）、路德维希·冯·米瑟斯（Ludvig von Mises）、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学者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构架，卡尔·波普（Karl Popper）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也是如此。然而正如哈耶克所预见的那样，这一理论至少要经历一代人之后才会变成主流理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一些支持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公司捐助了大量资金，一批高级思想库也得以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一股稳定且日益增加的分析、著述、争论和发布政治声明的洪流。然而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过度积累的普遍危机变得非常明显之后，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凯恩斯主义（Keynesian）和其他更加强调国家干预的理论的替代者。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之后，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经济问题而开始寻找更好的出路，最后她从政治层面上发现了新自由主义运动，于是便转向其思想

库来寻找灵感和建议。[①] 与里根一起，撒切尔夫人将国家活动的整体方向从福利国家转向积极支持资本积累的“供给”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它们的政策框架，短短几年之内，新自由主义学说进行了一个简短而成功的急行军，走出研究机构，首先在英国和美国，随后在欧洲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政策依据。既然市场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那么政府就必须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作为其政策目标。国家所掌握的资产或公共资产被释放到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对其进行投资、提升和投机的市场。新的赢利性活动的地域得以开启，而这也有助于避开过度积累问题，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然而一旦正式运转起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新自由主义运动也为找到越来越多的可以实现私有化的舞台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压力。

在撒切尔执政期间，大规模的社会住房成为首批被私有化的资产。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为低收入阶层准备的礼物，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变租住房屋为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屋，从而获得一笔宝贵的资产，以此增加他们的财富。但是一旦这一转变得以完成，房地产投机也就开始了。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区域，这一投机行为将最终收买、诱骗抑或强迫低收入人群搬到诸如伦敦等城市的周边地区，然后再将以前工人阶级的房产转化成为极具贵族化的中心地带。在很多城市的近郊地区，由于不复存在能够买得起的住房，从而产生了大量无家可归的人和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英国，随之而来的公共设施（水、电信、电力、能源和运输等）的私有化，出售所有的

①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等：《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D. Yergin, J. Stanislaw, and D. Tergin,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公有公司，以及根据企业逻辑组建的许多其他的公共机构（比如大学），意味着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产的重新分配日益朝着有利于上层阶级，而非下层阶级的方向发展。

相同类型的资产重新分配几乎发生在所有进行私有化的地方。世界银行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视为橱窗，认为它非常高效地实现了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举例来说，南非不但对水资源进行了私有化，而且要求市属公共设施“收回全部成本”。消费者必须为他们所使用的水付费，水再也不是免费的商品。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公共设施的高额收益可以赚取利润和扩展服务。但是，由于无法负担这笔费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脱离这一服务；由于收入减少，供水公司只好提高水价，这就导致低收入人群更加难以承担此项支出。人们被迫从其他地方获取饮用水，霍乱由此而开始肆虐，很多人因此而死亡。如果这一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政府的目标（为每个人提供饮用水）将永远难以实现。麦克唐纳（McDonald）和其他一些人通过对南非进行广泛的调查，认为“收回市政服务的成本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了巨大困难，导致为数众多的人被切断和驱逐出服务领域，使成千上万的低收入家庭面临着失去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的潜在危险”。[①]

相同的逻辑也促使阿根廷展开了异同寻常的私有化浪潮（水、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都进行了私有化），这一浪潮导致了巨额过度积累的资本的涌入和资产价值的暴涨。然而随着资本撤离到其他地区，阿根廷人民很快便陷入严重的贫穷（现在贫困人口已占阿根廷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

① D. 麦克唐纳、J. 帕普：《南非的成本回收和公共服务危机》（D. McDonald and J. Pape, *Cost Recovery and the Crisis of Service Delivery in South Africa*, London: Zed Books），2002，第162页。

墨西哥，主要涉及的是土地权利。墨西哥革命政府于1917年颁布的宪法中宣布保护土著居民的合法权利，并将这些权利载入合作农场（ejido）体系——该体系允许集体占有和使用土体——之中。1991年，萨利纳斯（Salinas）政府通过了一项改革法案，允许并鼓励将合作农场的土地进行私有化。由于合作农场为土著群体的集体安全提供了基础，墨西哥政府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维持这一安全基础的责任。而且，这也是萨利纳斯政府一揽子私有化行动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行动拆散了社会安全保护制度，并给收入和财富分配带来了可预知的和戏剧性的影响。[①] 反抗合作农场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那一天，农民群体的反抗达到了高潮，恰帕斯州爆发了萨帕塔（Zapatista）起义。然而，随之而来的降低进口壁垒使墨西哥农民遭受了另外一次打击。从美国的高效且享受高额补贴（高达其成本的20%）的农业综合企业所进口的廉价农产品压低了墨西哥玉米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使墨西哥小型的农业生产者陷入无法与其进行竞争的境地。由于处于饥饿的边缘，墨西哥的很多农民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加入早已拥挤不堪的城市失业者的洪流。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农业人口也有着与之相类似的经历。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下，从加利福尼亚进口的廉价蔬菜和从路易斯安那进口的廉价大米，现在已经取代了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该方面的农业生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下来自外国的竞争正在破坏印度的农村生活。罗伊（Roy）曾经指出，实际上，“供养印度7亿人口的农村经济正在遭到扼杀。无论收成太好还是收成过坏，印度的农民都处于贫困之中。由于大庄园和农场大量解雇

① 约翰·纳什：《玛雅幻影：全球化时代的自治诉求》（J. Nash, *Mayan Visions: The Quest for Autonom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2001，第81～84页。

务工者，无地的农业劳动者陷入了失业状态。他们纷纷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①] 对于中国而言，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如果想要在农村发生巨大变迁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其稳定，就必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至少吸收5亿农村人口。尽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在城市将从事何种职业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目前正在着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这一社会压力。

对此罗伊总结说，私有化从本质上而言是指“生产性公共资产从国家转移到私人公司的手中。生产性公共资产包括自然资源，如地球、森林、水和空气等等。这些都是政府为了其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而保管的资产……攫取这些资产并将它们作为原料出售给私人公司实际上是一种野蛮的剥夺行为，其野蛮程度在历史上前所未有”。[②]

显而易见，墨西哥恰帕斯州所爆发的萨帕塔起义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土著居民的权利；显而易见，这一运动的导火索一方面为最初的公共土地的私有化，另一方面为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内开启自由市场，它是二者相互结合的产物。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对剥夺性积累的反抗。

围绕剥夺性积累的斗争

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包含了一系列暴力的和松散的斗争。资本的诞生从来就不是一件和平的事情。马克思曾经指出，它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世界历史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在《颠倒的世界》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

① A. 罗伊：《权力政治》（A. Roy,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2001，第16页。

② A. 罗伊：《权力政治》，2001，第43页。

幅在17世纪的英国，这些斗争是如何展开的详细图景：私有权力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相互角逐，各种各样的民众运动从反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化转移到反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和公共机构。[①] 在我们这个时代，剥夺性积累也引起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斗争和大规模的反抗。目前，这些斗争与反抗构成了各种各样看似刚刚开始，实则遍布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或另类全球化的运动。这些运动中的替代方案所体现的动乱性，与其他历史阶段（比如1640～1680年的英国和1830～1848年的法国）的类似的破坏了生活和社会关系方式的方案如出一辙。这些运动所强调的主题——“归还土地”——充分表明了其与很久以前的斗争具有很深的连续性。

然而，解释和分析这些斗争却存在很大的困难。古语说得好，“不先打破鸡蛋就做不成煎蛋”，资本主义的诞生也包含了猛烈的，有时甚至是残暴的创造性破坏阶段。阶级暴力尽管令人憎恶，但其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推翻了封建制度，解放了生产力，社会开始了强大的技术和组织变革潮流，抛弃了基于迷信和无知基础之上的旧世界，取而代之以尊重科学启蒙、能将人们从物质需求和欲望中解放出来的新世界。从这一点来说，原始积累尽管充满邪恶，但它却是成功实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马克思［他坚决反对雷克吕（Reclus）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等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派的社会主义］对原始积累所破坏的社会形态并没有进行过高的评价。他也没有表明将会永远持续现状，退回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很多进步的因素，甚至对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来说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观点并没有赢得

① 克里斯托弗·希尔：《颠倒的世界》（C.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多少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尊敬，比尔·沃伦（Bill Warren）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先驱的著作遭到冷遇也说明了这一点]。[①]

在任何关于当代帝国主义实践的政治评价中，这一问题都至关重要。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非常高，而且还存在大量虐待劳工的现象，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由国外直接投资、工业发展和离岸生产体系所导致的在人种学方面的社会变迁，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在一些情况下，作为劳动力重要来源的妇女，其地位即便没有被提高，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面临继续作为产业工人还是返回农村承受贫穷的选择时，很多新的无产阶级者似乎都表达了选择前者的强烈愿望。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工人阶级获得了足够的权力来获取财富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其生活所达到的水平要远远超过他们先前在农村时期的窘境。那么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所出现的问题，到底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快速资本主义工业化对生存机遇所带来的影响，还是由破坏了大量工业化成果的1997～199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贬值和去工业化。通过扩大再生产将资本积累引进和融入印度尼西亚经济，抑或通过剥夺性积累完全破坏这一活动，到底哪一个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尽管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后一个问题为前一个问题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而且真正的灾难在于仅仅为了获取剩余劳动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量的人口转变（有时甚至采取强制措施）为无产阶级，但我还是认为，对于劳苦大众的长远希望、渴望和前途而言，后者所带来的破坏要远比前者为甚。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积累开启了通往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是一回事，剥夺性积累中断和破坏了这一早已开启的道

① 马克思有关印度的论述，请参见卡尔·马克思、F. 恩格斯《论殖民主义》（K. Marx and F. Engels,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2；比尔·沃伦：《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先锋》（B.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1981。

路则是另一回事。

对原始积累或许是更加积极的改变的必要前提这一观点的认同，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夺性政治的全部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统革命观点通常认为，为了在那些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实施现代化方案，必须进行相同程度的原始积累。这也在某些时候意味着同等程度的暴力，苏联、中国和东欧地区所强制实施的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政策很难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反却引起了政治反抗，其中某些反抗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那些实施这一政策的国家里也因此而遇到了困难。为了在尼加拉瓜大西洋沿岸的米斯基托地区发展社会主义，桑地诺在处理当地印第安人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这就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功颠覆桑地诺革命政府创造了“特洛伊木马”。

因此，尽管反对原始积累的斗争可能会为反抗运动提供不满的温床，这其中包括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但社会主义者仍然持有这样的政治观点，即不能保护旧有的秩序，要直接攻击并争取推翻旧有的阶级关系和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并由此而创造一个全新的阶级关系和国家政权的形态。这一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横扫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非常流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反抗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而非保护陈旧的传统社会的名义上进行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经常发现自己与那些即便不是寻求再度振兴，也是要寻求保护传统生产体系、文化准则和社会关系的人处在了相互敌对的境地。

反抗剥夺性积累的运动并不必然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发展主义所青睐。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不完整的成功记录（古巴最初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农业领域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但后来却陷入了衰退），加上很大程度上在冷战思维之下所形成的高压政治的大环境，使得传统左派越来越难以在这些运动中成为领导者，

相反只能对它们进行强制性的控制。

反抗剥夺性积累的运动通常会采取不同的政治路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与社会主义政治完全对立。这在某些时候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另外一些时候则仅仅是因为由这些斗争的本质所产生的实用主义的和组织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些斗争的类型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天壤之别。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它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联系。奥戈尼人民反对壳牌石油公司破坏他们土地的斗争；印度和拉丁美洲长期以来反对由世界银行所支持的大坝建设项目的计划；反对生物剽窃的农民运动；反对转基因食品确保当地生产体系的斗争；保护当地居民使用森林储备，同时限制木材公司活动的斗争；反对私有化的政治斗争；发展中国家争取劳动权或妇女权利的运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物栖息地免遭破坏的运动；获取土地耕种权的农民运动；抗议高速公路和机场建设的运动；数以百计的抗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财政紧缩方案的运动——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横扫世界并日渐占据新闻头条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这些运动和反抗经常会遭到暴力镇压，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暴力镇压则是在“秩序和稳定”的名义下由国家政权所实施的。在主要军事机器（以美国为首，英国和法国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的军事支持，抑或在某些时候代为训练特种部队的情况下，附庸国在建立压制和清洗体系以残酷镇压那些挑战剥夺性积累的激进运动中，扮演了带头者的角色。

对于上述复杂的图景，我们还必须加上规模激增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特别是1970年以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开始关注单一的政治问题（比如环境、妇女地位、公民权利、劳动权和消除贫穷等等）后更是如此。尽管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其

① B. 吉尔斯主编的《全球化和政治抵抗》（B. Gills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一书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收集。

中一部分源于西方的宗教和人道主义传统，另外一些则是在反抗贫穷的名义下由那些不懈追求市场交换扩大化目标的团体所资助建立的。我们很难不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或目标而弄得晕头转向。罗伊曾经这样指出："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几乎已经超越了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无论是揣测它所覆盖的范围，抑或试图对其进行定义，还是同时审判和对抗它，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抗它的唯一方式是用特殊的方式来进行一场特殊的战争。"①

但是这些运动并非仅仅刚刚开始。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会出现矛盾，比如当地居民要求收回自然保护区的权利，而环境保护团体则认为需要修建一个围栏，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防止生物栖息地遭到破坏。部分地由于这些运动所赖以产生的特殊环境，它们的政治取向和组织形式与以扩大再生产为核心的运动具有明显的不同。举例来说，萨帕塔起义并没有试图去推翻国家政权或实现政治革命。相反，它追求的是一种更为宽容的政治目标，它要与整个市民社会一起，更加开放和灵活地找寻一种能够照顾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特殊需求，容许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替代方案。从组织层面来看，它通常避免成为先锋派，拒绝以政党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事实上，它更希望继续作为国家内部的一种社会运动，并试图构建一种以本土文化为中心（而非边缘）的政治权力集团。因此，它所寻求的目标基本上是在墨西哥国家机器的支配下，在权力的领土逻辑的范围内进行一场消极的革命。②

① A. 罗伊：《权力政治》，2001，第86页。

② 约翰·纳什：《玛雅幻影：全球化时代的自治诉求》，2001；A. 莫顿：《墨西哥、新自由主义重构和EZLN：一种新葛兰西主义的分析》，载B. 吉尔斯主编《全球化和抵抗政治》（A. Morton，'Mexico，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EZLN：A Neo-Gramscian Analysis'，in Gills ed.，*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2001，第255～279页。

所有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将政治组织的领域从传统的政党和劳工组织转变为聚焦整个市民社会范围内相对较少关注政治动态的社会运动。从日常生活的政治的相关度和嵌入性来看，这些运动的所得就是它们的所失。它们从这种嵌入性中获取力量的源泉，但这么做也使得它们经常发现自己难以摆脱地域限制，特别是难以从宏观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剥夺性积累在过去和现在到底意味着什么。

然而，此处的危险在于将所有反抗剥夺的斗争都贴上“进步的”标签，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将它们置于某些同质的大旗之下，比如哈特与奈格里所谓的将飞速崛起并继承地球遗产的“大众”。[①]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困难之所在。因为如果马克思仅仅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话，比如原始积累在某些时候也存在积极的因素，比如“要做煎鸡蛋就必须先将鸡蛋打破”，那么我们就必须正面面对那些困难的选择。这些就是当前反全球化或另类全球化运动所面临的选择，这些选择存在着分裂当前似乎正在酝酿的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我将在下文中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两面性

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左翼的传统观点认为，无产阶级（被定义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雇佣工人）是历史演进的首要代理人。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和围绕生产所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工人阶级最初的组织形态为工会和政党，它们的目标是取得国家政权，以控制或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被理解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领域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就成了关注的重心。所有其他形式的斗争都

①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2000。

被看做是附属的和次要的，甚至被看做是肤浅的或不相干的而不予理睬。当然，尽管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诸多的细微差别，但重要的是所有观点无不赞同无产阶级是历史演进的唯一代理人。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这一理论所进行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并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但是工人阶级组织和政党日渐增长的权力非常显著地提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保护得以制度化。特别是在西欧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所出现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尽管这些国家也存在一些内在的困难与问题，但它们完全可以被视为渐进发展的典范。而且，如果这些国家在扩大再生产的框架里没有像民族国家中的那种相当专一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话，它们就不会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我认为承认这一成就的重大意义非常重要。

尽管专一也是一种生产力，但它具有太大的排外性。比如，试图将城市社会运动与左派议程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基本上都没有成功，当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除外。起源于工作场所和生产过程中的政治主宰了生存空间的政治。诸如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之类的社会运动仍然处于传统左派的视野之外。争取社会改善的内部斗争与帝国主义的外部替代特性之间的关系经常遭到忽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工人运动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即像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一样到国外寻求利益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借助帝国主义来达到这一目标）。对剥夺性积累的反抗则被认为是不相干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左派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无产阶级斗争，从而排斥其他一切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如果这两种形式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内部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由于完全忽视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左派不仅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其分析和做出计划的能力。

1973年之后，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动态发展中，世界各地的

工人运动都处于守势。尽管这些斗争所呈现的状态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取决于反抗的强度），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通常都是降低了这些运动的力量，并由此而影响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除了韩国之外，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生产的快速扩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上的，即独立的（相对于社团主义的）工会运动或者已经不复存在，或者遭到了强有力的镇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也遭到了暴力镇压（1965 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大屠杀是最为残暴的例子，当时苏哈托推翻了苏加诺政权，大概有一百万人遭到屠杀）。在世界其他地区，从拉丁美洲到欧洲和北美洲，金融资本的勃兴、更加自由的贸易，以及由开放资本市场内的跨界流动对国家的约束，使得传统形式的工会组织变得更加难以适应，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其更加难以获得成功。革命甚或改革运动（比如阿连德在智利所领导的运动）均遭到了军队的暴力镇压。

但是持续扩大再生产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也导致人们更加强调剥夺性积累的政治。当开始面对后者的时候，在反对前者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简单而言，在 1945 ~ 1973 年间所建立起来的左翼政治组织形式已经与 1973 年之后的世界不相适应，因为在 1945 ~ 1973 年的时候，扩大再生产正处于上升的态势，而 1973 年之后，剥夺性积累则已经走上前台，并成为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组织机构内部的首要矛盾。

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抵抗，这些政治抵抗将最终被有别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所武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最早认识到了这种差别，在论述他所称之为资本主义外围区域的斗争中，他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资本主义扩张所固有的不均衡性发展为历史的议事日

> 程添加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也就是外围地区人民（并非特指某个阶级）的革命。这些地区的人们反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他们无法承受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种革命是反资本主义的。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由于形势所迫，这些革命都具有复杂的特性。它们所表达的特殊的新矛盾（这一矛盾并没有出现在马克思所构思的社会主义转型的经典图景当中）给予了后资本主义制度以实质内容，那是一种最受欢迎的国家建设方案，其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三种潮流既相互结合，又相互斗争。

然而不幸的是，阿明继续写道，很多当前的运动

> 完全依赖由外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公众对无法接受的境遇所进行的自发反抗为生；然而到目前为止，它们都还没有达到同时实现现代化和广泛的公民权利这一双重革命的要求；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它们以过去的神话为基础的基本内容，仍在使用形而上的关怀在整个社会视野中仍具排他性的措辞来表达自己。①

尽管我并不认为剥夺性积累是外围国家所独有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些最为邪恶和残忍的积累肯定发生在那些在不均衡的地理发展过程中最脆弱和薄弱的地区。

然而，反抗剥夺的斗争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之上。很多斗争

① 萨米尔·阿明：《边缘地区的社会运动》，载 P. 维格纳拉杰编《南部的新社会运动：赋权于民》（S. Amin, 'Social Movements at the Periphery', in P.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1993，第 95 页。这本选集中有好几篇文章都敏锐地反映了这些主题。

是地方性的，其他一些是区域性的，还有一些是全球性的，这就使得控制国家机器——传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当这种转变与对社会主义类型的发展主义所抱有的期望日益破灭之后，寻找一种替代政治的愿望就显得愈加强烈了。正如阿明所看到的，这些斗争所要到达的目标也不尽相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初期的、零碎的或暂时的剥夺性积累的影响。这里对栖息地破坏，那里对公用事业私有化，另外一个地方进行圈地运动，再另外一个地方是生物剽窃——每个地方都创造了自己的斗争内容和形式。因此，当前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是为了响应这些斗争，在市民社会内部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兼具专门性与灵活性的组织形式。整个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全球化领域的斗争已经因此而发生了转变，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取向也已经开始运转。

很多评论者将这些独具特色的新运动冠上了“后现代”的名称。这也是人们在描绘萨帕塔组织的时候通常使用的词语。他们对这些运动的描述无疑是贴切的，但使用“后现代”这一名称却似乎有点不妥。在一个词上争论不休可能会显得有点傻，但其实质内涵却至关重要。首先，在固有的周期性和历史决定论前面加上“后”的标签存在一定的困难。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很多个原始积累和剥夺性积累的阶段。埃里克·沃夫（Eric Wolf）在其《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利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些斗争的其中一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此过程中，他没有采取任何方式使用后现代性这一概念。因此少许有些奇怪的是，我们发现约翰·纳什（June Nash）（其对恰帕斯州所发生的改变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证据）竟然同意用“后现代”这一名称来描述萨帕塔组织，当他把萨帕塔起义放到土著和农民的这种反抗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侵占，以及反抗国家不断剥夺他们资产的长期斗争的背景下进行

分析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我认为，就萨帕塔起义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斗争首先出现在低地森林地区，被赶出家园的当地土著居民与梅斯提索人（Mestizos，混血种人）在贫穷和根本无法从他们居住地的资源开发（主要为石油和木材）中获得利益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人们后来将这一运动仅仅描述为“土著居民”的运动有可能并不是为了实际描述这一运动的起源，而是为了从墨西哥的宪法条文中寻求合法性，以此保护土著居民的权益。①

就像否认剥夺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有机联系”削弱和限制了传统左派的观点一样，诉诸后现代斗争的概念也削弱和限制了新近出现的反抗剥夺性积累的运动。在反全球化运动中，这两种思想与组织形式之间的敌对早已露出端倪。持后现代斗争观点的这派认为，为夺取国家机器而进行的斗争没有必要，只是一种虚假的游戏。他们声称，答案在于将所有一切都本地化。② 他们还视工会运动为陈旧的、反动的和压迫性的组织形式，必须用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后现代形式的社会运动来取代它们。比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新兴的，与萨帕塔组织一样（尽管它们所处的环境与所赖以建立的社会文化基础与萨帕塔组织完全不同）反抗新自由主义力量压迫的工会运动，就发现自己遭到了排斥。另一方面，很多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新的运动过于幼稚，无异于自我毁灭，好像从中无法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最近在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上，与会者相互之间的争论充分说

① 埃里克·沃夫：《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E.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9；约翰·纳什：《玛雅幻影：全球化时代的自治诉求》，2001；A. 莫顿：《墨西哥、新自由主义重构和 EZLN：一种新葛兰西主义的分析》。

② 在《本地化：一项全球性宣言》（C. Hines, *Localization: A Global Manifesto*, London: Earthscan, 2000）一书中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也可参见 P. 维格纳拉杰编《南部的新社会运动：赋权于民》，2003。

明了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非常巨大。巴西工人党（该党明显具有“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观的”基础，并寻求通过部分传统左派的手段来获取支持）的上台执政导致这一争论更加尖锐和紧迫。

但是我们也不能将这些分歧埋葬于所谓“大众”的模糊概念之中。我们必须从政治层面和分析层面来面对它们。就后者而言，卢森堡的公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资本积累的确具有两面性。扩大再生产与剥夺性积累这两个方面是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必须将扩大再生产领域的斗争（传统左派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方面）放到与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此为在反全球化和另类全球化运动中聚合起来的社会运动所首要关注的问题）的辩证关系中进行考察。如果当前时期见证了积累的重心已经从扩大再生产领域转移到剥夺领域，如果后者存在于帝国主义活动的核心，那么要想均衡反全球化和另类全球化运动内部的各种利益，就必须将剥夺性积累视为需要面对的首要矛盾。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永远不能忽视这一斗争与扩大再生产领域的斗争的辩证关系。

然而这又重新提出了并非所有反抗剥夺的斗争都是进步的这一问题。在此我们只要看一下美国的民兵运动，抑或少数民族地区反对移民，反抗“外人”侵入他们视之为古老和神圣的土地的运动就可以了。这里的危险在于，缅怀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将阻碍那些贫穷和受压迫的人们谋求改善他们物质需求的努力；当地的这种排外行为将主宰在一系列地理尺度之上建立另类全球化的需求；重返过去的社会关系模式和生产体系将被假定成在一个不断前进的世界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这些问题而言，似乎很难找到简单的答案。

然而经常也会相对比较容易地实现某些层面的和解。在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罗伊对印度在纳姆达流域（Narmada Valley）大坝建设项目上的大规模投资所持有的观点。罗伊认为廉价的

电力供应有助于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她并不是一个反现代主义者。她反对建设大坝的理由为：（1）相对于其他发电方式而言，水力发电相对较贵，而且灌溉似乎并不能给农业带来多大好处（很难进行测量）；（2）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似乎太过巨大（并没有对此进行认真的评估，更不用说对此进行测量了）；（3）数额巨大的金钱流入大坝项目后，肥了一小撮顾问、工程师、建筑公司和涡轮制造商（很多都是外国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安然公司），这些钱完全可以更好地用到其他地方；（4）所有风险都必须由印度政府所承担，因为所有参与施工的公司都能确保获得投资收益；（5）数以万计的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失去他们的历史，丢掉他们的营生，这些人主要为土著民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Dalit，达利特），他们没有从大坝项目中得到任何补偿和获得任何利益。政府甚至没有考虑和通知他们，就突然在一个雨季灌满了大坝，最后导致他们的村子陷入齐腰深的水里。很明显，尽管这是在特殊的地区，需要用特殊的手段来进行的特殊战争，但是其普遍的阶级性已经足够明显，那就是“野蛮的”剥夺过程。[①] 在过去的15年间，单就印度而言就有至少3000万人由于大坝项目而被迫离开家园，这充分表明了剥夺过程的广度和野蛮性。但是能否实现和解，完全取决于是否承认剥夺性积累所发挥的基本政治作用为解释阶级斗争的支点。

不管正确与否，我的观点是政治运动（如果它们将会产生一些宏观的和长期的影响的话）必须超越对已经失去的东西的缅怀之情，必须准备去承认通过有限剥夺的形式（比如，通过土地改革或诸如联合森林管理等新的决策结构）所实现的资产转移也具有积极的后果。它们还必须设法去区别剥夺性积累进步与退步的方面，并设法引导前者通往一种更加广义的政治目

① A. 罗伊：《权力政治》，2001。

标，这一政治目标要远比许多地方运动更具普遍性，因为地方运动经常拒绝放弃它们自己的特异性。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寻找一些方法来承认那种存在于民众内部的多重认同（建立在阶级、性别、住所和文化等基础之上）的重要性，以及那种源于他们对资本主义侵入所作出何种反映的历史与传统轨迹的重要性，正如他们将自己视为具有与众不同且经常自相矛盾的特质与理想的社会存在一样。否则，就存在着重建马克思在描述原始积累时所存在的漏洞，以及看不到存在于被某些人轻视为“传统的”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体系的创造潜能的危险。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我们都必须寻找一些方法来超越所谓“大众”这一模糊的概念，同时避免陷入“不管对不对，那都是我的社区、位置或社会团体”的圈套。最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内部的斗争和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之间的连通性必须得到辛勤的培育。幸运的是，在这一方面，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存在于金融制度安排（融入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中的联系这两种斗争形式之间的纽带已经得到确认。它们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抗议运动关注的首要目标。随着政治问题的内核已经得到如此清晰的确认，现在应该可以从外部建立一种更为广泛的创造性破坏的政治，以反抗由资本主义霸权国家所强加给世界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体制。

剥夺性积累的帝国主义

约瑟夫·张伯伦在20世纪初叶带领英国进行布尔战争，吞并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其动机非常明显，那就是侵占当地的黄金和钻石资源。然而正如我们此前所看到的，他之所以转向帝国主义逻辑，原因在于无法从内部找到任何解决长期困扰英国的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办法。这种无能为力的境

地与英国国内的阶级结构有重大关系，因为这种阶级结构阻碍了将剩余资本大规模地应用到国内社会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可能。同样，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介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牢固地控制住中东的石油资源。自卡特总统第一次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准备运用军事手段来确保中东石油不间断地流入全球经济以来，美国获取这种控制力的需求就一直不停地稳步上升。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与石油价格的上涨有关，因此石油价格的普遍下降可以被视为解决过去30年来持续的过度积累问题的其中一个策略。就像19世纪末英国所发生的那样，这些年来阶级利益布局对美国内部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阻碍，对于美国日渐公开地转向帝国主义政治而言，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美国入侵伊拉克与英国发动布尔战争具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它们均发生在霸权终止的初期阶段。

但军事干预只是帝国主义的冰山一角。霸权国家通常会确保和提升外部的和国际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些制度安排中的非对称性交换关系能够使它们大受裨益。正是通过这种手段，霸权国家有效地从世界其他地方榨取了贡品。自由贸易与开放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早已主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生产、服务和金融）中的垄断势力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剥夺性积累的首选工具就成为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压力，强迫整个世界打开市场，而为此作后盾的，则是美国（其次为欧洲）拒绝那些拒不放弃本国保护政策的国家进入其巨大的市场。

然而，如果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长期的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以及在政治层面上拒绝通过内部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上述一切都不会像现在这么重要。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私有化的国际主义政治的勃兴），它已经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与世界不同地区周期性的

以掠夺为目的的资产贬值结合了起来。而这似乎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所在。简而言之，美国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发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30年所发现的东西，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的“掠夺”，这一使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可能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得以重复，否则会使积累的动力突然停止”。[①] 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新帝国主义”似乎只是在重复已经逝去的帝国主义，尽管时间与地点均已完全不同。这一命题是否已经足够概念化还仍然需要进行评估。

① 汉娜·阿伦特：《帝国主义》，1968，第28页。

第五章
从认同到强制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起源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两种逻辑完全不同且绝不可能相互转换，但它们却紧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们彼此可以被视为对方的内在联系。但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这种内在联系可能会有着很大的不同。每种逻辑所产生的矛盾都必须为对方所容纳。例如，由于需要创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权力积累，资本的无限积累在领土逻辑内部必然会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当政治控制在领土逻辑内部发生转变的时候，资本流动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转变来加以适应。各国根据自身独特的规则和惯例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由此而产生了各种不尽相同的执政风格。这就为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地缘政治斗争，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政治创造了基础。因此，如果不首先从各个方面弄清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我们就无法理解帝国主义。不同的国家可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1870～1945 年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所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即是明证。如同帝国一样，帝国主义也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形态。尽管可能存在诸多偶然性因素——实际上，由于政治斗争被限制在权力的领土逻辑之内，因而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方式——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主动借助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与外部关系之间的双重辩证关系，为各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牢固的解释性框架。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美国最近从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形式的转变。为了应对1973～1975年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次剧烈的重组。金融流动成为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的主要表现方式。然而一旦金融资本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国家机器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压力也随之上升。在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下，许多国家逐步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另外一些国家或者设法仿效这些带头的资本主义，或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被迫通过结构调整政策来这样做。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典型做法是设法圈占公有财产，进行私有化，并且构建一个开放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架构。这些国家必须维持劳动纪律，培养“良好的商业环境”。如果某个国家未能或拒绝这么做，那么它将面临被划为“失败”或“流氓”国家行列的危险。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剥夺性积累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幕后状态重新走上前台，成为资本主义逻辑的主要特征。在此，剥夺性积累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廉价资产的释放为吸收剩余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将贬值的剩余资本投入到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如果反复无常且难以计数的信贷和流动资金危机是全球经济的一大特点，那么帝国主义就必须通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来调和这些危机，以此保护资本积累的核心区域免受贬值的打击。这也正是20多年以来，“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及欧洲和日本当局所成功实施的行为。

但是转向金融化会产生许多内部成本，比如去工业化、紧跟信贷紧缩而至的急剧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举例来说，除了国防、能源和农业综合企业以外，美国已经丧失了在其他生产领域的世界主导地位。全球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为其他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创造了机会，这种融入最初是作为

剩余资本的吸收者，随后便是剩余资本的生产者。由此它们也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竞争者。随着每个资本积累的发展中心均通过划定势力范围来为自己的剩余资本寻找系统的时空修复，那种所谓的“次级帝国主义”不仅已经在欧洲，而且已经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但这些势力范围是彼此重叠和相互渗透而非互相排斥的，这充分反映了资本流动在空间中所具有的灵活性与易变性，以及日渐忽略国家边界的相互依存的空间网络。

然而，这一体系的受益者高度集中在跨国公司总裁、金融家和食利者等有限的阶层之中。尽管出现了跨国资产阶级，但他们仍将华尔街及其他一些金融中心，比如伦敦和法兰克福作为资本安置的安全场所。这一阶级仍一如既往地指望美国来保护他们在全球的资产价值和财产权与所有权。尽管经济权力似乎仍然高度集中在美国，但其他地区也可能并且实际上已经集中了相当的金融权力。集中于欧洲和日本市场的资本完全可以获得相应的利润，正如几乎所有的食利者阶层都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矩阵中找到正确的位置一样。债务危机可能会压垮巴西和墨西哥，流动资金危机可能会摧毁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但是这些国家的食利者不仅能够保护他们的资本，而且实际上还提高了他们的内部阶级地位。特权阶级可以将自己隐匿于孟买、圣保罗和科威特的“镀金隔离区”，同时享受着他们在华尔街的投资成果。因此，尽管华尔街到处充斥着金钱，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金钱都属于美国人。华尔街的问题在于它要为它所掌握的全部盈余货币找到赢利性归宿，而无论这些货币是否为美国人所有。

资产阶级权力的地理分散性不仅适用于食利者和金融界，而且生产资本也从这种空间变动性和多变的领土逻辑中获益良多。电子、制鞋和制衣等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利用地理流动性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其他一些社会团体随后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例如，中国的海外华商由于愿意和能够从这种流动性

中获取利润，所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转包商进入拉美和南部非洲并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他们的雇员的工作条件却相当恶劣。①

但这只是当前世界的一个特殊现象，由金融家、总裁和食利者所构成的日渐强大的跨国资产阶级应当利用领土霸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和建立那种机制体系来帮助他们在世界上积累财富。这一阶级很难对某一地域或国家产生忠诚，也不会遵循某一地域或国家的传统。它可能是多种族、多民族、多元文化和世界性的。如果金融危机和利润诉求需要他们关闭自己后院的工厂并降低它们的制造能力，跨国资产阶级绝对会这么做。例如，美国金融界完全赞同削弱美国在生产领域的霸主地位。这一体系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达到顶峰，先后由鲁宾和萨莫斯执掌的财政部利用国际事件极大地促进了华尔街食利者的利益，尽管这么做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冒很大的风险。这一系列事件的高潮是1997～1998年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竞争者的惩罚，当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允许欧洲和日本，当然首先是美国以极低的价格抢购资产，并以此增加它们的利润线，而由此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别处大规模的货币贬值和人民的生活遭到破坏。然而，这只是1980年以来，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备受折磨的数不清的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其中一个例子。

国外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容易导致国内产生长期的不安全感。很多中产阶级者开始将保卫领土、国家和传统作为武装自己，对抗掠夺性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试图调动权力的领土逻辑来保护他们免受掠夺性资本的影响。过去曾使民族国家和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在小资产

① G. 哈特：《失灵的全球化：南非废除种族隔离的权力之地》（G. Hart,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崛起，并成为他们组织起来反抗金融资本四处横虐的武器。由于谴责移民问题是精英阶层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转移视线的一种便捷方法，因此建立在种族和宗教之上的排外政治开始繁荣起来，尤其是在欧洲，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已经获得了相当多民众的支持。1996 年，企业界和金融界精英齐聚达沃斯，表达了对工业民主国家内部反对全球化的“日益上涨的浪潮”有可能会“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担忧。不断蔓延的“无助和不安”的情绪已经导致了“一种新型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的诞生”，而这将“很容易演变成骚乱”。①

但是到那个时候，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开始形成，人们开始攻击金融资本及其主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谋求收回公有财产，并且要求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国家、地区和地方差异性的空间。由于国家非常明确地站在金融家一边，且在剥夺性积累的政治中一直扮演着主要行为者的角色，因而反全球化运动只好从市民社会的机构寻求帮助，以求从地方到全球等各个层面来改变权力的领土逻辑（环境运动即是如此）。四处横虐的欺诈、掠夺和暴力激起了很多暴力反抗。有可能依附于正常运转的市场的表面文明已经荡然无存。遍布世界各地的反抗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遭到了国家的残酷镇压。低烈度战争遍及世界各地，并且通常会得到美国的暗中干涉和军事援助。

这些反抗运动避开了传统形式的劳工组织，比如工会和政党，他们甚至不再谋求获得国家权力（其已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妥协的产物），他们开始寻求自己自主的社会组织形式，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非官方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例如萨帕塔组织），

① 引自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D. Harvey,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第 70 页。

以此改善他们的生活，保护他们免遭资本主义的掠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企图控制这些社会运动，引导它们通向特殊的渠道，其中有些渠道是革命性的，而另外一些则是对新自由主义政权进行适应。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激起了一系列地方性的、分散的和差别很大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在面对由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国家所精心安排的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实践的时候，采取了对抗或远离的态度。

新自由主义所固有的易变性最终重返美国的核心地带。最早于1999年出现在高科技网络经济领域的经济崩溃很快扩展开来，使人们认识到大量所谓的金融资本实际上只是由不切实际的会计核算和彻头彻尾的空资产所支撑的不可收回的虚拟资本。甚至在“9·11”事件之前，很明显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就已经从内部开始衰弱，即便华尔街的资产价值也无法幸免，新自由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特殊形态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然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将会形成何种类型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会产生何种类型的帝国主义。

乔治·W. 布什，一位重生的基督徒，在幸运地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将一帮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带进了权力中心。就像此前的新自由主义者一样，新保守派在无数的“思想库”中得到了很好的资助和组织，并且一直试图将他们的议程强加于政府。这是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它的首要目标是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建立并尊重某种秩序。这意味着上层要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和下层不可动摇的忠诚度，同时还要建立一个既牢固又清晰的权力等级制度。对于新保守主义运动而言，坚守道德准则也至关重要。基于此，新保守主义发现其骨干和选民基础是那些拥有独特信仰的原教旨基督徒。例如“9·11”事件发生以后，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和帕特·罗宾森（Pat Robertson）（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都表达了这样

的观点，即这一事件是上帝对这个社会放任堕胎和同性恋的愤怒的表现。后来，在美国一档收视率极高的时事类电视节目中，杰瑞·法维尔宣称穆罕默德是第一位大恐怖分子，其他人则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及沙龙对巴勒斯坦的暴力政策，因为这将导致“哈米吉多顿”的（Armageddon，世界末日时的善恶大决战）和“基督复临”。信仰《启示录》和相信“哈米吉多顿”的人到处都是（比如里根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尤其对欧洲人而言，很难理解为什么大约有1/3的美国人都坚守这些信仰（包括创世说而非进化论），而这也意味着很多美国人都接受恐怖的战争（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是在人世间实现上帝意愿的先行军这一观点。由于这些观点在美国南部更为流行，因此现在大多数美国军人都是从那里招募而来的。

尽管新保守派知道他们不能在台上坚持这一政见，但基督徒右翼的影响不能被低估。未能对沙龙强加于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暴力压制政策（这被原教旨主义者解释为通往“哈米吉多顿”的积极举措）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很难阻止这些观点陷入十字军东征，以对抗伊斯兰圣战的花言巧语，从而将亨廷顿难以令人信服的文明的冲突即将来临的论点演变为地缘政治事实。①

1997年出台的《新美国世纪计划》对新保守派对外政策的内核进行了规划。② 正如卢斯在1941年所做的那样，这一标题所表达的是“世纪”而非“领土控制”。因而，它故意重复了史密斯从卢斯的文章中所揭露的遁词。③ 这一计划“致力于以下一些基本命题：美国的领导权既有利于美国，又有利于世界；这

①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7。

② 网址为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

③ 参见尼尔·史密斯《美帝国：罗斯福的地理学家和全球化的先驱》，2003。

种领导权需要军事力量，外交能量和遵循道德准则；当今世界只有很少的政治领袖能担负起全球领导权”。这些原则均清晰地体现在布什总统纪念“9·11”事件一周年的讲话中（第一章有所引用）。尽管这些原则只是独特的美国价值观，但它们却被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美国还将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尊重私有财产、个人主义和法律等捆绑起来，作为全世界的行为准则。这一计划还试图“争取人们对美国强大的、原则性的国际参与政策进行支持”。这意味着将一系列适当的行为准则输出到，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然而，这一计划的大部分核心成员均来自此前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门，他们是“军工联合体”的主要代表。尽管艾森豪威尔早在很久之前就明确提出要警惕“军工联合体”的力量，但在里根政府时期，其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小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关键职位是在财政部（鲁宾和萨莫斯曾担任部长），但小布什政府则更加倚重其国防专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鲍威尔——来打造国际政策，并依靠基督教保守派阿什克罗夫担任司法部长来加强国内秩序。因此，小布什政府是一届由新保守派所主导，与“军工联合体”（还包括美国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能源部门和农业综合企业）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道德判断上得到原教旨基督徒支持的政府。他们的任务是在权力的领土逻辑内巩固由少数人所领导的政治议程背后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很好地理解了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之间的联系。他们直观地接受了阿伦特的观点，即在海外推行帝国政策需要在国内实行专政，只是他们的表述方式不同罢了。在海外进行军事行动需要在国内奉行准军事化的政策。

伊拉克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新保守派关注的重心，然而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那样，此处的困难在于如果没有类似“珍珠港”这样大规模的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民是不大可能被动员起来支

持军事干预政策的。“9·11”事件为此提供了绝佳的时机，新保守派紧抓这一突如其来的社会团结和爱国主义来构建美国式的民族主义，以此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努力和内部控制提供基础。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甚至那些此前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实践的人都开始支持政府发动反恐战争，并准备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某些公民自由。指控所谓的不爱国已经成为压制批评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借口。媒体和政党全都站到了同一战壕。这就使得政治领导人能够在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颁布强制性法案——最为著名的是《爱国者法》和《国土安全法》。对公民权利的严格限制得以确立。犯人在关塔那摩监狱遭到非法拘禁并无权进行申诉，“嫌疑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在这里，很多人被关押数月之久都还没有得到法律建议，更别提审判了。警察可以以怀疑从事“恐怖主义”为名而任意拘留任何人，而且很快就清楚不过的是这甚至还包括那些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人。极端的监视手段开始得以应用（联邦调查局有权调阅图书馆的借书记录、图书采购记录、上网记录、学生的入学记录和潜水俱乐部的成员记录等）。美国政府还抓住这一机会来削减各种针对穷人的项目（在为国家作出牺牲的名义下）。它所强制推行的减税方案（以刺激经济为名）明显有利于只占全美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它甚至还试图建议取消股利税，以求增加华尔街的资产价值。但是正如华盛顿、麦迪逊和其他很多人早就认识并担心的那样，这些政策与那些严重违反《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的行动一起，只有通过在国外实行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才能得以维持下去。在“9·11”事件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以及美国国内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大气候下，甚至那些自由派也开始支持入侵阿富汗、击溃塔利班和在全球搜寻“基地”组织的观点。

为了维持这一势头和实现他们的雄心，美国政治的偏执狂风格必须得以付诸实施。新保守派长久以来一直关注伊拉克、

伊朗、朝鲜以及其他几个所谓“流氓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威胁。不过新保守派的心中还经常潜伏着中国的身影，因为他们一直担心中国会成为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充满潜力却又不可预测的强大竞争对手。新保守派和“军工联合体”之间的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向克林顿政府施压，要求提高军费开支，并做好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战争——比如同伊拉克和朝鲜之类的“流氓国家”——的准备。美国之所以将伊拉克作为核心目标，一方面是因为其地缘政治位置及独裁政权（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得对这一政权进行经济制裁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威胁要领导一场世俗化的泛阿拉伯运动，该运动有可能会控制整个中东地区，并有可能会通过控制石油资源而控制全球经济。卡特总统曾一再表示坚决不能容忍任何试图以这种方式利用石油的企图，至少可以追溯到1980年，他就命令美国部队进入了这一地区。第一次海湾战争并没有改变巴格达政权，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并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美伊双方对强加给伊拉克的战后解决方案都不满意。伊拉克人进行了抵制，但制裁仍被强制执行；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了伊拉克，但随后遭到驱逐；美国利用军事手段将库尔德人保护在北部的一个自治区内；随着美英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的禁飞区执行联合巡逻任务，伊拉克上空的低烈度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克林顿政府将伊拉克划为“流氓国家”，并准备改变巴格达的政权，但他却一直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限定在隐蔽的行动和公开的经济制裁方面，而新保守派却公开宣称这些措施并不能奏效。

“9·11”事件之后，新保守派终于有了他们的“珍珠港”事件。但困难在于伊拉克显然与基地组织没有关系，因此只能优先进行反恐战争。在入侵阿富汗的过程中，美国军方在战场上充分检验了其大部分的新式武器，这几乎成为美国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进行战争的彩排。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分别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从而将里海油田置

于军事打击的范围之内（里海油田的石油储量仍是一个谜。为了确保石油供应，以满足其快速增长的内部需求，中国也力争在此获得一个立足点）。六个月后，随着成功击败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政权，美国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伊拉克。到2002年夏天，已经非常明显的是美国无论如何都要采取武力来改变巴格达政权。

在这一问题上，唯一有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取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为此，美国政府释放了各种烟幕弹，每天不断变换言辞，并将一些未经证实的论断当成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第一章曾对此作过描述）。美国寻求构建一个自愿联盟，其中英国由于早已深陷伊拉克的日常军事行动（并且英国已经很难从伊拉克抽身），自然成为联盟的主角。最初，美国拒绝联合国发挥任何作用，甚至声称不需要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批准，但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却不得不向来自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压力作出某些让步。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培育在“9·11”事件后才兴起的民族主义，并利用它来推行所谓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对美国国内安全至关重要的帝国计划。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利用这一帝国计划来建立前所未有的内部控制（为美国国内战线的恐怖威胁和其他安全担忧所进一步强化）。不幸的是，正如阿伦特再次敏锐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求助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就无法实现结合，贬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公众形象以及美国官方对待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游客和移民的政策，无不表明种族主义正在美国呈上升之势，而这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来看，都将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尽管目前局势瞬息万变，而且美国政府经常会在声明中制造烟幕弹，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大致地判断出美国新保守主义帝国计划到底要走向何方。因此，我将以概括这一方向和评价其反对力量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新保守派认为伊拉克的重建工作应该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日本和德国所走过的道路。伊拉克将为公开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进行自由化，以此沿着西方的道路最终创造一个富裕的消费主义社会，从而为中东其他地区树立榜样。伊拉克将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下建立必需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将逐步转交给伊拉克代理政府当局（最好像日本自由党那样软弱）。伊拉克将继续保持非军事化状态，并将获得继续留在海湾地区的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①] 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将被用来资助战后重建和补偿某些战争损失，并如希望的那样以足够低的价格（能够方便地用美元而非欧元标价）输入世界市场，以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全球经济的恢复。

然而，这并不是新保守派帝国野心的全部。他们已经开始谈论伊朗（美军占领伊拉克之后，将全方位包围伊朗并对其进行威胁）和指责叙利亚。针对这些日益清晰的言论，英国外交大臣认为英国必须明确表示坚决不参加针对叙利亚或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再明确表示的那样，新保守派的立场是美国并不需要英国来协助实现其目标，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将单独采取行动。美国正逐步增加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压力，同时还希望沙特阿拉伯进行内部改革，这一方面可以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夺取沙特政权（毕竟，这是本·拉登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对付大多数由沙特所支持的反对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活动。与此同时，美国现在已经开始磨砺（并在伊拉克进行试验）其名为“震撼与威慑”的军事能力，以求瞬间摧毁朝鲜对准首尔的数百枚远程火炮。如果美国愿意的话，它可以在 12 小时之内摧毁朝鲜所有的军事力量和核设施。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所隐藏的似乎是某种地缘政治远景。随

① 对此，C. 约翰逊在其著作《反冲：美帝国的代价与后果》一书中有很好的描述。

着占领伊拉克，在沙特阿拉伯进行改革，将叙利亚和伊朗置于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存在的控制之下，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将在欧亚大陆获得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桥头堡，这一桥头堡正好位于世界的产油中心，而这些石油不仅供给了全球经济，而且供给了每一个敢于反对美国的大的军事机器。这一桥头堡的获得，将确保美国在未来的50年内继续称霸世界。如果美国可以巩固其与波兰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土耳其（存在很大问题），一直到伊拉克和稳定的中东地区之间的联盟，那么它将切实有效地在欧亚大陆划出一条线，将西欧与俄罗斯和中国分割开来。这样一来，美国将通过其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优势而在军事上控制整个世界，将通过石油而在经济上控制整个世界。这对应对任何来自欧洲，甚或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崛起为经济或军事大国和亚洲地区的潜在领导者似乎会对新保守派构成严重的威胁。新保守派似乎正在实施一项可以说是完全控制整个世界的计划。[①] 在那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而有序的世界里，人们希望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保护伞下实现繁荣。在新保守派看来，世界其他地区（抑或至少是所有的有产阶级）应该并且将会感激遍布各地的自由资本主义为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

当然，在此所存在的一个重大且未定的问题是，这一计划是否能够或是否将会发挥作用？毫无疑问，甚至在布什政府内部和军方也有一些人怀疑这一计划的可行性，甚或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布什政府内部的力量平衡仍然取决于新保守派集团，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比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结束后，新保守派的声望是加强了还是被

① D. 阿姆斯特朗：《迪克·切尼的美国赞歌：设计全球统治的蓝图》，载《哈泼斯杂志》2002年10月，第76～83页。

破坏了。如果长期混乱地占领巴格达的话，将会对所谓的对伊战争是一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争，而非一场单纯为占领伊拉克而进行的战争这一信念带来严重的后果。

但是外部力量对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抵制。首先，这一计划越清晰，它就几乎越肯定会遭到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不仅仅是丧失权力的国家的联合抵抗。正如基辛格一度担心的那样，如果与美国进行对抗，一个相对统一的欧亚权力集团并不必然会失败。此外，如果美国确实要对伊朗和叙利亚下手，英国几乎肯定会放弃对美国的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行为的支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曾经支持美国的欧洲国家，比如西班牙和意大利，由于违背了本国人民的意愿，必然也会放弃对美国的支持，这就使得欧洲变成了一个反对美国计划的更加统一的权力集团，而非现在这样既有支持美国又有反对美国的集团。随着美国变得越来越孤立，世界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内部反对美国的声音也将变得日益强大。

新保守派将美国过多的精力浪费在谋求成为道义领袖上面，但其通过真正认同而进行领导的能力却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它的文化影响力似乎也正在逐渐衰落。实际上，美国不得不试图在联合国内部花钱来获得赞成票（美国似乎将联合国当成了某种传统的芝加哥基层选区的政治活动的形式）。然而即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土耳其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面临威胁将对其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情况下，美国都没有成功收买土耳其，这也说明了此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在世界各个地区，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真正认同美国，甚至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在本国民众的眼里，也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认同美国了。美国已经放弃了通过认同而获取霸权的努力，相反越来越开始通过强制来获取支配权。正如鲍威尔所指出的，美国长期以来就渴望成为“街区里的霸主”，但是接下来他关于其他国家会接受这一

点，因为它们相信美国会做出正确事情的断言现在已经失去了可信度。日渐上升的全球反美浪潮（以2003年2月15日世界范围的反战游行示威为代表）已经成为一股美国不得不应付的力量。

新保守派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一旦在全世界建立了秩序并证明这一秩序的益处，那么那些不管是民众还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对其军国主义行为的反抗都将烟消云散。这一观点不仅具有些许乌托邦的性质，而且即便要部分实现这一观点，都完全依赖于它所产生的益处的性质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分配。然而，新保守主义也相信自由商品市场和自由资本市场包含了能给全人类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所有必备因素，在这一点上它与新自由主义出现了重叠。但这一点已被证明是完全不可能的，新保守派所做的一切只是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各地进行的低烈度战争转变成剧烈的对抗，并希望这种对抗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新保守主义将继续一种建立在剥夺性积累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剥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是其臭名昭著的起点），并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当前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急剧扩大的不平等。实际上，如果他们的税收政策还靠得住的话，新保守派将尽一切可能来维持这种不平等，因为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过这种方式奖励有创造力和有才能的人将会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从这方面我们可以预想，全球反抗剥夺的斗争和甚至已经激起民选政府（比如巴西的卢拉政府，其即便不想完全收回，但也试图减少新自由主义所操纵的领土）另类全球化运动的动乱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进一步增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各国采取民族主义和排外政治的方式来防御新自由主义的掠夺。美国自身已经越来越将种族主义作为一种连接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蜕变将很难得以扭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新保守派的帝国计划如何才能为阿拉伯地区，甚或更为辽阔的伊斯兰世界所接受。

就这一问题而言，新保守派正在踏上特别危险的地域。首先，与阿拉伯世界建立任何友好关系都必须建立在解决阿以冲突的可行性方案之上，而布什政府对于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持沉默的态度，除了偶尔发表一些既定的言词之外，而且这些言词通常也只是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特别是来自英国的压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表面上的漠不关心和拒绝作出任何努力来阻止沙龙在以色列所实施的政策，原因在于犹太复国主义罪恶联盟的影响，它得到了美国国内原教旨基督徒在末世论指引下的强力支持。在中东地区部署美帝国的权力却不提出任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对于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甚或超出阿拉伯世界的存在而言，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打击。毫无疑问，这将成为反抗以色列和美国的零星暴力活动的源泉，并有可能会点燃穆斯林世界的内部革命。

其次，将伊拉克作为伊斯兰世界撕下原教旨主义的标签、放弃反民主道路的示范项目的观点，完全是建立在即便不是荒唐可笑但也着实牵强的论点之上的，这一论点就是伊拉克可以在美国的监护之下，迅速转变成为繁荣的、资本主义的和民主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伊拉克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拥有大量的科学人才和技术知识；在美国和萨达姆合起手来破坏之前，伊拉克还拥有相当可观的产品制造基地和农业基地。剩余资本肯定会在重建伊拉克的过程中找到出路，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规则仍然牢牢控制着贸易和金融流动，加上非常普遍的过度积累问题，在未来的几年里，伊拉克很难获得像韩国那样的发展。而且即便伊拉克准备这么做，我们也根本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能够发挥示范效应，因为在过去的 20 年里，尽管获得了大量美国的支持，那些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比如巴基斯坦和埃及，都没有取得成功。伊拉克经济有望在占领状态下获得发展的唯一可能在于全球经济的复苏，而这一复苏要远比二战后的经济复苏更为强大。

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关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前的经济环境；二是前文所论及的那一过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指向这样一种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这一逻辑无论如何都会与新保守派帝国主义所试图强加的特殊形态的领土逻辑相适应或保持一致。尽管如往常一样很难对此进行准确的预测，但这两种逻辑即便不是完全对立，似乎也存在很深的矛盾。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中的其中之一就不得不作出让步或面临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种分离状态的首要标志是什么呢？

首先是战争本身的耗费。伊拉克战争的花费不会少于两千亿美元，并且这可能还不够。可以肯定的是，有充足的剩余资本可以为其提供资金，但这些剩余资本需要投资收益，这意味着或者从国防和战后重建工作中获取利润，或者从政府债务中收取利息。投掷炸弹并不是生产性投资，也不会向循环和积累过程返还价值，除非我们将石油价格下降为每桶 20 美元视为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部分投资收益。当然，伊拉克的石油可以被用来偿付战争，但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伊拉克内部重新发展所需，并因此而阻碍伊拉克为中东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发挥示范作用的可能。众所周知，要想将伊拉克的石油产量提高到能够满足上述两方面需求的水平，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不管怎样，伊拉克在过去还欠有大约两千亿美元的债务（其中俄罗斯一家占了 640 亿美元），而且科威特还强烈要求其赔付至少一千亿美元作为入侵科威特的代价。在美国的监护之下的伊拉克，如果没能偿付这些欠债，那么国际社会（尤其是俄罗斯）将会非常不满。

因此，美国除了大量举债来支持这一战争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即便在最好的情形之下，美国不断飙升的财政赤字所给人们的总体印象也不会太好。但是在目前经济停滞、资产价值贬值和税收缩水的情况下，这种为了军事目的而进行赤字开支

的做法将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出现更严重的倒退，而不是帮助其从内部进行复苏。军费开支有时候被认为（比如卢森堡）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有时被称为“军事凯恩斯主义”），但它们最多只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挥这种效能（取决于重新装备那些消耗掉的军用物资所需要的时间）。而且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来自这方面的短期刺激都会完全被不断下降的消费信心以及阻止人们外出旅游或参与任何看似有危险的活动的恐怖气氛（政府为了自身的目的而直接使用这种气氛）所抵消。因此，航空公司或者被迫关闭，或者陷入破产，旅游和休闲娱乐行业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失业和失去社会保护（比如失去医疗保险，甚至养老基金）正在蔓延到美国经济的各个角落。纽约经济现在已经陷入比1973～1975年危机时期更加危险的境地，它的财政赤字看来肯定会在未来两三年内将其推向技术性破产。

美国经济在国际上所处的不利位置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外国人现在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国债和18%的公司债券（为1980年前后的两倍以上），而且美国现在每天需要引进20亿美元的国外净投资，以弥补其拖欠世界其他国家的持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①]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这使得美国经济在资本外逃面前显得异常脆弱，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相对价值的下降已经使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迹象。金融资本的力量在支撑而非严重损害美国的方面，形势正在往坏的方面逆转。由于布什政府缺乏有效的国家行动，资本主义逻辑正在迫使美国丧失经济权力，而非像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那样给美国带来经济权力。流入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的投机资本尽管

① A. 克鲁格：《经济景象》，载《纽约时报》2003年4月3日（A. Krueger, ‘Economic Scene’, *New York Times*, 3 Apr. 2003），第C2版；J. 麦德瑞克：《伊拉克定时炸弹》，载《纽约时代》星期天杂志2003年4月6日（J. Madrick, ‘The Iraqi Time Bomb’, *New York Times*, 6 Apr. 2003, Sunday Magazine），第48页。

也给这些国家带来短暂的繁荣，但它们突然之间就陷入了资本外逃和经济灾难之中，以此类推，投机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流入华尔街也给美国带来了繁荣，但这种繁荣过后也可能是资本外逃和经济灾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初见端倪）。当然，美国的情况可能会与那些国家有所不同，因为美元总归还是全球资本的避风港，而且铸币特权仍然还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的信心。美国政府越认为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军工联合体”、新保守派和甚至更令人担心的原教旨基督徒之间的联盟，资本逻辑就越会将华盛顿的政权更迭作为其生存的必要前提。这可能会产生如下结果，即使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陷入停顿。不然的话，由于当前政府可能会更加强烈地转向持久的战时经济，从而导致资本大量外流，这对美国而言无异于经济自杀。因此对于美国而言，突然转向军国主义应该是其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其全球霸权的最后拼死一搏。

但是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计划可能带来另一个方面的潜在破坏。由于奉行“单边主义”，美帝国完全没有认识到当前存在于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领域的资本主义组织结构（capitalistic organization）内部的高度跨界一体化。美国威胁抵制法国和德国的商品和欧洲反过来抵制美国的商品基本上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对于任何一方而言，另一方的商品通常都含有本方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价值。但是不断上涨的民族主义（当前主要为战争和反抗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所促进）的确可能会限制国际资本的流动和积累的力度。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任何上升的趋势都会加剧退回到区域性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框架的可能，这方面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更不用说“文明冲突论”已经日渐成为现实了。但是退回到区域性权力集团会导致排外性的增加，从而导致各集团之间出现相互竞争的局面，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这种各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所导致

的。在这方面列宁的观点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我想大概没有一个人希望重复那段历史，因为缓慢但却明显地通向这种解决之路将会更加令人不安。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层面上继续这一新自由主义政治，即便不需要增加，也需要继续其他方式的积累，亦即剥夺性积累。由此而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全球反抗运动的更加高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则是国家权力对民众运动的镇压。这就意味着需要继续过去 20 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全球经济所特有的低烈度战争，除非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减轻全球过度积累问题。我曾对此进行过论述，唯一的可能性是中国正在着手进行的，从本质上而言相当于原始积累的大规模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将会激起相当速度的经济增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能够吸收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资本盈余。这种假设必须建立在这一过程不会在中国引发反革命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这一过程获得成功，大规模剩余资本转入中国对于美国经济而言将会是一种灾难，因为当前美国经济完全依靠资本流入来支撑其自身的非生产性消费。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将是美国经济也必须进行类似的“结构调整”，这就需要美国实行一种前所未有的紧缩政策，这是一种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就没有再度实施过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会坚决利用其石油力量来限制中国，最起码在中亚地区挑起地缘政治冲突，甚或将其扩展为更加全球性的冲突。

在任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控制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性方案（尽管为临时性方案）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新的“新政”。这就意味着要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重新分配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特别是“军工联合体”的不良影响）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从而控制从国

际贸易条款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耳闻目睹的一切。这将导致重返一种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而这一帝国主义则最好通过考茨基在很久之前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而得以实现。

然而，欧洲现在所偏爱的那种超帝国主义也有其自身的消极内涵和后果。假设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布莱尔的顾问）是值得信任的，他支持以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名义重新恢复19世纪关于文明国家、野蛮国家和未开化国家之间的划分，其中后现代国家是文明的协作行为的保护者，它有望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使世界各国遵循普遍（即“西方的”和“资产阶级的”）准则和人文（即“资本主义的”）实践。从这一角度来看，后现代国家——主要为欧洲各国——绝对不是“老欧洲”，而是在美国之前摆脱困境的那些国家，因为美国在摆脱现代主义的道路上似乎还存在一些困难。这一困难类似于允许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方面赞扬诸如他们自己的“文明”国家的代议政府的信条，另一方面却为保持对印度的监护和从国外索取贡品进行辩护。由于不能通过扩大再生产而强有力地恢复持续性的积累，为了避免积累出现中断，这种欧洲的自由帝国主义版本只能在世界上陷入更深的新自由主义的剥夺性积累政治的泥淖。这种集体帝国主义的选择模式将很难为世界各国的人民所接受，因为他们已经经受了（并且有些人已经开始反抗）剥夺性积累和与之相伴随的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不管怎样，像库珀等人所建议的自由主义策略，对于后殖民主义学者而言太过熟悉，以至于没有多少吸引力。

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当前时期，在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之下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构建一种新的“新政”，在面临压倒性的阶级力量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对的时候，完全有能力进行反击。而且这一新的“新政”

有可能通过充分追寻一些长期的时间空间积累，从而至少在几年之内真正缓和过度积累问题，降低剥夺性积累的需求，这样一来便有可能鼓励民主、进步和人道的力量与其相结合，并将它变为某种现实。与当前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所推行的野蛮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相比，这一帝国发展道路似乎要平和与仁慈得多。

当然，必须为这一新的“新政”进行战斗的真正战场其实存在于美国内部。从这方面来说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因为美国严重削弱公民自由，且长期以来认为在国外推行帝国主义必须以在国内推行暴政为代价，这就为政治反抗，至少为那些真正相信《权利法案》的人和那些与当前操纵最高法院的新保守主义多数派持不同法制观点的人的政治反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人至少与目前在政府中发挥邪恶影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数量相当。而且有迹象表明，在基督教多数派内部，尤其是在领导层中间（他们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反战立场），认为孤立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奉行支持宗教宽容以及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和平共存这一不同类型的基督教精神在道义上是必须的。美国当前存在着一种竭力表达自己的反战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但也存在着分布于各个层面尤其是媒体领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压制不同意见的氛围，这就意味着要想在美国国内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和在经济层面上反对继续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就必须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比如尽管隐藏在新自由主义背后的阶级力量异常强大，但是新保守主义类型的统治在国内和国际上越显得存在问题，在权力的领土逻辑到底通往何方这一问题上，甚至在精英阶层中间就越可能会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新自由主义模式当前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它给美国所带来的威胁甚至可能会导致美国构建另外一种权力的领土逻辑。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发生完全取决于美国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尽管这并非是决定性因素，但它将在我们个人和集体

的未来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只能观察、等待和期盼。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全面的反美情绪不会也不可能有所帮助。美国国内的那些为构建一种新的替代方案（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而进行的斗争，需要尽可能地争取一切同情和支持。如同内外辩证关系在构建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样，颠倒这种辩证关系将在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延伸读物

S. Amin,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J. Atlas, 'A Classicist's Legacy: New Empire Builders,'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Sunday, 4 May 2003, pp. 1 and 4.

W.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M. Boot,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Small Wars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K. Boulding and T. Mukerjee (eds.), *Economic Imperialism: A Book of Reading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

J. Cavanaugh, J. Mander, et al.,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San Francisco: Bennett-Koehler, 2002).

J. Comaroff and J. Comaroff (eds.), *Millen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 Falk,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A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N.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W. Finnegan, 'The Economics of Empire: Notes 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Harper's Magazine*, vol. 306, no. 1836 (May, 2003), pp. 41–54.

S. George and F. Sabelli, *Faith and Credi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5).

S. Hersh, 'Annals of National Security: How the Pentagon Outwitted the C.I.A.' *The New Yorker* (12 May 2003), pp. 44–51.

P.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ev. edn. 1999).

E.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7).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 Siegelman, 1965 edn.).

D. Judd, *Radical Joe: A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7).

R.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Knopf, 2003).

V. Kiernan, *America: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Zed Books, 1978).

N. Klein, *No Logo* (New York: Picador, 2000).

D. Korton,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Bloomfield, CT: Kummarian Press, 2001).

C.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in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2002).

B.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H.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Norton, ed. by A.J. Pearce, 1962 edn).

H. Magdoff, *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K. E. Meyer, *The Dust of Empire: The Race for Mastery in the Asian Heartlan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M.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ondon: Zed Books, 1999 edn.).

W. Nordhaus, 'Iraq: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Wa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xlix, no. 19 (5 December 2002), pp. 9–12.

R. Owen and B. Sutcliffe (ed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Longman, 1972).

Oxfam International, *Rigged Rules and Double Standards* (London: Oxfam International, 2002).

H. Radice, *International Firms and Modern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S. Sassen,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A. Schlesing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0).

V. Shiv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7).

V. Shiva, *Protect or Plunder? 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ondon: Zed Books, 2001).

V. Shiva, *Water Wars: Privatization, Pollution and Profit* (London: Zed Books, 2002).

K. Singh, *The Globalisation of Finance: A Citizen's Guide* (London: Zed Books, 1999).

G. Soros, *George Soros on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R. Steven, *Japan's New Imperi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J.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A. Thornton, *Doctrines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Wiley, 1965).

A.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5).
D.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参考书目

Press Comment

Altman, D., 'China: Partner, Rival or Both', *New York Times*, 2 Mar. 2003, Money and Business section, pp. 1 and 11.

Banerjee, N., 'Energy Companies Weigh their Possible Future in Iraq', *New York Times*, 26 Oct. 2002, p. C3.

Bush, G. W.,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 2002, p. A33.

Cooper, 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Observer*, 7 Apr. 2002.

Crampton, T., 'A Strong China May Give Boost to its Neighbo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Economic Outlook, 23 Jan. 2003, pp. 16–17.

de Acule, C., 'Keeping a Wary Eye on the Housing Boo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3 Jan. 2003, p. 11.

Eckholm, E., 'Where Workers, Too, Rust, Bitterness Boils Over', *New York Times*, 20 Mar. 2002, p. A4.

Editorial, *Buenos Aires Herald*, 31 Dec. 2002, p. 4.

Fisk, R., 'The Case Against War: A Conflict Driven by the Self-Interest of America', *Independent*, 15 Feb. 2003, p. 20.

——'This Looming War isn't about Chemical Warheads or Human Rights: It's about Oil', *Independent*, 18 Jan. 2003, p. 18.

Friedman, T., 'A War for Oil?',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Week in Review section, p. 11.

Hilterman, J., 'Halabja: America Didn't Seem to Mind Poison Ga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7 Jan. 2003, p. 8.

Ignatieff, M., 'The Burden',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22–54, repr. as 'Empire Lite', in *Prospect* (Feb. 2003), 36–43.

—— 'How to Keep Afghanistan from Falling Apart: The Case for a Committed American Imperialism', *New York Times*, 26 July 2002, Sunday Magazine, pp. 26–58.

Kahn, J.,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13 Jan. 2003, pp. A1 and A8.

—— '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Business section, pp. 1 and 10.

Kirkpatrick, D., 'Mr Murdoch's War', *New York Times*, 7 Apr. 2003, p. C1.

Krueger, A., 'Economic Scene', *New York Times*, 3 Apr. 2003, p. C2.

Madrick, J., 'The Iraqi Time Bomb', *New York Times*, 6 Apr. 2003, Sunday Magazine, p. 48.

Rosenthal, E.,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0 Mar. 2003, p. A8.

Tyler, P., 'Threats and Responses. News Analysis: A Deepening Fissure', *New York Times*, 6 Mar. 2003, p. 1.

Books and Journal Articles

Amin, S.,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June 2001), 1–10.

—— 'Social Movements at the Periphery', in P.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76–100.

Anderson, J., 'American Hegemony after September 11: Allies, Rivals and Contradic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Borders Research,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002.

Anderson, P.,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New Left Review*, 14 (Mar. 2002), 20.

Arendt, H.,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1968 edn.).

Armstrong, D., 'Dick Cheney's Song of America: Drafting a Plan for Global Dominance', *Harper's Magazine*, 305 (Oct. 2002), 76–83.

Armstrong, P., A. Gly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 Up of the Great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 and B.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Baran, P., and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Berman, M., 'Justice/Just Us: Rap and Social Justice in America', in A. Merrifield and E. Swyngedouw (eds.), *The Urbanization of In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1–79.

Bhagwati, J.,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77/3 (1998), 7–12.

Bleaney, M.,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London: Methuen, 1976).

Blum, W., *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London: Zed Books, 2002).

Bowden, B., 'Reinventing Imperialism in the Wake of September 11',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Summer 2002); online at <http://alternatives.journal.fatih.edu.tr/Bowden.htm>.

Brenner, 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Brewer, A.,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Burkett, P., and M. Hart-Landsberg,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ast Asia: The Limi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8 (2001), 3–48.

Cain, P., *Hobson and Imperialism: Radicalism, New Liberalism and Finance, 1887–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archedi, G., 'Imperialism, Dollarization and the Euro',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London: Merlin Press, 2001), 153–74.

Chamberlain, E.,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Chomsky, N., *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1).

Doyle, M. W., *Empir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Freeman, C., *High Tech and High Heels in the Global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Gills, B.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Gowan, P.,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 L. Panitch, and M. Shaw, 'Th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9 (2001), 3–38.

Guilbaut, S.,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trans. A. Goldham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edn.).

Hardt, M., and A.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t, G.,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repr. London: Verso Press, 1999).

——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Hegel, G. W.,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Kno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edn.).

Henderson, J., 'Uneven Crise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Turmoil', *Economy and Society*, 28/3 (1999), 327–68.

Hill, C.,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Hines, C., *Localization: A Global Manifesto* (London: Earthscan, 2000).

Historical Materialism, 8 (2001), special issue: 'Focus on East Asia after the Crisis'.

Hofstadter, 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n.).

Huntington, 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Isard, W., *Location and the Space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

Johnson, C.,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Julien, C.-A., J. Bruhat, C. Bourgin, M. Crouzet, and P. Renouvin, *Les Politiques d'expansion impérialis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9).

Kennedy, 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990).

Klare, M.,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Krugman, P.,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Lee, C. K.,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rans. F. Brya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Lenin, V. I.,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Selected Works*, vol.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

Li, S.-M., and W.-S.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Lösch, A.,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trans. William H. Woglo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Wolfgang F. Stolp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Luxemburg, R.,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A Schwarzschi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edn.).

McDonald, D., and J. Pape, *Cost Recovery and the Crisis of Service Delivery in South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2).

Markusen, A., *Profit Cycles, Oligopol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 *Region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erritory*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1987).

Marx, K., *Capital*, trans. B. Fowkes (New York: Viking, 1976).

—— and F. Engels,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Mehta, U., *Liberalism and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Mittelman, J.,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Morton, A., 'Mexico,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EZLN: A Neo-Gramscian Analysis', in B. Gills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255–79.

Nash, J., *Mayan Visions: The Quest for Autonom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at <www.whitehouse.gov/nsc/nss>.

Nye, J.,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no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Ong, A.,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anitch, L., 'The New Imperial State', *New Left Review*, 11/1 (2000), 5–20.

Payer, C., *The Debt Trap: The IMF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erelman, M.,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etras, J., and H. Veltmeyer, *Globaliz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Zed Books, 2001).

Pilger, J., *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02).

Pollard, S., *Essay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ed. Colin Holmes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2000).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edn.).

Roy, A.,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Servan-Schreiber, J. J.,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Scribner, 1968).

Smith, N.,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Soederberg, S.,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mposed Leadership and "Emerging Markets"',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London: Merlin Press, 2001), 175–92.

Strange, S., *Mad Money: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U.S. Imperial Ambitions and Iraq' [editorial], *Monthly Review*, 54/7 (2002), 1–13.

Wade, R.,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Warren, B.,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1).

Went, R., 'Glob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66/4 (2002–3), 473–97.

Williams, W. A.,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Wolf, E.,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9).

Yergin, D., J. Stanislaw, and D. Tergin,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Zhang, L.,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前言
第一章　石油决定一切
第二章　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
第三章　资本束缚
第四章　剥夺性积累
第五章　从认同到强制
延伸读物
参考书目
插页页
附录页
封底页